

目

学 术 研 究

(郭沫若题)

社 长 主 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邓小平理论研究•

5 / 于幼军: 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

•经济学•

14 / 李新家: 发展中国经济学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

18 / 王春生: 中国资本市场效率问题研究

23 / 何小锋 刘永强: 资产证券化理论及其在中国实践

——对中国一个早期案例的研究

29 / 唐兴霖 李东辉: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制度取向

•学苑聚焦•

34 / 高 岚 李 群: 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
——记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

•“知识与价值转化工程”征文•

37 / 宋天和 郎乃瑞: 论价值转化在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42 / 许斗斗: 知识经济呼唤新的社会价值观

录

·历史学·

- 47/陈 新：论历史叙述在历史学实践中的地位及功能
- 53/梅新育：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
- 61/陈 方：论王国维运用文物档案考经证史的开创意义

·文学·语言学·

- 66/程文超：略论章太炎与他的时代的关系
- 71/温宗军：都市规则与怀旧情绪
——张欣小说读解
- 74/肖 松：写作姿态与都市意识
- 78/詹伯慧：近 20 年汉语方言学学术活动述评

·公民教育研究·

- 85/黄甫全：自我意识的发展与公民教育的基本策略

·书评·

- 92/邱忆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的探索
——读刘卓红《回归与重构——卢卡奇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
- 94/邹兆辰：历史人物研究的新模式
——评胡波著《岭南文化与孙中山》

·学术动态·

- 60/方 一：第二届海峡两岸伦理学术研讨会召开
- 96/郭秀文：“十九世纪的岭南”学术研讨会召开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CONTENTS

No. 2, 1999

-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Should Keep Mr. Deng's The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s a Leading Policy Yu Youjun(5)
- Several Problems Waiting for Being Clarified to Develop Chinese Economy Li Xinjia(14)
- A Study of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Capital Market Wang Chunsheng(18)
- The Theory of Property Stock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He Xiaofeng and Liu Yongqiang(23)
- Systemization of the Adjustment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ants Tang Xinglin and Li Donghui(29)
- Main Point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Gao Lan and Li Qun(34)
- On the Function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Shaping and Developing of Knowledge Economy Song Tianhe and Lang Nairui(37)
- A New Social View of Value Is Called for in Knowledge Economy Xu Doudou(42)
- On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Historiography Chen Xin(47)
- Foreign Trade and Financial System Basing on the Money of Silver Mei Xinyu(53)
- On the Significance of Wang Guowei's Initiating the Study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by Using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ives Chen Fang(61)
- The Relation between Zhang Taiyan and His Time Cheng Wenchao(66)
- My Explanation of Ms. Zhang Xin's Stories Wen Zongjun(71)
- On the Attitude of Cre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Metropolis Xiao Song(74)
- A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Chinese Dialect Study in the Last 20 Years Zhan Bohui(78)
- The Tactics of Citizen Education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Consciousness Huang Fuquan(85)
- A Review on Mr. Liu Zuohong's 'A Study of Lukács György's Ideological System of Philosophy' Qiu Yitong(92)
- A Comment on Mr. Hu Bo's Work "The Culture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and Mr. Sun Zhongshan" (94)
- News of the Symposium: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in 19th Century Guo Xiuwen(96)

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

□ 于幼军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 510082)

在初级阶段，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一句话，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与此相适应，初级阶段的文化就其核心和主体而言，应该而且必须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文化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它不仅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社会状态，而且改变了旧中国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成为引导、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实现民族振兴、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伟大的力量，不仅在于其思想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更主要的还在于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它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真正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实际问题。本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这次革命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是要把中国从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次革命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共有的文明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一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因此，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具体地讲，就是要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为指导，这是毋庸

置疑的。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动摇和放松，都有可能使文化建设迷失方向、丧失根本。

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新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审视了当代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总结了我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予以科学的回答，创立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第一，科学地阐明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两大成果。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人类文明明确地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方面，阐明其基本内涵和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邓小平强调：“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①“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②阐明了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现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深刻地指出：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可以对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影响和制约物质文明的性质和发展

的方向、水平，“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③“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④

在阐明两大文明关系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现代化建设规律要求的高度，精辟地概括和揭示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⑤“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⑥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中去考察、把握，揭示出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我国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根本方针。

第二，精辟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两方面基本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它涵盖哪些领域？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任务等一

系列重要问题的把握。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⑦这一概括揭示了精神文明两个基本方面的内涵，为正确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邓小平认为，教育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作为精神文明两个基本方面，是有机的统一体，缺一不可。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它一方面必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物质文明建设和提高社会成员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作用表现在：教育和科学以其技术功能即通过科技进步和更新技术手段，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教育和科学文化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起基础性作用，离开了这一基础，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培养“四有”新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和科学还以其理性功能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从而直接影响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⑧

思想道德则是精神文明的灵魂和核心。思想道德建设所要解决的是个人和整个民族、社会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以及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从而决定着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它对精神文明建设、以至整个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起导引、推动和保证的重要作用。

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围绕教育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这两个基本方面，正确处理好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与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因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因此，要把发展教育和科学摆在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地位，努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调动和激发教育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培养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加快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科技。还要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根据文学艺术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引导帮助文艺工作者提高文艺创作水平，为人民奉献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与此同时，要十分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地对人民群众进行科学的理想信仰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在理想信仰教育方面，既要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又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历史任务和奋斗纲领，善于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我国现阶段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把全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成员团结起来，形成凝聚全民族智慧和力量的强大精神支柱，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在世界观教育方面，要大力宣传、引导、帮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尤其要牢固树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价值观、人生观教育方面，要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观察、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兼顾个人利益，把三者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把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同实现社会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在为实现现阶段全民族共同理想的奋斗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在道德观教育方面，要大力宣传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倡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提倡勤劳致富，尊重个人合法、正当的权益，等等。还要把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同制度、法规建设结合起来，使思想道德建设化虚为实、由软变硬，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第三，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

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用她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从而明确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时，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

标，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重要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特别是要教育好青少年，教育好后代。

围绕培养“四有”新人这一根本目标，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要求：

——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坚持不懈地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加强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精神为核心，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重点，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特别是要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

——加强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向人民群众讲清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让社会绝大多数人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同时又自觉维护法律，遵守纪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振兴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展、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等。

第四，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原则和途径方法。

邓小平根据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要求，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原则和途径方法。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重在建设方针，主要用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解决问题，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讲经济效益；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三不主义”；继承民族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具体事情抓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关键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等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新贡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未来理想社会时，对文明和文明时代以及文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列宁、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探讨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列宁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概括为“文化革命”，阐述了“文化革命”的具体内容包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繁荣，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等等。毛泽东更是具体地提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内容、要求，如提出要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要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要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等等，至

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受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局限，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他们都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原理和重要思想，又根据新的实践把她丰富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这一理论第一次全面、科学地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本内涵以及相互间的辩证关系；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括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并明确规定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中，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主要任务，以及方针原则和途径方法，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初步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但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大理论价值；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赋予它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内涵。它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探索搞好社会主

义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和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思路、对策、措施，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二、只有坚持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才能够解决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文明进步。

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面临全新的形势和环境。从国际范围看，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世界并不风平浪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 21 世纪领导权的斗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强权政治与反对强权政治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互相交织，错综复杂。80—90 年代交替之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接连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政治格局不复存在。世界各国、各区域之间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较量，日益成为影响、改变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

与此同时，70—80 年代以来，高新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大发展，而且加快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催化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各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联系更加密切。科技文化力对世界潮流的影响和作用愈加凸现。

世界格局这种转换和发展趋势，为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创造了先进的物质技术条件；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各种思

想文化激荡加剧，使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许多新的困难、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

从国内看，改革和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主题。中国要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潮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主流，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的来讲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它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对扫除封建宗法观念、等级特权观念、贵贱尊卑观念，对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自由平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等大有裨益，可以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的生长点。但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和趋利性原则等也容易诱发部分人私欲、物欲的膨胀、一切向钱看、搞钱权交易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已经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国际格局的变动中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不仅有利于引进外资、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还有利于加强国际性的科学文化交流，吸取和

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促进我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但是，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曲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⑨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外开放也会有风险，资本主义消极、腐朽的东西会乘机而入，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因此，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不同于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况且如前文所述，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虽然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提出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一些基本原理和重要思想，但他们都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所以，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能够解决我国新时期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和整个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因为，第一，这个理论既面向世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格局的特点和发展态势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又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重回答和解决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

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现实性、实践性。

第二，这个理论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来认识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看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好地解决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但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还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三，这个理论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并随着这一伟大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与时代俱进的强大生命力。它及时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敏锐而准确地指出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对许多重大问题具有科学的预见性。

此外，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历史的、唯物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常注意各种条件的互相联系、相互转化，始终坚持两点论，善于把握好度和分寸，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运用得炉火纯青。比如，它既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都要自觉地服从服务于这一中心，又强调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既要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

又明确现阶段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又不能不讲物质利益；既要加强思想教育，又要重视法规、制度建设；既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又要摒弃封建糟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既要大胆吸取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又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等等，洋溢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

因此，我们在初级阶段进行思想道德文化和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全面正确地把握和贯彻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学会运用这一科学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探索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对策，不断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掌握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动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文明进步。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具体地讲，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自己，首先是发展经济，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做到其他一切工作包括精神文明建设都要自觉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不能干扰、更不能冲击经济建设。其次，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精神文明建设要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但精神文明建设不只是处于服务、从属地位，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目标之一。因此，要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不能只重视抓物质文

明建设，不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先抓物质文明建设，后抓精神文明建设，更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发展。而要从思想认识到实际工作都真正做到两个文明建设一起部署、一起落实，确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再次，要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以指导认识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又不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设想论断。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认识和论断，包括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些原则要求，要考察、分析其在初级阶段是否具备在社会普遍实践的条件。如《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决裂”，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逐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决裂”有不同的任务和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等原因，尚不具备完全实现“两个决裂”的条件。因此，在初级阶段不宜向社会成员普遍提出“与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等要求和口号。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按劳分

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这与过去长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的认识比较，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与之相适应，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等，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要与这种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经济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认识相适应，不能再停留在 50—70 年代的水平上。

此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与此相适应，思想道德建设要摆脱计划经济的观念，树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

总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决定了我们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又必须自觉地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扎实推进。在实践中要把握好四个原则：一是把长远目标和现阶段目标结合起来，立足于现阶段目标；二是把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统一起来，引导社会成员在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

和人生价值；三是努力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引导人们在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正当、合法、合理地求利；四是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统一起来，对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提出不同的要求，使各方面、各层次的社会成员都感到“有道可循”，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的感召下向上向善。●

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2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9 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4 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54 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 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7 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7 页。

⑧江泽民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 年 5 月 28 日，第 1 版。

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 页。

责任编辑：童 轩

发展中国经济学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

□ 李新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510610)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建设正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理论深层次切入要求。加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如果说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学理论与其应用的基础问题。因为经济科学理论,以经济科学理论为主要基础的应用技术,经济决策思想,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等,都有一个哲学基础问题,即都有一个按照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思考的问题。下面,我们从三方面略抒己见。

(一) 经济规律与人们的选择

经济科学是经济系统客观规律的理论反映,它说明经济学所研究的那个客观对象是什么样子,怎样运动等等。而应用经济技术、经济决策思想和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人们对于经济科学理论的应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加进了人们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成功与否要靠进一步的实践来检验。

而复杂的是,当人们把自己的选择加入客观过程的时候,会因为人们施加给客观过程作用力的大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

但它可能不符合其他的客观规律。比如人们可以在只适合于一年种两季庄稼的地里种三季庄稼,成功与否与花费的成本有关,这是符合某种规律的。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经济学的其他规律。

这种复杂性与经济学的规律本身具有某些复杂的特点有关。也许可以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这件事来说说道理。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决定选取市场经济体制而抛弃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因为我们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或者说这种体制使我们在很多时候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今天的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选择是市场经济体制。这里,符不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根本性判断在于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经济发展的后果。但是不管客观规律的要求怎样,在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就发挥不了作用,或者说这种作用最多只能通过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经济发展的后果不佳来判断。因为在那时在我们这里,市场经济这个事物不存在,当然它的规律也就不存在。而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时,在这个体制下从事活动的经济主

体的行为就表现出符合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某种规律性。这些规律性尽管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行得通的。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行不通了。

总之，我的意思是，经济规律是指包括着人们的选择在内的那样一种事物的规律，人们选择的意志作用与人们意志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又在一定限度内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是因为这样，使得人们常常把经济科学的理论与经济决策思想混在一起，有时甚至把自己的选择当成客观规律。比如说我们长期以来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实际上这只是我们的一种选择。真正算得上是客观规律的东西是必定会反复地自发地表现出来的，是人们对外观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之后总结出来的。人们的行为如果违反了它，是肯定要失败的。而人们自身的选择则要通过实践来检验。

因此，把经济科学理论所阐明的客观经济规律与人们的经济决策思想和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种区分由于经济规律特有的性质而十分困难。

（二）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性认识

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具体的，它的研究对象也是具体的。对于经济科学及其研究对象的这种具体性的认识必须不断加深。最近有学者指出把经济学叫做西方经济学是错误的，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比如像物理学一样，哪里有什么东方物理学和西方物理学？因为物质运动的规律在东方和在西方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直到现在并不

是把经济学叫做西方经济学，而只是把经济学分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而且我们不能同意有的经济学家把我们自己的经济学不当经济学，只承认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这种区分有没有道理要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系统和西方国家中的经济系统及其运动规律是不是相同的事物，如果二者是相同的事物，具有相同的运动规律，那当然不必区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如果二者是不同的事物，那这种区分当然也就是必要的而且符合科学常识的。由此，我们可以阐明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

第一，经济学这样的科学与物理学这样的科学相同的方面是，它们都是研究客观世界某个或某些方面的规律和联系，它们所阐发的理论和思想以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具体情况作为真理性的标准。二者都有可能认识到或者没有认识到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

第二，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物理学研究的对象在其本性上有一点是不相同的。物理学的对象是可以没有人类活动参与其中的，因此不应该有东方物理学和西方物理学的区分（其实这也只具有极其相对的意义，我不知道物质运动的规律是否受到地球上东方和西方这种不同位置的影响，但是地球物理学和其他天体的物理学应该是不相同的）。但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本来就是人们及其社会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是不相同的，因此，不同的大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强调不同地区和国家经济系统的差别，而无视它们之间的共性。所以理论界长期以来都在反对照搬西方经

经济学的理论而主张它只有参考的价值。

第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样都是具体的。这个具体对象包括哪些内容可以随着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有研究整个人类经济活动共同规律的经济学，也可以有研究一个大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活动规律的经济学，甚至还可以有研究一个城市经济活动规律的经济学。这些是以经济活动依以进行的地域来划分的。

第四，经济学可以以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的规律作为研究的对象，于是就有了不同时代的经济学，比如古代的经济学和现代的经济学的等等。

第五，由于有了以上几个方面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因为西方的经济学不符合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而认为它是错误的，也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学解释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现象而认为我们自己搞错了。当然也不会坚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改变我们自己，也不会试图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不会因为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观点解释不了我们今天的实践，就认为马克思错了，也不会坚持某些经济学观点永不改变而试图让子子孙孙都相信它永恒的真理性。

如果我们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以上的这些思想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澄清的。

（三）根据经济系统变化的实际重新思考经济学

许多经济学教科书都说，资本会自动地流入那些商品价格高生产经营者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资本的这种流动会一直延续下去直至这些部门的供应超过需求而引起价格下降，而且会下降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原来这些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的部门不仅不能再得到超

额利润，其利润还会下降到平均利润以下，引起资本又源源不断被抽走，直到回到原来那种情况。并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地通过盲目的竞争来配置资源的，认为这是客观规律。于是许多经济决策者也就很自然地认为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去做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盲目的。人家做了某种产品赚了钱理所当然我也要去搞这种产品，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就是要与人家展开激烈的竞争，打个你死我活，优胜劣汰，认为这就是自然规律。其实经济学所阐述的这个过程只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描述，而且是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的描述，并不是一种决策思想。如果把它当成决策思想，那它就是形而上学的决策思想。说市场经济是盲目的，其实也只是讲搞市场经济的人有时会是盲目的，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客观事物是无所谓盲目或不盲目的。如果认为市场经济的某种盲目性是客观规律，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规律去盲目地搞市场经济，那岂不大错特错！

也许有人认为，价格变化引导资源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服从它利用它，而不能违背它，违背了注定要失败。我认为以往的经济学的思想方式负一定的责任。应该承认经济决策者根据商品价格的变化和获利情况而改变资本投资的方向和领域是一种客观规律。但是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这种客观规律是有关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律，人们的行为是必然地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实际情况下变化了的人们行为会表现出不同的客观规律。一种具体的规律不是适应于任何情况的。第二，这种客观规律主要是人们以往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客观

规律，今天人们的行为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的原因是现代信息科学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因为，人们已经看出，按照上面提到的经济学所描述的那种客观规律办事，不仅不能保证成功，而且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单个企业和个人的失败伴随着整个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的浪费，一部分资源的优化配置或高效率的使用是以另一部分资源的浪费为代价的（这也许是先哲们追求计划经济的初衷之一）。今天那些利用了现代信息科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企业的管理者们不会盲目地服从市场经济的过去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他们不一定是跟着其他企业走，他们不一定认为其他企业在某个经营领域获得了较高的利润，他们进入以后也会获得较高的利润，他们不一定选择在相同的生产经营领域与别人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总之他们不一定服从短期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规律。

那么这些先进的人们行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他们利用电子计算机网络来收集信息和加工处理信息，他们对影响产品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他们对这些因素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测，他们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更多地引入他们的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中去，他们利用电子计算机网络来设计产品、控制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他们利用电子计算机网络来协调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活动。总之，他们决策的依据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作出的对市场发展前景的整个判断，而不是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所阐明的那样是当前的市场价格和别人的获利情况。

先进的人们正在抛弃形而上学的决策思想，采用符合现代科技发展实际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决策思想。

实际上我们这里也论述了单一因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和决策思想转变为决策过程中的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问题。过去我们往往因为特别重视或强调某个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上面讲的这种价格变化引导资源配置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片面强调价格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有时我们特别强调经济过程的社会性质，特别强调所有制的差别，有时强调得过了头，忽视了其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是网络社会，网络的特征要求我们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各种决策则应该变成系统工程。这又成为了一种客观规律，如果不按这样的规律办事，我们就会在实践中失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其他许多变化导致了客观经济系统性质的变化，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决策思想也必须跟着变化。这是尊重客观规律的表现。

经济学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必须根据经济系统实际情况的变化来思考和重新思考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一切脱离了现实经济生活丰富和深刻变化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现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重大变化是经济系统中以体力劳动作为主要基础正在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作为主要基础，即体力劳动在价值生产和使用价值的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转变为脑力劳动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表现。这要求以体力劳动作为主要基础的经济学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作为主要基础的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今天坚持实事求是世界观对经济学提出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求。这涉及到劳动价值论的整个革命性的变革，需要另文专门论述。●

责任编辑：韦 前

中国资本市场效率问题研究

□王春生

(中南财经大学金融系证券研究所研究生 430064)

一、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效率的因素分析

造成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资本市场在资本供给、资本流动方面的缺陷、信号功能的失灵及利率水平和资本市场价格的非均衡性。

(一) 资本供给与资本市场效率

资本供给是资本市场的发动机,是资本市场得以生存的造血器官。资本供给方式与资本市场效率有着直接联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资本筹措成本、资本的投向和资本的质量。我国现行的行政操纵型资本供给机制,即对上市额度和发行价格的控制,严重影响着我国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

1. 我国目前股票发行,是由国家下总量,再分配给各地方和各部委。由于额度的分配是根据地域、部门(即条、块)来分配的,但各地、各行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我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各地各部委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数量、产业结构、企业规模有着很大差异。带有明显平均主义特征的额度分配方法,必然会使有些地方的合格企业无法上市,而某些企业本身并不

符合上市条件但因额度比较充裕而成了上市公司。而且具体到某个企业能否上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其的活动能力、公关能力如何,而并不注重其业绩的好坏,因为企业为了争上市可编造种种假帐,这种运动往往会得到一些要大干快上的地方政府的支持或庇护,有时还会出现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而故意选派“困难户”上市的情况,即演变成了所谓的“选劣机制”(王春生,1998)。以上种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我国的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地域结构的合理性无法得到保证,资本并不是完全投向高效率的企业和部门,上市公司的业绩普遍差强人意,资本的质量极其低劣。

2. 采用计划价格的发行方法发行新股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国新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价格并不是按照预测的市场价格,而是按照主管部门制订的远低于市价的价格,这样首先造成股票一级市场无风险的暴利,吸引各种社会资金以合法与非法的途径蜂拥而至,即导致供求失衡,又扰乱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金融秩序。其次由于计划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供求平衡价,使得新股发行筹得资金的大头,不是给了发行股票的上市

公司，而是白白送给了股票市场的认购者。上市公司得到的那部分小头资金是通过出让国有资产原有的财产权利，通过出让股权得来的，之后还得承担种种义务，而认购者，靠的是资金实力和运气，得到的是飞来之财，全无义务可言，市场的扩容与其说是给企业筹集资金，还不如说主要是给投机资金输血。同时上市公司很难用其得到的这一小部分资金生产出 100% 的足额资金应该产生的业绩，造成上市公司失血过多、先天不足。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社会资本流失现象，同时给我国的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经营埋下了隐患。虽然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筹资较内部积累和债务融资成本是最低的（李向阳，1998），但是这种低成本的融资是以大量社会资本的流失、高昂的社会融资成本为代价而换来的，因此可以说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也是非常昂贵的（王春生，1998）。

（二）资本流动与资本市场效率

资本的流动性是资本市场乃至国民经济长期均衡的重要机制，资本自由流动可促进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市场由于存在强大的评价、选择机制，而投资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始终具有明确的逐利动机，从而通过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促进资本流向高效益部门，优化资源配置。

1. 资本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的首要条件是资本的充分自由流动。但是我国股票市场严重的股权分割现象以及缺乏完善的资本交易体系，造成资本的流动性极低，极大地制约了我国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被人为地分割为国有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公众流通股等，而能够自由流

通的只有所占比例约 1/3 的公众流通股。国有股、法人股的凝固化，所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上。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提供了一种资本资产形态转换和资产流动的机制，使得资产的流动性大大增强，资产的初次配置和重新配置在时间及空间上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发展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国有资产在行业和企业间的流动提供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大幅度降低流动成本，使许多在实物形态上不可能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得以进行，而且资本市场提供了多种低成本的资产重组机制，通过购并等方式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改进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以上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为前提，在这些股份不能流通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只能是流于形式（刘世锦，1997）。其次，这种同股异权的现象破坏了股市的基本运行规则和程序，使得市场价格决定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波动性，股市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了政策市、投机市，失去了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最后，这种同股异权现象也造成了国有股权的大量流失，国家即丧失了作为主渠道高卖低买、平抑股市的手段，又失去了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者趋利避害、转移投资、扩大国有资本控股权的机会。

2. 我国不完善的资本交易体系，也是制约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完善的资本交易体系应当包括公开上市股票市场、非公开上市股票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最大限度地促进各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合理配置资源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和责任。上市公司股票市场和非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一样，都具备这种功能和机制，

因此,非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也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就目前我国情况看,虽然拥有几家地方性的证券交易中心,但是却受到政府严格的约束,使得不具备上市资格的广大中小企业失去了参与资源配置优化的途径,法人股市场的开放是对其的一种试点,但是STAQ系统和NET系统市场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宫玉选,1998)。此外虽说我国产权交易机构数量众多,但有相当一部分名不符其实,大部分的交易所都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严重制约着我国非证券化资本形式的自由流动。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和市场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上资本的流动性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对资本初次分配和重新配置功能的发挥。

(三) 信息功能与资本市场效率

资本市场信号功能的发挥程度、信息分布是否合理,是决定股票市场是否有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一个资本市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1. 资本市场为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一种信号,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会影响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决策。就经营者来说,一方面,资本市场是企业的一个融资来源,股价的变动会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的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资本市场对企业价值的估价变动会影响现有股东利益,因而经营者的经营决策必须考虑资本市场的反应。就投资者来说,资本市场的各种信息显得更为重要,投资者为了获得投资收益最大化必须关注资本市场的信号。但是考察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和资本市场的信号功能是脱节的。我国资本市场上经

营者的经营目标并不是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自身利益和职工利益的最大化,对国有上市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尤为如此。因而决策行为与资本市场的信号无关。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可以按照一级股票市场发行价购买10%的公众流通股,这种优先购买权是一笔巨大的收入。股票融资的低成本促使经营者根本无需考虑投资收益问题,因为其成本之低可以使得企业用股票融资来偿还债务,或干脆存入银行获息。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也基本上不影响企业的融资和投资决策。公司发行新股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经营者的待遇、地位与市场价格波动也基本上无关。对投资者来说,在投机盛行的市场中,他们更关心的是内部消息、小道消息,如果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话,甚至什么消息都可漠不关心。当前我国股票市场上,股评家、技术分析家大行其道,殊不知这正是资本市场不成熟、无效率的表现。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需要理性的投资者和高素质的、谙熟现代证券定价理论的分析专家。

2. 我国资本市场信息分布很不合理,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严重。首先市场参与者不可以按照同样的成本获得同样的信息,在信息获取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公平,证券商和机构人往往能提前取得一般投资人难以得到的内部信息。其次上市公司往往利用自身拥有的信息优势采取隐蔽行动,即所谓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大量存在。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有关信息对每个投资者都是均等的,而且每个投资者都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及时地进行理性的投资决策,那么任何投资者都不能获得超额收益。就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成

熟，信号功能并未发挥真正的作用，资本市场效率有待提高。

（四）市场利率和资本市场效率

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来讲，利率必须准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能替代现时消费的投资机会和消费者对延期消费的非意愿程度。在扩展的资本市场上，各种投资竞相争夺储蓄支配权。而利率这种价格可用来甄别各种投资选择，使资本要素流向更高的地方使用（爱德华·肖，1973）。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存在严重的资本市场价格和货币市场价格（利率）的非均衡性，导致我国资本市场资本的低效率配置和使用。由于资本市场价格偏高和货币市场存贷利差过低，诱使各种违规资金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进行往返套利，大大降低了资金由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效率，影响了实体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我国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连续降低利率，或松动货币政策，不仅是对资本真实价格的扭曲，还会助长对资本这一稀缺要素的效率配置和使用。要使国民经济走出粗放增长的陷阱，应该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当提高利率水平。这即鼓励了储蓄，也提高了资本要素价格，有利于资本的优化配置和资本效率的提高，进而有利于收入水平和资本供给能力的提高（赵晓雷，1998）。

二、提高我国资本市场效率的策略选择

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资本市场运作机制、交易制度、产权制度、市场体系的完善，以及投资者理性投资观念的形成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调控政策的协调。我认为，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

可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

1. 改革股票上市发行制度。在当前，众多企业强烈的上市筹资冲动和“资本扩张饥渴症”的情形下，对新股发行实行额度控制实为权宜之计，也符合积极稳妥的发展方针，但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出发，从保障上市公司内在素质和整体质量出发，股票发行机制应有步骤、有计划地从额度控制逐步转向标准控制。通过制定严格、规范、科学、合理的发行上市标准，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业绩优良、制度健全、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定型的企业上市，逐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和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本质量。同时可将计划价格的发行方式改为上网可调控均衡竞价发行方式，即运用现有的股票交易网络，把预先确定的发行底价和发行量全部一次性地输入承销商在交易所的股票帐户，由申购者在指定的时间内，以不低于发行底价的申报价格以限量申购的方式进行委托申购，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确定各申购价格的权重大小，申购期满后，由交易系统计算出本次申购的加权平均价，并根据加权平均价合理确定有效申购和最终发行价的一种股票发行方式。采用这种发行方式不仅有利于市场供求平衡，最大限度抑制投机，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而且发行环节较少，购股成本较低，方便快捷，有利于提高发行效率，同时更加充分、有效地体现了“三公原则”，能切实保障广大中小投资者和国家的合法权益。

2. 推动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股权的流动性不仅为企业产权主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我保护手段，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企业经营者的压力。同时股权的流动性，也是国企战

略性改组、优化资本配置的有效手段。股权的流动性应以适度为前提,从当前来看,首先在保持整个资本市场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推动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其次要制定和完善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交易规则,推动企业之间良性并购重组行为的发展,使资本的流动性能有效发挥微观约束功能,促进国企的战略性重组,实现资本重新配置的优化。尤为重要的是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国有股、法人股的上市流通将彻底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解开国企和各级政府的裙带关系,使国有上市公司真正成为面向市场、重视市场、处在资本市场机制完全监督下的市场型法人实体。

3. 完善资本交易体系。资本的充分自由流动离不开完善的资本交易体系,完善的资本交易体系也是不同规模、不同偏好、不同要求的企业的融资所必需的。在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市场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建立和完善非上市公司股票市场,开辟广大中小企业参与资源优化配置的渠道。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产权交易市场,以促进那些非证券化的、表现为实物形态的大量存量资本的流动。

4. 完善信息制度。建立完善的信息制度是提高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环节。资本市场说到底是一个信息市场,信息的可获得性和所获信息的准确性是

市场效率形成的重要条件,因此建立完善的信息制度对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是极为必要的。我国完善的信息制度应当包括信息公开制度、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证券资信评级制度、证券投资咨询制度、新闻制度和惩罚制度。

5. 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在稳定市场、减少投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规模投资效益、培育市场理性投资观念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是指各种类型的投资基金,如共同基金、信托投资基金、养老保险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由专业人士经营,兼顾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有中长期眼光,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同时,要注意对它们的规范与监管,从我国以往情况看,在市场上推动投机气氛、呼风唤雨的往往又是这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

6. 加强利率政策和资本市场管理政策的协调。使货币政策委员会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决策机构,促使其在业务上对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局和证券委的领导,从而在组织上确保对货币市场利率政策和资本市场管理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实现利率水平与资本市场价格的均衡,从而促进资本的优化配置和资本效率的提高。●

责任编辑:谭湛明

资产证券化理论及其在中国实践

——对中国一个早期案例的研究

□ 何小锋 刘永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00871)

30 多年来,世界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创新,资产证券化(Assets Securitization)作为其中最重大的一项创新越来越为金融市场的各方所关注。事实上,无论从速度还是从规模上看,发达国家的资产证券化都可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美国为例,1968 年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的雏形方才出现,而现在证券化已扩展到汽车、船舶贷款应收帐、信用卡应收帐、消费品分期付款以及基础设施收费等众多领域。1996 年,美国传统资产证券化市场规模达到 3256 亿美元。①发展中国家在资产证券化方面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颇为惊人:1994 年南美部分国家的资产证券化交易额为 7000 万美元,次年激增至 27 亿美元;亚洲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也被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看好。②资产证券化正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股不可逆转的大潮。

对中国新生的资本市场来说,资产证券化依然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新鲜事物。1997 年 5 月,重庆市政府与亚洲担保及豪升 ABS(中国)公司签订了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这被认为是中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重大突破。③其实在

1992 年,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即通过发行地产投资券的形式融资开发丹州小区,这次融资过程已经具备了资产证券化的某些基本特征,可以看作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一次早期试验。本文拟对这一案例进行介绍和剖析,并由此引出对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一些思考。

一、理论思考

证券化是一个含义甚广的概念,凡是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证券以筹资的行为都可以归于证券化之列。但作为一种金融创新的资产证券化,指的是通过对不能立即变现,但却有稳定的预期收益的资产进行重组,将其转换为可以公开买卖的证券的过程,它是证券化的高级阶段。按照被证券化的资产种类区分,资产证券化可以被分为实物资产的证券化和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但不论哪一种证券化都是将资产的未来收益以证券的形式预售的过程。

成熟规范的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程序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首先设立一个特殊信托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 SPV),它是一个专门为实现资产证券化而设立的一个信用级别较高的机构。

SPV 与原始权益人签订合同，将拟证券化的资产转移到 SPV 的名下，这一过程一般称之为“真实出售”，它可以确保原始权益一旦发生破产，证券化了的资产将不会遭到清算，从而保障投资人的权益。因此真实出售是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的一个关键。它使得资产本身的回报风险与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风险相分离，从而实现破产隔离的目的。为了降低资产证券化过程的风险，SPV 的经营活动受到相当严格的法律约束：除为完成证券化业务所必须的活动外，它不得从事其它活动，尤其不能发生无关的负债或提供担保；SPV 的董事会中应设有独立董事；SPV 不得破产或发生兼并重组，等等。

在完成真实出售、实现了破产隔离之后，SPV 并不能立刻发行资产支持的证券，因为此时经内部评级，该证券所能获得的信用级别往往并不理想，因而也就难以一个理想的价格在市场上畅销。为此 SPV 需要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信用增级。信用增级的技术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有：（1）评估预期收益；（2）在银行开立现金担保帐户，当未来收益不能足额实现时，由此帐户给予投资者一定的弥补；（3）将所发行的证券分成优先和次级两种，在优先证券的本息尚未支付完毕之前，仅对次级证券付息而不还本，优先证券的信用评级会相应提高，而次级证券一般只发售有限的数量或干脆不发售，以确保优先证券的信用等级；（4）由银行或金融担保公司作为第三方提供全额或部分担保，这样，担保机构的高信用级别就“租借”给了 SPV，从而实现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增级。

经过信用增级，SPV 即可通过投资银行发售证券，获取发行收入，以向

原始权益人支付购买资产的价格。资产管理人（一般是原始权益人）陆续将管理资产产生的现金收入存入事先指定的银行，由 SPV 按期向投资者还本付息。如果资产收益大于应付本息额，其差额归原始权益人所有。至此，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结束，原始权益人的融资目的得到实现。

从国外开展证券化业务的经验来看，原始权益人和投资者都从资产证券化中获益匪浅。原始权益人通过证券化自身的某些资产来融资，并不以增加自身负债为代价，从而也就不会对自身的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银行通过将某些贷款证券化可以将这些资产移至表外，这对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非常有利。原始权益人所获得的另一大好处是自身的股权结构并未因资产证券化而受到冲击，原始权益人并未失去对资产的管理决策权，它所转让的仅仅是资产在未来所产生的收益流。此外，如果原始权益人充当资产管理人，它还可以收取服务费。从投资者角度看，这种由优质资产作为支持，经过了信用提高的证券往往具有风险低、流动性强、收益高的特点，这显然是一种良好的投资选择。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购买资产支持证券不仅优化了其自身的资产结构，也突破了某些投资限制，可谓一举多得。

从纯理论的角度分析，资产证券化之所以能具有如此多的优点，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新型融资方式的出现，优化了金融市场上资源的配置。在传统的融资方式下，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向取决于资金需求方的综合资信水平。因此，尽管资金需求方所拥有的资产的质量良莠不齐，但这些资产获取资金支持的能力却都由资金需求方的综合资信水平决定。优质资产和劣质资产的“竞争”在

很大程度上实现不了，这也就是说资信水平较好的企业所拥有的劣质资产可能会比资信水平欠佳的企业所拥有的优质资产获得更大的资金支持，这显然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失当。资产证券化则不然，它是一种以资产预期收益为导向的融资方式。在证券化情形下，资金的流向直接地取决于对欲证券化资产的收益预期，而与原始权益人的综合资信水平关系不大。资产层面上的“竞争”由此得以实现，优质资产和劣质资产在获取资金支持方面的差异通过资产证券化日益凸显出来，其结果必然是资金更精确地流向优质资产，这无疑会促进资产之间的“优胜劣汰”，金融市场上的资源配置因而得到优化。可以说，资产证券化是市场机制在金融市场上深化的产物，它是一种更有效率的融资方式。

二、三亚地产投资券的案例

90年代初的开发区房地产热，使海南省的房地产急剧增值。在房地产开发的浪潮中，三亚从一个镇升格为地级市，成为海南省开发量最大的地区。如何进一步加速三亚的开发，实现地产的增值，这成为海南省政府当时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另一方面，面对自己家门口前的地产增值，海南当地的中小投资者并没有享受到多大的好处，反而是很多外地大企业携巨款抢滩登陆，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开发中占取有利地位，从而赚得大笔利润。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促使三亚市曾设想设立投资基金，长期从事三亚房地产开发及证券投资，以便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参与到回报丰厚但投资额庞大的地产投资中来。但中央银行于1992年加强了对基金设立的审批，从而使设想中的成立所谓“汇通大特区基金”的计划搁浅，而改为以投资券的形式，通过预售地产开发后的销售权益，

集资开发三亚地产。

三亚地产投资券以三亚市丹州小区800亩土地为发行标的物，所筹资金用于该片土地的“规划设计、征地拆迁、土地平整、道路建设及供电、供水、排水…”等“五通一平”的开发。土地的每亩折价为25万元，其中17万为征地成本，5万为开发费用，3万为利润。这样发行的总金额为2亿元。

市政府下属的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也就是丹州小区的开发商，简称“三亚开建”）是该投资券的发行人。它提供土地进行开发建设，负责按时保质完成施工，并承诺对因开发数量不足引致的损失负赔偿责任。投资管理由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在开发期间，它要负责控制向发行人支付发行收入的节奏，以确保与地产的开发节奏大体同步，同时它还要监督三亚开建按规划设计标准及预定时间完成开发；在开发完成后，管理人要组织销售地产，并保证地产售价的公正性、合理性及竞争性。地产销售的方式分两种：若三年之内，年投资净收益率不低于15%，则管理人代表投资人行使销售权；否则，则在三年之后由拍卖机构按当时市价拍卖。本次发行工作所聘请的顾问是中国管理科学院投资与市场研究所，^④它负责为投资券的发行提供可行的方案，下面将介绍它对一些特殊问题所提供的特殊处理方案。

三亚地产投资券于1992年10月20日至10月31日在三亚、海口两地向持有三亚市身份证的居民（含郊区居民）以及海南的法人团体发行，每张身份证限购一张投资券（面值1000元）。^⑤这种做法体现了让当地广大中小投资者有选择权的初衷。在1993年3月13日的上市公告书中公布的个人股为

1912.4 万股，占总发行额的 9.56%，其余皆为法人股。

当时预计 1992 年 12 月动工开发丹州小区，1995 年 8 月 5 日前完成开发，清盘日期为 1995 年 11 月 10 日，清盘时一次兑付。开发后地产销售收入及相应的存款利息在扣除了管理费（按销售收入超出发行基价部分的 5% 计算）、应付税金、手续费、土地过户费以及地产销售或拍卖费（按投资券额的 1.3% 计算）之后，就是投资人的投资收益。

三亚地产投资券的成功发行，除了因为投资者对投资券有较好的收益预期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亚市政府自始至终的大力支持。首先，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在 24 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对发行投资券所需各项文件的当地审批工作，办事效率之高，可谓惊人。其次，为促进投资券的顺利发行，三亚市在确定发行投资券之初即召开四套班子会议，会上要求党政领导要以身作则，严禁在发券问题上以权谋私；随后，市政府组织召开三级干部会，就发券事宜向全体干部做了详细解释并宣布有关各项纪律，这两步措施消除了投资券发行中来自政府方面的干扰。第三，为使当地群众能对投资券这一新型投资品种有更多的了解，三亚市的宣传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当地报纸《经济协作报》登载发行顾问的文章，解释投资券的来龙去脉，当地电视台也连续 10 天播放此类解释性的节目。另外，在发行期间，三亚市领导还不断视察各发行点的情况，并随时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发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了投资券的顺利发行。可以说，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我们很难想象此次证券化融资能在从来没有发行过证券的“天涯海角”如此顺利地实现。

政府的深度介入虽然有力地保证了投资券发行的成功，但也使该券的发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在发行中出现了转轨经济中常见的现象：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交织。这种交织带来了成熟市场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发行顾问提供了特殊的处理方案。

首先一个问题来自于三亚市的机关干部和外来企业家。他们在三亚辛勤工作，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许多机关干部和外来企业家来自外地，并不拥有三亚当地的身份证，因此他们无法在市场上购得投资券。而无端地剥夺他们投资获利的权利既不合理，也容易诱发腐败，干扰投资券的顺利发行。为此，在投资券公开发售之前，提前让愿意购券的机关干部和外来企业家到组织部、劳动局和人事局登记，准许每个限额购买一手投资券，但不许自己到登记点私下购买。通过这种方式三亚的机关干部与外来企业家获得了与当地居民同样的投资权利。

第二个问题与驻三亚的部队有关。三亚当时的双拥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军政、军民关系比较融洽。在房地产开发大潮中，军队为地方的发展做出了牺牲：他们让出了亚龙湾等无以伦比的海岸风景地，以做开发之用。为了借此事对当地部队有所报答，也为了给三亚争创全国双拥工作模范城的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发行顾问做出如下安排：分出 800 万元的指标专供当地部队选择，具体办法是：由有购买意愿的军官到军人服务社登记，军人服务社与三亚开建签订代持协议，部队所购投资券由市开建代持。部队有两种处理该券的选择：部队持有一个月，然后三亚开建以溢价 15% 的价格购回；若有服务社愿

长期持有，则由三亚开建代为长期持有，按服务社指令来售出，并将获得收益金额支付给服务社。

最后一个需要特殊对待的是拆迁户。客观地讲，拆迁户是这次开发的受损者，如果不给予适当补偿，将来他们面对地产的急剧升值，心理上势必难以平衡，从而极易产生社会矛盾。一个容易想到的补偿办法是专门分给拆迁户一定的认购额度，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拆迁户对投资券所知有限，大部分的拆迁户对购买投资券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方面加大对拆迁户的宣传力度外，发行顾问还安排市拆迁办代为认购 500 万元投资券。在清盘以前，愿意购券的拆迁户可以凭证明手续到市拆迁办购买；在上市以后，市拆迁办可将存留的投资券变现，将所得投资收益按每户人数分发给拆迁户。通过实施这种带有期权性质的补偿方案，在不大量增加当地政府和开发商负担的前提下，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拆迁户的补偿问题。

投资券的收益预期、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对特殊问题的恰当处理，这一切决定了这次证券化筹资是一次成功之举。通过发行三亚地产投资券，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证券化其地产销售收入，使得筹集开发资金的目的顺利实现；而在当时看来，当地的中小投资者也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投资机会：资产证券化给双方都带来了机会。

三、对案例的进一步分析

从此次筹资的结构安排来看，三亚案例明显具备了资产证券化的某些本质特征。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总的来说，三亚开建以丹州小区 800 亩土地为投资券的发行标的物，将开发后地产的预期销售收入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这样一种

安排是与资产证券化的筹资思路相吻合的。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作为投资管理人的汇通国投承担了相当多的担保责任。在发行公告中，向投资人承诺，对“发行人因产权纠纷或债务纠纷等引起的地产开发延期…损害投资人的利益”负“直接赔偿之责任”。因此，尽管本次筹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成立 SPV，但汇通国投的上述担保措施实际上发挥着与“破产隔离”同样的功能。此外，汇通国投还持有清盘前不得动用的 3000 万股法定冻结户，并控制着向三亚开建支付发行收入的节奏，这些都是有助于信用提高的措施。

三亚案例又是一次不规范的证券化融资过程。资产证券化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政府不宜过多参预其中。但这次证券化却是在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下进行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政府的参预使这次证券的发行有着浓厚的福利分配的色彩，发行顾问对三种投资者所做的特殊处理则更是体现了此次筹资所具备的转轨经济特征。从技术角度讲，三亚案例也表现出诸多不足：筹资过程中没有一个机构明确承担 SPV 的角色，以规范地实现地产的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由于当时投资者对海南地产的开发前景极为看好，加之金融市场建设的严重滞后，三亚地产投资券并未经过信用评级即面向市场发行，发行人实现信用提高的愿望也就不那么强烈，因此对投资券所采取的信用提高措施也是不明确、不完善和不充分的，尽管这并没有影响到投资券的顺利发行。虽然三亚案例有着种种不足，但考虑到它毕竟发生在 1992 年的中国以及当时的转轨经济大环境，上述的缺陷与不足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且不妨碍我们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资产证券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促进资产在获取资金方面的竞争, 证券化的成功实现必然是以被证券化资产的良好收益预期为前提的。对缺乏良好收益前景的资产所进行的证券化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此时的资产支持证券不可能在市场上畅销。三亚案例亦不例外, 如果没有房地产热中投资者对三亚地产未来开发收益的良好预期, 投资券便不可能顺利地发售出去。但随后不久的宏观调控使得该券在二级市场的价格长期低迷, 也使得该券推迟了收益分配的期限, 可能最终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证券产品。因此, 期望依靠引进资产证券化技术来解决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及呆滞帐问题, 或是用以改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这是与资产证券化的内在逻辑相违背的, 也是对资产证券化本质的一种误解。在中国推广资产证券化所必须牢记的一点是: 资产证券化可以用来盘活流动性差的资产, 但绝不应该用来盘活质量低劣的资产。

在前面对三亚案例的描述中, 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在这次证券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概括起来讲, 三亚市政府的作用在于它为此资产证券化过程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尽可能地减少了来自各方面尤其是行政方面的干扰。然而如果在中国大规模推广资产证券化, 就不能指望每一次证券化操作所需的良好外部环境都能靠类似的政府支持来获得, 更何况政府支持往往是非制度性的, 获取这种支持所需花费的成本以及这种支持可靠程度的高低都将直接影响到证券化的运作进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 让制度性的法律支持而不是非制度性的行政

支持来确保实施资产证券化所需的外部环境。同时, 严格的法律保障还可以规范资产证券化的运作, 完善其交易架构, 防止资产证券化成为某些人的新型“圈钱”工具, 进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就此而言, 尽快建立完善的信用评级制度乃是当务之急。

三亚案例中发行顾问对特殊问题的特殊处理方案, 虽然是资产证券化在转轨经济中不规范的表现, 但它从另一个方面也表现出中国早期投资银行家们的创造性和应变力。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可以预料, 在以后的证券化操作中, 投资银行家们可以不必再为这类“特殊问题”而煞费苦心。但资产证券化毕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融资业务, 涉及证券、担保、金融等多个领域, 它对操作人员提出了较高的素质要求。尤其是当跨越种种壁垒面对国际资本市场实施资产证券化时, 就更需要不但熟悉资产证券化的国际规范而且有较高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投资银行家来操作。●

①《美国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制、特点和积极影响》, 刘入领、胡章宏, 《投资研究》1998年第2期。

②③《资产证券化对中国的启示》, 杨大楷、张效梅、杨纲, 《上海综合经济》1998年第2期。

④该所所长是北京大学肖灼基教授, 本次发行中现场主持顾问工作的是何小锋、方风雷、陈英明、查向阳、张兴武等研究人员。

⑤有关发行及上市资料见《海南日报》1992年10月16日, 11月12日, 1993年3月13日。

责任编辑: 谭湛明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制度化取向

□ 唐兴霖 李东辉

(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510275)
(广东鉴江经济开发区高级经济师 525100)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前，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势与任务的变化，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力关系作过多次调整，大的有三次：第一次起伏发生在建国初期，这次变动初步建立起了单一制国家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第二次起伏出现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这次变动主要是简政放权，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第三次起伏出现于 60 年代末，这次变动又是主动向地方下放权力。上述三次变动是在未能打破既定的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体制内进行的纵向行政权力调整，只能是行政体系内的动态平衡。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了新的改革。由于过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改革，都没有涉及到党、政府同经济组织、群众团体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因而新一轮改革强调首先解决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调整分配关系入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79 年 4 月，中央决定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赋予了地方一定财政权，调动了地方政府组织收入和自求平衡的积极性。同时在财政上率先对企业实行减税让利政策，

允许不同地区企业之间开展竞争，打破地区垄断。此时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地方集中统一的均衡性财政分配体系，变为分散自主的非均衡财政分配体系。地方政府需要在财政上自求收支平衡，面对着权力下放，地方权力扩大，地方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大为增强。

1980 年中央放松外贸、投资、借贷、经济决策权，这方面改革对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影响。1971—1979 年间，国营企业的预算内投资是预算外投资的 2 倍。相反，1980—1984 年，国营企业预算外投资比预算内投资高出 40%。1982—1986 年的 5 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的一半以上由中小型集体企业而不是由国营企业所创造，工业总产值增长 1/3 系由乡镇企业所提供。1978 年国家计划机构和财政部门控制了全国投资总额 76.6%，随着银行政策引入，这一比例下降到 33.2%。

1985 年银行被授权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以此取代中央政府直接向地方投资方式，但由于省级银行归中央银行，最终是财政部直接领导，同时它又归省财政厅和省政府领导，后者对分行影响具有优势，因为它与分行的官员有日常接触，而且，后者对省级分行的物资供应及在服务 and 人事调配方面握有相当权力。这使中央宏观调控措施出现失控，在

中央紧急催促收紧银根的时候，省政府经常向省分行施加压力，要求扩大贷款。

1988年的新税制改革，中央简单地将企业承包机制引入财政体制，收入采用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使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者与国有资产所有者双重职能大大加强，成为地区的共同利益主体。出于增加地方收入考虑，资源的配置服务于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包干制的另一致命之处是引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弱化。由于包干制首先包死了中央财政收入，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既没有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又没有随财政总量增长而增长。中央财政占 GNP 及全国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财政收入占 GNP 比重从 1979 年的 26.7% 下降为 1992 年的 16.6%，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由 1981 年的 57.6% 下降为 1992 年的 45%。同时，各地区差距逐渐拉大，造成地区与中央、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矛盾加剧。

总之，1979 年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其主题就是将下放中央权力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归纳起来包括：

1、下放中央政府的部分财权，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和支配权限。推行多种形式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扩大地方的财权。从 1980 年开始，中央改变了统收统支的政策，区别不同情况的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改革措施（1980—1985 年）；实行划分税为基础的总额分成包干，即“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改革措施（1986—1988 年）；分别按情况实行“定额补贴”、“定额分成”或“总额分成”等办法，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实行“包死基数、逐年递增、多收自留、定额补助”的政策（1989—1993 年）。这样就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扩大了其财政管理权。1994 年起实行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与税收关系。

2、下放中央政府的部分事权，在扩大地

方利益的同时，加重其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责。下放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一部分固定资产审批权、物价管理权和统配物资的品种和数量、对外贸易的外汇权、旅游事业的外联权和签证通知权等。

3、对某些地区切块下放中央经济特许权力。这里有 5 种形式：（1）1982 年起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经济特区（后增加海南省）。（2）1984 年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等 14 个沿海沿江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带，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3）在内地各省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实行特许政策。（4）对 16 个中心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5）对有条件的 150 多个城市实行市管县体制，扩大政府的职权和地域管辖。

4、下放政府某些人事管理权。改革开放以前，中央直接管理到地方的地厅级行政官员的选拔、任命和日常管理。1984 年中央决定将这一级领导的管理权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管理，省一级政府领导也将县一级领导的管理权下放到市地（厅）里进行管理。

5、下放一大批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前，全国绝大多数的国营骨干企业是由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控制的。这些骨干企业不但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陆续把绝大部分国营骨干企业下放地方政府进行管理。这些企业的下放不但给地方政府带来收益，而且也给地方带来了高质量的管理人才和大量的经济信息。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其影响是巨大的。这影响包括积极的正面效应和消极的负面问题。

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效应就其积极意

义方面来说,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中央政府从过去日常具体而繁琐的对地方计划、管理和干预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使更好地规划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更好地科学决策成为可能。

2、初步形成了地方利益驱动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文化和当地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加重了地方的政治责任感和经济压力。

3、由于形成了多层次的不同范围的决策群体,并把这种决策与地方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就使这些决策更加慎重、更加有效率、更加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从而在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央的压力,也减少了决策过分集中统一的风险。

4、国家和社会在地方的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更为明显。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承受本地民众要求发展地方事业,改善生活水平的压力,也要承受周围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事务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压力,因而形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大力发展当地经济的局面。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以权力下放为基本内容的调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但也导致了一些负面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1、就中央政府方面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减弱,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中央政府的计划手段减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物质分配权,可下放给地方政府,或交给企业和市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金融调控手段与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资源难以左右市场的发展,中央可利用的经济杠杆手段比较薄弱。这些都与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中央政府方面的问题往往是由于中央政府在权力下放过程中未能科学周密规划造成的。

2、就地方政府方面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过程中,由于中央

政府未能适时建立起宏观调控体系和实施有效的监督,未能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由于地方利益乃至小集团利益驱动的误导,而引致了某些地方政府的变异行为。

第一,从本地狭隘利益出发对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由于中央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而且区别不同情况,划定承包基数和上缴额度,这就成为一些地方经常不断地向中央讨价还价的借口,把包干基数尽可能压低些,少上缴中央财政一些地方收入,多争取一些中央资金、项目和物资。这种无休止的讨价还价,造成了对全局调控的消极影响。

第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中央政策符合本地利益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不执行。如一些地方政府随意扩大税收减免范围,放松对企业的财务监督,从而人为地制造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以基金等形式来大搞预算外资金,预算外资金就成为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这样,地方政府盲目上基建项目,导致宏观失控,全局受损。

第三,分割市场,搞“诸侯”经济割据。如为了禁止本地资源外流,不少地方政府往往动用公安、交通管理、工商行政、税务等机构来封锁和争夺资源,一时间关卡林立,禁运通告接踵而至,各种争夺原材料的大战出现;禁止外地商品“侵入”本地市场;追求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制等等。

三、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调整的制度化取向

改革开放后以权力下放为基本内容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引致的负面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要从根本上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以权力下放成果为基础,逐步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度安排新体制。

首先,确立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新体制的基本原则。主要有:(1)市场基础原则。

新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要充分体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有利于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2)中央与地方权责对称原则。在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济管理权和财力最终支配权与事权相对称。(3)集中与分散相协调原则。坚持适度集中和合理分散相结合,协调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当然宏观经济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4)法律规范保障原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决策权、管理权的具体划分和调整,都要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经过法律程序,明确规范,保持相对稳定。

按照以上原则,建立中央与地方关系新体制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改革,建立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合理分权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具体说来:

一是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根据责权利一致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完善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有:(1)加快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因为,它可以通过扩大中央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量和范围,解决地方财政无法自求平衡的矛盾,促进地方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促进公平和效率的实现;同时,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明确的政策目标、规范而科学的技术标准等,可以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促进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优化方面,显示较大的宏观调控效果。如美国,联邦补助占各州政府收入的1/4,补助重点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可见,转移支付乃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是财政制度的重中之重。(2)健全和完善预决算制度。要对某些事权划分不尽合理的地方给予调整,财

政支出划分错位也要随着事权的明确而加以调整。凡属中央政府事权范围而由地方财政安排支出的项目,应划归中央财政支出,凡属地方政府事权范围而由中央财政安排支出的项目,就要随着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划归地方财政支出。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事务,要明确各自负担项目和出资比例。总之,要用预决算制度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行为。(3)进行管理权限的改革。中央集中过多本属于地方的管理权力,按照分级预算管理要求,地方政府不仅应拥有各地方分税征管权,而且还应拥有那些不影响全国统一政策的地方税种立法权以及某些地方税的税收调整权和减免权。总之,要建立合理的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

二是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体制。我国近20年的改革,基本上建立起了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调控体系。但由于人民银行特别是各分行在很长时间兼有行政和货币经营职能;分行按现行行政区划设置,既不利于宏观调控,也不利于统一金融市场的发育,有些地方或越权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绕过人民银行的管理,直接向企业融资;或直接干预贷款决策,造成金融体制外运行,宏观调控难以贯彻执行。因此,应该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经营机构并存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就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权限来说,主要是实行两个分开,即地区性银行和全国性银行分开,中央银行与地方政府分开。

三是完善中央与地方的投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已成为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中心。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主导经济逐步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向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投资决策权已成为一个主要特征。与此相适应,国家投资

的资金也由单一的预算拨款转向国家银行的间接融资,以及包括债券、股票等其他形式自筹资金等多种渠道。但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未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行政干预,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体系仍占投资总额的70%。中央与地方在投资方面依然存在下列问题:中央政府负责投资范围过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承担不协调;中央与地方联合投资缺乏科学的制度。因此,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政府投资应限制在提供公共物品、平衡经济以及导向型产业上。对于竞争性投资领域,政府必须退出,将融资推向市场。其二,中央下放投融资权,加重地方政府的投资责任。基于事权、财权一致原则,把中央与地方投资责任划分与财政分配关系调整结合起来,与分税制和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相适应,加重地方政府承担基础性设施的能力和 responsibility。其三,建立有效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在对投资总量、结构的调控中,实行中央统一确定调控目标、中央和地方两级负责原则。中央负责制定宏观调控总体目标和方针,采取全国性政策措施,省(区)政府主要承担本地区投资总量和结构调控,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顺利进行。

四是完善监督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体系。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并不是让地方不受制约。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因此中央政府负有对地方政府实施管理和监督的重要责任,实际上在实行分权制后,这种监督责任更为重要。根据中央政府监督的性质和行使方式,可以分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是指国务院机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对地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司法监督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控告对地方政府

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的法律审查和监督。就目前来说这两种监督都很薄弱,亟待加强和完善。

五是提供制度化的政策安排。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制度化的必要前提,而制度化,则是经济关系合理化,目的是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制度化安排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中央的权威,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央权威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秩序安排,这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化政策安排的两个方面。首先是权威保证。我国市场化改革是在地方分权化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没有中央权威,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地方主义的封锁,也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改革的深入,市场作用的扩大,使得原有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幅度越来越大,程度也越来越深,特别是不同地区、行业、经济形式发展上的不平衡,造成差距扩大、收入悬殊问题,面对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的资本结构重组,必须依靠国家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不断强化地方的利益就可能损害国家经济的统一性。同时,通过权威来激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政治,又是使发展中国家顺利进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由此,制度化过程中必须有中央的权威。其次是秩序供给。国家必须在现代化的快速变革的过程中,提供社会有序发展的秩序结构。在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制度安排不断规范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法律化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完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用法律形式来具体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并运用法律的程序来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争执,可以设立行政法院或宪法法院进行法律管辖。●

责任编辑:谭湛明

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

——记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

□ 高 岚 李 群

(华南师范大学 510631)

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12月16日至20日，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与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由国际分析心理学执行主席 Murray Stein 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申荷永共同策划与组织。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代表 John Beebe、David Rosen、Stan Marlan，以及加州东——西方整合学院院长 Leland van den Daele 等 20 几位国外及港台学者，张粹然、万玮、曹础基、刘伟林、傅剑平、龚隽、唐似葵、喻阳、刘鸣、申荷永等 30 余位内地学者，以及华南师范大学校长颜泽贤、副校长黄锦能、王国健，广东省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许尚侠等，均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主席由申荷永担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 Luigi Zoja，国际分析心理学的学术委员会主席 Murray Stein，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任主席 Thomas Kirsch，瑞士爱诺思基金会主席 Christa Robinson，美国超个人心理学研究院院长 Robert Schmitt，夏威夷东方智慧研究院院长 Gordon Becker，以及《周易研究》主编刘大钧，《学术研究》主编刘斯翰，

《中国文化》与《世界汉学》副主编任大援等，海外学者吴怡、刘耀中、James Hillman、Michel Bone、Bert Raven 等均向大会发来了贺词。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 Luigi Zoja 在其对大会的致辞中说，“荣格分析心理学，早已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我相信，若是荣格教授本人得知你们正在举行的这样一次会议，也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即将作为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下届主席的 Murray Stein，也致辞说，“我希望，这只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系列性研讨会的开端。当然，西方心理学已经从中国文化思想中受益匪浅，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目前正在开幕的这次会议中所从事的对话性研讨，能够在将来达到东——西方之间更为深入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影响。”瑞士爱诺思基金会主席 Christa Robinson 在其对大会的致辞中说，“这次会议也是一种特殊的机遇，为我们开启一种具有无限意义的相互交流的体验。以此为基础，真正的会议将会超越可能分隔我们的种种障碍，而在人们的交流与理解之中产生。因而，我们相信，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将能

够为此目标做出重要的贡献。”美国加州东——西方整合学院院长 Leland van den Daele 说，“尽管荣格本人非常欣赏与推崇中国文化的心理学意义，但是这种丰富而深刻的意义还远远未被充分地吸收到分析心理学的体系中去。荣格的态度是对我们后代心理学家的一种启示，荣格的欣赏是鼓励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必将成为东——西方心理学沟通与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大会的会标以汉字“思”的象形为设计原型，所要表达的正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整合性意义，以及东——西方心理学沟通与交流的象征。同时，在“思”的象征中，既包含了头与心的沟通与整合，也包含了意识与潜意识的沟通与整合。这正如颜泽贤校长以及王国健副校长所阐述的，“东西方文化，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潜在的一致性。作为其不同，可以成为我们相互学习的理由，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与交流来相互补充；作为其潜在的一致性，可以作为我们共同努力与探索的目标。”实际上，这也正如分析心理学工作的目标与目的，追求一种对人类心理的整合性的理解，并且致力于促进这种整合性的发展。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与华南师范大学早已有着友好与成功的交流与学术关系。1994年，通过心理系的申荷永教授，颜泽贤校长曾经邀请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当时的主席 Thomas Kirsch 和名誉秘书长 Murray Stein，以及美国旧金山分析心理学研究院院长 Jean Kirsch 等访问中国，并且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了学术研讨会。Thomas Kirsch 当时的报告题目是“荣格与道”，Murray Stein 则系统地介绍了荣格心理学的思想与体

系。颜泽贤校长、王国健副校长，以及当时的广东省心理学会理事长许尚侠教授等均参加了研讨。

召开“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最初思路，便是由即将担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下任主席的 Murray Stein 提出的。他在 1997 年 4 月曾经邀请美国德州大学的 David Rosen 和申荷永到“芝加哥分析心理学研究院”共同主持关于“荣格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式研讨会。为期一周的“对话”式研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或者说东——西方心理学是深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同年 6 月，瑞士爱诺思基金会也专门邀请申荷永前往瑞士的艾斯考纳，为“东——西方文化圆桌研讨会”主讲“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传统”。与会者大都是分析心理学家，中国文化的心理学意义，以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也正是大家所共同关心与关注的问题。这也正如美国加州东——西方整合学院院长 Leland van den Daele 在其大会致辞中所提出的：“这样的会议不但能够启迪西方学者深入地学习东方文化，而且也能够向中国学者传达一种声音，使其珍视对于中国文化中和谐与微妙的象征性与心理学的理解。”

这次国际研讨会以“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为主题，以促进东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心理学的交流、理解与整合为目的。8 位国外学者和 6 位内地学者分别进行了大会发言，并和与会者一起进行了对话式的研讨。

安排在 17 日上午的大会发言，有 IAAP 的代表 John Beebe，他的报告题目是“荣格与中国”（Jung and China）；申荷永的报告题目是“心理学与心理整合性”（psychology of Heart & the Wholeness

of Psyche); 以及香港大学心理系的 Geoff Blowers, 他的报告题目是“荣格心理学在中国的展望”(The Prospects for a Jungian Psychology in China)。John Beebe 本人曾经在 40 年以前在中国南京生活过几年, 他在美国旧金山的分析心理学研究院讲授“中国哲学”, 对于易经以及宋明理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报告不但追溯了荣格与中国的关系, 荣格从中国文化中所受的影响, 同时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对于分析心理学学者, 以及对分析心理学未来发展的潜在意义。申荷永以“心理学”(“Psychology of Heart”)来表达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思想与体系, 并且揭示了中国文化心理学中所包含的心理整合性意义, 以及这种心理整合性对于分析心理学的启迪。他本人曾经以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 并在美国的旧金山荣格研究院进行分析心理学的学习与训练。Geoff Blowers 总结了分析心理学在中国的传入及发展, 有关的翻译与研究, 比较了分析心理学与经典精神分析的发展, 并且对分析心理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展望。

17 日下午的大会报告由华南师范大学的曹础基教授开始, 他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文化中道的传统”。接着是美国德州大学的 David Rosen, 他的报告题目是“荣格与道”。《荣格与道》也正是 David Rosen 的代表著作, 他透过丰富而生动的图片资料, 以“道”的思想为线索, 展示了荣格一生寻道的心路历程, 同时也表达他自己对于心理分析和道家思想的追求与理解。David Rosen 说:“我长期以来深受道家思想的吸引, 当我第一次读《老子》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在对我说话。”而作为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与参加“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

国文化国际研讨会”, David Rosen 充满了激动与激情, 认为是实现了他童年的梦想和由来已久的心愿。随后, 华南师范大学的龚隽, 为大会作了“中国禅宗的基本精神”的报告, IAAP 的代表 Stan Marlan 进行了“道的实践与荣格心理分析”的主题发言。

18 日上午, 华南师范大学的傅剑平做了“《易经》、儒、道与心理学”的报告, 提出了许多与会者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美国分析心理学家 Serge Polakoff 做了关于“荣格心理类型与易经”的报告, 美国华裔学者 May Lee 做了“《易经》、儒学传统与心理分析”的报告, 德国分析心理学家 S. Wiedeman 为大会做了“心理分析与道的启示”的报告。18 日下午, 与会学者参观访问了广州光孝寺, 并且与广东省佛教协会秘书长明生法师, 大佛寺主持耀智法师等进行了精彩的座谈与研讨。会议的后两天, 在肇庆七星岩的松涛宾馆举行, 期间赴新兴县参观了六祖惠能出生地及国恩寺, 并且与国恩寺如禅法师等进行了关于禅宗方面的探讨与交流。禅师杨佛兴做了“禅的精要与禅的修持”的报告; 仍然在瑞士荣格研究院学习的万玮, 做了关于“当代分析心理学的国际发展”的报告。

大会的总结发言由 IAAP 的代表 John Beebe 组织, 他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功。正如爱诺思基金会主席 Christa Robinson 在其致辞中所表达的, 真正的会议将超越会议的形式, 而成为一种永恒的象征性意义。“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 或者说“东西方心理学”的沟通与交流, 必将为一种整合性的心理学做出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 冯 生

论价值转化在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 宋天和 郎乃瑞

(黑龙江省党校副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150080)

一、知识经济时代价值转化的内涵

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或称为三次浪潮,概括为三种经济形态: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称为农业经济,其特征是少数人依靠对土地控制,对奴隶占有获取巨额财富;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称为产业经济,其特征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制造业的出现,少数人靠自然资源、运输工具等来积累财富,出现了“石油大王”、“汽车大王”等富豪,其资产是有形的;第三次浪潮是科技革命,称为知识经济,其特征是比尔·盖茨微软公司的出现,把知识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其资产是无形的(知识型)。以知识为基础,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及应用的知识经济,将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自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系列高技术革命,已经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节奏和面貌,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对人类的记忆功能提出挑战,过去由人脑存储的信息完全可以由电脑代替,人类需要更丰富的超越于记忆的复杂的智力活动,特别是要培养人们的分析能力,综合判断的能力和全面

创新的能力,通过知识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使人们能够创造性地工作和生活。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客观世界对人的意义,所以就其本质而言,价值不是实体范畴,而是表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即关系范畴。这种特定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客体的属性和功能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如果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对主体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意义,并有利于主体的存在、发展和完善,那么,对主体而言,该客体就体现出对主体的价值。相反,如果客体的特有属性和功能不仅不能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而且妨碍了主体实现某种需要,该客体对于主体就有消极的否定的意义,即无价值。

知识是有价值的,知识价值是由包含在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或智力密集程度)决定的。知识密度高的产品或服务因其附加值高可以要求额外的费用,其价格大大超过知识密度低或含量低的传统产品。比如,集成电路块的制造成本大约70%是知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微芯片所使用的材料只占整个生产成本的1—3%,但可存放2年《人民日报》的信息量;50—100磅光纤电

缆传递的电话信息和一吨铜线传递的一样多，而生产 100 磅光纤电缆所需的能源只及一吨铜线的 5%。这说明知识能大大增多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来自知识价值。价值是事物在与一定主体的关系中产生的比较隐蔽的属性。价值转化工程的根本目的在于将知识价值的隐性形态转化为显性形态。价值转化的本质内涵是知识的创新。

知识积淀加上思维灵感就会产生突变，突变的结果就是知识的创新。所谓创新，是指敢于冲破旧思想、旧观念、旧模式的束缚，具有解决新问题、获得新成果、开拓新局面的思想和主动精神，在复杂、迷茫、艰苦的情形中有所发明、有所突破。知识创新不仅要求人们具备丰富的想象、活跃的灵感、敏锐的洞察力、独特的求异本领、顽强的探索精神，还必须具有丰富的基础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强烈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本身具有其个体性，它是个人所特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因此，创新精神受制于个性的发展。创新不是单纯通过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来获得，而需要将多种方式紧密结合。特别是非逻辑、非理性的灵感和直觉在创新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其价值转化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需要具有雄厚的高新技术知识，这是实现知识价值转化的基础。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是以加工和消耗资源为基础，价值的转化主要体现在对生产工具与加工技术的革新上。那时候，谁拥有更多的资源，谁就掌握了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金钥匙。知识经济则打破了物质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束缚，经济增长从单纯依靠物质资源和加工技术，发展到越来越依靠高新技

术知识的创新。在美国，人们普遍重视高新技术知识的摄取和积累，层出不穷的知识创新造就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转化。高新技术知识在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宇航技术等领域的价值转化已被广泛的实践所证明，这使美国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1998 年 2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最高决策层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揭开了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序幕。所谓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公共和私有部门组成的制度网络，其活动是为了创造、改进和扩散新的知识和技术。其中政府政策、企业、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是这一体系中最重要要素。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由四大系统构成，即：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知识应用系统。其中知识创新系统是关键环节。为此中科院制定的《知识创新工程》提出，中国将在 2005 年前后重点建设 100 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立科研院所，20 个跨学科、跨地区国立综合研究中心和 10 个国际知名的教学科研大学。在 2010 年前后，中国知识创新整体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目前中国政府对科研投入还较弱。中国 GDP 的 1% 投在科研上，而世界平均水平是 2%，我国高新技术的占有量与世界先进国家也有很大差距。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价值转化工程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发达国家价值转化工程模式，而应明确认识、科学发挥价值转化的经济增长作用和竞争增强作用，通过这些作用的外溢跨越式地完成工业化的历程，用 21 世纪经济主流的知识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华民族屹立于

世界发展潮流的潮头。

二、价值转化的经济增长作用

面对 21 世纪的即将到来，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难题可能得到解决。资源短缺、能源枯竭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威胁，而知识价值转化的经济增长作用将改变这种局面。工业经济时代的工业化生产具有规模效应的特点，经济指标的增长是通过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能源和资源来获得。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经济衰退和资源枯竭。作为资源的自然物，在地球的范围内是有限的，而且许多不可再生资源 and 能源即将枯竭。而作为人类头脑产物的知识，其增长可能性是无限的。而且事实表明，人类知识的增长日益呈现加速度的趋势。许多自然物质资源（如石油、煤炭）只能一次性使用。而作为资源的知识，却具有与此相反的特性：它不会因被使用过而消失，因而可以成为人人共享的东西，当掌握了高新知识的智能劳动者成了社会的主体，知识创新就成为价值转化的主要因素和动力机制。由此可见，价值转化直接推动着经济走向可持续增长道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知识价值转化作为经济增长的资本，知识的创新可以替代物质的投入。体现于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知识经济时代把知识价值转化看成是资本的积累，面对知识经济，人们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掌握知识、加速科技知识创新，就是扩充经济资本，尤其是科技开发推进和高新技术引进必须是快速和高效的，否则，慢了就会影响知识价值的转化，就会减缓经济的增长。

一些发达国家较早地注意到并有效地利用了价值转化的经济增长作用，通

过创新知识获取的巨额回报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创新知识可以开拓出高技术、高能量，进而使新型产品投入少、产出多，更新步伐快，普及周期短。许多类似于电脑、影碟机的高价值商品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会变得畅销化、大众化。如今的电脑价格只有 20 年前的万分之一，现在的影碟机价格只是两年前的三分之一。21 年前，美国发射到火星的“海盗号”耗资 10 亿美元。而近年的“探路者号”登上火星，仅花费 1.8 亿美元，节省损耗 5 倍之多。这都是创新知识价值转化的结果，创新知识的价值转化体现于能量的增值、消耗的降低。而许多资源、能源都是一次性的不可再生，创新知识却是永无穷尽的链式反应，不断加快经济的增长。

从美、德、日三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历程来看，我们足可见创新知识价值转化的经济增长作用。美、德、日三国是知识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度。当我们还在束缚个人的智慧，压抑个人潜能，限制个人自主创新的时候，它们早已高扬人的个性发展，激励人的创新精神，人才的辈出、知识的创新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国家经济的崛起，推动着自己的民族走在世界的前列。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引进欧洲技术开始的。南北战争以前，美国虽然拥有电锯、收割机、转塔车床等一些发明与技术，但都没有超出欧洲的技术框架，更没有基础理论知识的创新。面对现成的欧洲技术，尽管直接引进可以节省教育投入和基础研究费用，但是美国还是选择了对外以保护主义来扶持本国工业的自强能力，对内实行调控政策，以政府的投入促进本国教育科技的发展。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案，旨在促进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这些法案对美国知识经

济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德国在建立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转化的实现机制方面,选择了教育和科技均衡投资这种模式,使得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得以持续增长。这对生产力三要素的优化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的高教育含量,生产能力的高科技含量,必然产生知识的相互连接、渗透、组合、集成、交融、演化,从而形成新的知识。即使是“老化”,知识还可以再开发,成为嫁接、培育新知识的“砧木”,可以引发新的知识火花。日本的迅速崛起,除了众所周知的政府对教育的大量投入外,还有一个最显著的成绩是政府对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高。日本政府对企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投入主要是对高科技产业的税收、风险等方面给予相当优惠的政策,实际上等于政府的间接投入。虽然日本政府对企业科技投入只占科技投入总额的11%,但产出率却高于美国。这也正是仅有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日本,能把有6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美国产品捧出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1998年5月,一位研究“知识经济”出名、在美国某公司任首席战略专家的女士应邀到中国讲学。她是第一次到中国,先去四处看了看。她认为,中国的确是个发展中国家,农业还很落后,工业化还要走很长的路。但同时她又惊叹,能够在北京中关村看到知识经济。由此可见,知识经济并非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我们应从自己国家知识经济形成的特点出发,探索经济增长的新道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错过了一次产业革命,为此中华民族在艰辛中渡过了100年,直至20世纪中叶才开始工业化的历程。中国要不再错过历史给予的机遇,就必须高度重视价值转化的经

济增长作用,以一流的创意、一流的产品开发、一流的质量要求和一流的生产管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高。

三、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

价值转化可以使竞争增强,促进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而缺乏这种认识,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无所作为,失去竞争能力将是瞬间发生的事情。现在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全球一体化格局,金融竞争一夜功夫就可以将国家数百亿的美元调得无影无踪。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炒家之所以能以很少量的资金击垮众多国家金融储备,在本质上是智力、知识较量的结果。今后,这种智力化、知识化的金融竞争日趋激烈,不见硝烟的金融战争日显杀机。发达国家已率先进入知识经济竞争领域,如果不警觉、不重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竞争能力。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原先在军事系统的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像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应用数学家、系统分析设计专家等进入华尔街金融机构。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在金融领域得到了创新,那些专门研究判别导弹真假程序的科学家,将这套原先用于判断导弹真伪的程序移植用于判断金融:你这个钱是真的钱还是假的钱?是不是洗的黑钱?结果这项将军事工程科学嫁接于金融工程的试验,传递出了知识价值转化的惊人信息。科学家用这个转变后的程序做的第一次试验是发现了来自中国大陆某银行若干年前有一笔上千万美元的钱被人转走了,几经周转转到美国,而中国尚毫无觉察。虽然这笔被调走的钱后来追了回来,但这是美国人发现的。这件事表明:经济的竞争也是知识的竞争,没有知识方面的优势,你的钱被人家调走了还无从知觉。可以设

想，美国人是否也完全可能利用这些知识将我们辛苦得来的钱轻松调走？可见，谁重视了、利用了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谁就等于抢占了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现代化的硅谷更是这样，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随处可见。虽然许多人自知并非拥有百分之百取胜的把握，但人们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创新思维，以“失败乃成功之母”为铭，乐此不疲地学习、研究、实践。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马耶所说，硅谷之所以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失败乃成功之母”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和信条”。美国高度弘扬创新思维、大力倡导超常规发展模式，这就使得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了优势。美国人在 80 年代一度在汽车工业和传真机方面落后于日本。美国不采取按原来路子追赶办法，而是做电子邮件（E-mail），很快就把日本的传真机打倒了。美日两国关于高清晰电视技术路线上的不同选择，更表现出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两国的不同选择，不只具有技术路线上的正误之别，更重要的是，从中表现出两个民族两种大不相同的思维模式。日本人始终摆脱不了人的被动客体地位，一再在增加画面的扫描线数、改变画面的高宽比例上下功夫。而美国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创新优势，从而获得了成功。

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在美国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较强的体现，它的发展历程就是发挥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的过程。法国学者阿莱库西斯多·托克比尔曾在《美国的民主政体》一书中描述了这种竞争意识，他将知识创新与保守传统作了比较：“美国

的社会体制与贵族社会截然不同。在美国，人人生活得都很惬意，丝毫没有贵贱和等级之分。贵族社会那种虚情假意和逢场作戏，均被美国人嗤之以鼻。什么贵族不贵族，人人都在为更好地提高生活水平而拼命工作。人与人是一种劳动者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任何人都追求权利或利益的平等机会。”与此相对照，昔日主宰世界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却因沉溺于成功的盲目乐观而江河日下，日薄西山。英国曾是掀起世界产业革命浪潮的发源地和先驱，由于企业界被墨守陈规的“创业者一族”所把持，人们的创新思维得不到重视和鼓励。相形之下美国、德国的创新思维日益发扬，知识价值转化为经济竞争增添了活力。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曾谈及，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开辟了新路，他认为：“起步较晚反倒会成为一种优势。那些较晚采用某些技术的国家可以跳跃前进，而且可以避免前人的错误。有些国家永远不会经过工业化阶段，他们直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因为他们设立标准时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尽管没有完善的工业化基础，仍可发挥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在更高的标准上超越不完善的工业化，在更高的标准上超越历史跨度。中国虽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经济基础，但只要 we 抓住时机、充分发挥价值转化的竞争增强作用，就能够达到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从而实现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

责任编辑：冯 生

知识经济呼唤新的社会价值观

□许斗斗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350002)

一

知识经济无论其表现得怎样与以往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它毕竟是人的活动,是社会的活动,都蕴含着社会价值的作用。只是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价值影响其经济活动的认识程度有所不同,以及由于社会基础的变迁使得这些价值思考与关怀的内容有所差异,社会价值的内涵也随之变化而已。人类不仅需要社会价值,而且能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价值观更自觉、更有意识地应用于经济活动中,这是由我们当前把握知识经济时代的内涵及特征所决定的。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对知识和知识经济作了具体的说明。

首先,关于知识,OECD认为有四种类型: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知道怎样做的知识(know-how)和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其中, know-what 是关于事物是什么; know-why 是关于事物的自然原理和客观规律,它是由专门的机构

来获得; know-how 是关于如何做某些事情,或做某些事情的技巧和能力; know-who 是关于谁知道如何做某些事情的技巧和能力。笔者认为,前两种知识都是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它们的正确认识都是真理性认识,而后两种知识是关于“如何做”某些事情的知识,它们涉及到做某些事是否值得和如何做更值得的价值判断,是属价值性认识。我国的有些专家认为,知识除了上述四种类型外,还应加上“知道什么时间(know-when)”和“知道什么地点(know-where)”才更为准确,因为某些事情如果在错误的的时间和地点做,仍会产生错误。①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价值性认识。因此,所谓知识,不仅包括事物“是什么”的真理性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包括事情“该如何做”的价值性认识。后者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它才真正体现了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智慧。当然,没有对事物“是什么”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有些事情“该如何做”的合理价值判断。真理认识是价值认识的基础,而价值认识是真理认识的深化和目的,因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毕竟是为了改造世界,使世界满足

人的发展需要。

由此可见，知识经济的“知识”是由真理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组成，知识经济时代的人类经济活动，不仅需要客观世界和经济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而且需要人类认真地思考怎样做、由谁做、何时做、何地做的价值判断，即需要社会价值的参与和规范，因为人类历史一再向我们昭示了慎重再慎重地应用我们知识智慧的必要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自主性和生产能力都有着质的飞跃，人类从历史的必然性中所获得的自由度将更大，此时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将显得至关重要。

其次，如上所述，为了标识知识与以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OECD对知识经济有着具体的说明，即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在这一说明中，我们知道，当人类应用蕴含新的社会价值观的知识和信息于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整个经济活动过程时，这一过程自然就充满并体现了人类对社会价值的追求。而且，如上所述，经济活动毕竟是人的活动、社会的活动，没有纯粹的经济。人类的社会价值观原本就固存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其中包括主要的经济活动，只是它未能被大多数人甚至是许多理论家、经济学家所察知罢了。马克思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也揭示它对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价值的摧毁，同时他向人们表述了自己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理想社会价值的探索与追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审视，来揭示出在这些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剥削关

系；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来阐明他的整个社会价值观，从而表现出他对人和人类社会的无限关怀和憧憬。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洞见深受恩格斯的高度赞赏，他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②因此，那种只见物不见人，只见人的生产关系不见人的社会关系，只见生产过程不见隐藏其中的社会价值的思维方式显然是肤浅和不足取的。

二

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知识与信息，还是生产、分配和使用这整个经济活动过程，都是内在地含有社会价值并受其规范的过程，那么，作为区别于以往经济发展阶段的知识经济新时代，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呢？笔者认为：

第一，知识价值观。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和最大的推动力。物质的生产过程完全成为知识和智力的物化过程，而物质产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们所含的知识量和信息量的多少。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可以说，人们没有知识资源是无法从事一切经济活动，而仅有物质资源没有知识资源也不能开始生产。知识的价值充分体现在，谁拥有更多更新的知识，谁就拥有更多更大的主宰权。知识和信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因如此，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对知识和信息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对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的重

视。因为正是高新技术产业给原有的经济结构、生产模式以及产品结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还造就了一批新的产业主体，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加快了社会发展进化的历程。

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不可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倘若仅把知识经济的“知识”理解成高新技术知识，这是对知识经济的误解，而倘若仅仅重视高新技术知识而忽略甚至否定知识的广泛性和知识中的社会价值，那就是对人和社会本质的更大误解。知识经济不可能没有对人和社会价值的关怀，不可能没有对人和社会的发展趋势的价值判断，只是关怀的程度、方式和内涵与以往的不同，否则我们将会重演马克思对异化社会的种种批判，重演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反思和弗洛姆对“健全的社会”的期盼；否则它与工业经济时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二，人的价值观。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观体现在劳动、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中，即体现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过程及其对象中。然而，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生产主要依赖于人的体力，脑力劳动比重很小。生产力的低下，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人们大都从事延续生命的自发的重复性活动，人的价值难以展现。而在工业经济时代初期，资产阶级就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了远远超过以往一切时代总和的生产力，较之于农业经济，人的价值得到相对地展现。但是，资产阶级的大机器生产却把人的劳动推向了异化的深渊，使劳动者人的价值也随之异化。劳动失去了为人的宗旨，变成了金钱、为了交换价值

等中间环节。20 世纪的工业经济虽然缓和了上述的缺陷，并在科技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性交往的扩大中给人的价值的展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人类的这些发展与进步却极大地依赖于对诸如石油、煤矿、资金等外在资源或资本的利用，从而又给人类文明带来了负面效应，如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与人关系的疏离等。人对自然资源或资本的过度依赖降低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主动性、创造性，这使人的实践本身受到了质疑，因而由实践活动所体现的人的价值也相应地降低了。

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竞争，既是知识的竞争，更是人的竞争，因为人既是知识与经济运作的核心和目的，又是知识与经济的创造者和承担者。与以往工业经济需要大量资源、资本、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投入不同，知识经济主要是依赖知识与智力，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而知识与智力的承担者和创造者是人，人在创新知识、展现智力中规范和把握着自己时代的发展趋势，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实践能力由此将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实践活动性质的提高是人的价值提高的基础（实践活动性质的飞跃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阐述），因此，知识经济时代是以人为中心的时代，人的价值在这一时代将得到突出的展现。

第三，新的发展观。所谓发展观是指对包括人自身在内的社会发展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它是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观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至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确切地说是到本世纪 70 年代以前，以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并把社会的发展等同于经

济的增长, 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生活的丰富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总体上发展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力, 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 但也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全球南北国家的分化日益明显等社会问题, 以及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生存环境问题。由此, 人们便发觉, 经济增长并不就是社会发展, 无度地开采资源、破坏环境就是毁灭人类自身, 因此, 才逐渐形成了符合当今知识经济这一新发展模式的新的发展观。它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持续的长远的发展观。知识经济时代主张应以持久的获利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准, 反对任何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计甚至损害未来可能发展的行为。它要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要求人们不仅从当代人、当代社会的角度看待社会发展问题, 而且要为未来人、未来社会的发展着想。现在它也注重人类社会发展如社会公平等问题, 已涉及的范围包括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社会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持续的发展问题。

整体的全面的发展观。社会是个有机体, 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应是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发展、全面发展, 是以人、经济、社会和自然为主的社会发展。其中人的发展是整体发展的核心和目的, 经济发展是其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发展中的科学技术发展, 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发展, 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也是解决生态和社会等诸多问题的关键。因此,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标志和支柱。

开放的独特的发展观。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经济的一体化是交往普遍化的结果, 它也必然带来文化、科教及政治发展的世界一体化, 因

而, 任何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可能孤立、封闭地存在着、发展着, 融入一体化世界并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与危机是唯一的选择。因此, 每个国家都要实行开放性的发展政策, 才能取长补短, 相互借鉴, 共同发展。然而, 在这一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 每个国家又不可能在一一切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因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在世界大市场中占一席之地, 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③这样, 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本国不同的地理、文化、价值观等具体国情走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建立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

第四, 新的实践观。以往的实践观被定义为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 在具体理解上, 把生产劳动看作是最根本的实践形式。这种实践观是与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当作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适应的。随着适合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发展观的形成, 人们也发现传统实践观把实践等于生产, 从而成为单纯的改造自然活动的局限性。其实, 生产与实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 “生产”就被视为趋于外在目的的活动过程, 而“实践”则被看作其本身就是目的的生活活动。以这一思路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 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④就可以知道,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对外在事物不是把它理解为外在于人和人的活动, 纯粹的人的改造对象, 而是理解为内在于人和人的活动, 与人的生存与发展休戚相关的部分。这是知识经济时代所需

要的新实践观的一方面，它表明知识经济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另一方面新实践观在于：列宁曾明确指出，“必须把人类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⑤在此，实践不仅是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而且是事物对人有无和有何价值的确定者，由此，实践成为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体，换句话说，实践是在真理性认识基础上的价值的判断者和实现者。那么，作为人类活动目的本身的实践要体现或实现人类的哪些价值呢？从根本意义上说，它应体现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终极关怀，具体而言，它应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合理、协调的交往关系（伦理关系），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发展关系（环境伦理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因为马克思认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世界）。知识经济是一种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更强更显著的经济活动，是一个人类更加超越外在必然性制约而自由自觉活动的时代，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与实践者对真理与价值的选择和追求相联系，是由实践者的社会价值观来统摄和规范的，因而社会价值观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明显，也都显得

必要。

总之，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将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将深刻地感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意义。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⑥因此，知识经济时代仍需我们对科学技术的本质保持必要的追问，对知识的全面性保持正确的认识，仍需人们树立并应用新的社会价值观参与经济的发展，规范社会的进程，因为经济活动毕竟是人的社会的活动，知识经济时代毕竟是人类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

①③吴季松：《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年版，参见第 16 页，第 25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23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

⑤《列宁选集》第 4 卷，1995 年版，第 419 页。

⑥《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第 56 页，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9 页。

责任编辑：罗 苹

论历史叙述在历史学实践中的地位及功能

□ 陈 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200437)

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叙述文本“纯粹被当作是一种言辞的人工制品,它主要是作为一种遥远过去的结构和过程的模型,然而却不再受实验与观察的控制。”^①可见,叙述文本作为一种人工产品,必然与人本身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历史叙述行为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无疑要反映人的某些要求,它们凭借着人工构成的关于过去的结构与过程的模型体现出来。历史学实践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也是生产历史叙述文本的实践。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历史叙述在历史学实践中的地位与功能,从而明了历史叙述与历史学实践的关系。

一、历史叙述在历史学实践中的地位

现代人获知、理解历史的地方也就是历史存在的场所。根据考古学成果可以说明过去某一时段、某一事物、某一意识曾经存在;当代社会习俗、风土民情、规章制度中也大量留存着过去的印迹;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通过语言文字来了解历史。自文字出现

以来,尽管依旧存在着各种非语言形式的历史象征,但通过历史叙述构成的文本成了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场所,尤其对一般人而言,历史叙述文本甚至是他们了解历史的最主要途径,就这种现象而言,说历史存在于历史叙述文本之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无论是在传统还是现代的意义,我们对历史学家与历史学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历史叙述与历史存在的紧密关系摆在了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首先,一般人的意识中往往认为历史学家必定是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即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叙述者,而且他们的研究与授业都与历史叙述文本密切相关,这些文本或是被研究的对象,或是研究成果的外化。为什么我们没有将神话、传说、史诗的转述者(实际上也是史诗的创造者,如维柯所论证的荷马史诗的作者并非某个人,而是一些相继的史诗吟唱者)称为历史学家呢?这是因为现代的观念一直将历史学家与传统历史学技艺联系在一起了。在历史叙述形式中,叙事体、编年体、传记体这些叙述体裁在自希罗多德以来至今,被区别

于神话、传说、史诗，这难道不是一种对历史学实践的狭隘认识之体现吗？在前希罗多德时代的历史叙述还没有获得传统历史学的技艺时，神话、传说、史诗也与叙事史、编年史、传记一样，起到了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传统并保持社会连贯运作的的作用。以研究、考证、撰写为特征的传统历史叙述技艺将它的核心设定于书写性叙述文本，而授课与口头交流是书写历史学的一种补充，历史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近两千五百年中被浓缩于所谓的历史资料（除一些考古的实物材料外，主要是书面文字材料）与历史著作中。

其次，包括传统历史学家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历史学的工作即再现历史过程。当然，这种被再现的历史过程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仍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但是，当人们将历史视为过去发生的事件及其过程时，相对现在而言，它的的确确已然是静止的了，于是人们多少赋予历史叙述一种实现历史学目的的殷切希望，相信历史学家拥有把握与叙述静态历史的能力。这既是对历史学家认识能力的自信，也是对历史叙述的简单理解而得到的自信。

由上所述，传统历史学与历史叙述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有几个致命的缺点。其一，传统历史学极少关注非书面文字的历史叙述，这种状况直到近现代考古材料在历史学中的大量运用与当代口述史学的兴起才稍有改观；另外，有助于理解历史的非书面叙述还大量存在于现实之中，历史学家却很少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关注身边的事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事物与过去的联系使其中埋藏着理解历史的要素。其二，对历史的呆板定义确立了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的二分法，不利

于人们关注影响历史叙述生成的因素，其中包括：历史学家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生存的个体环境与他的意识形成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因素最终都能在他创作的历史叙述文本之形式与内容之中表现出来，从根本上表现了他所认识的历史的本质。其三，对前两者中包含的因素的思考同样适应于针对所谓的原始历史资料的提供者，并且，一旦这种思考在适用范围上进行扩展，那么，我们就无法在历史学家与非历史学家之间以传统方式进行区别。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试图证明他们二者之间没有区别，相反是要说明这种区别的标准并非基于是否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考证、研究、叙述，而是基于不同人的叙述所要传达的意识是否有助于人们历史意识的形成。

我们认为，传统历史学的认识正是以一种充满着局限性的方式解释了历史叙述在历史学实践中的地位。虽然在传统历史学的认识中可以从某种角度得出历史叙述文本是历史存在的主要场所这样的命题，但由于传统历史学理解这个命题的层面不同，即它从根本上将历史叙述视作表述历史的形式，从而造成历史叙述形式（叙事的、分析的、结构的或发生的等等〔这些形式并非并列关系〕）与内容（历史）的二分对立，因此将为历史学理论制造诸多难以解开的症结。如：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寻求能够全面展现历史结构的总体史，而事实证明这种总体史的追求是不可能实现的；②以美国新社会科学史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希望凭借统计分析揭示历史，视历史叙述为自然科学般的叙述，结果造成历史学研究失去自身的特色，最终近乎取消自身的存在。③

历史叙述文本是历史存在的主要场

所，当我们将历史学研究与实践置于整个社会实践的背景之中，并在此层面上理解历史叙述，揭示出历史叙述在历史学中的核心地位时，这种理解将与传统历史学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历史叙述在历史学实践中的地位首先表现在：作为历史叙述的成果，历史叙述文本表现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学实践的必要环节。任何在现实中发生的实践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历史学家的社会实践即历史研究同样要实现它自身的目的。这种目的无论是为了记载真实的历史事实，还是为了表述历史过程，抑或是为了以史为鉴，它都需要某种载体作为运输工具将历史研究的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实践活动，否则这种实践只是局限于个人，而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社会实践。任何传达思想的任务都是通过叙述由符号接受了下来，尤其是作为符号之一的语言。历史叙述文本主要由语言构成，只有通过它，历史学家的成果（它在本质上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才得以成为依赖语言的相对独立存在，最终具备被读者利用的可能。随着读者的扩大，历史学的价值逐步得到彰显，历史学实践的意义在社会中开始实现。当凭借语言表述的历史叙述文本获得其意义时，它同时意味着人们通过听与读从其中认识了历史，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叙述文本是保存历史的主要场所，也是推广历史价值的重要途径。

历史叙述在历史学实践中的地位通过历史叙述文本表现出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历史叙述文本是人们在意识中构成历史的主要思想来源，历史叙述文本的不同及对历史叙述文本之接受的不同决定了对历史的理解不同。我们的思考通常以语言为工具，因而对历史的认识同

样是借助于语言的媒介。然而，语言并非一种简单的媒介，即：没有某种实在的客体（历史）等待着我们（主体）去用语言再现，相反，由于语言本身在运用中表现为语言的游戏，历史学家在叙述中蕴涵的意图与读者对它的理解之间在本质上也就不可能获得同一性。这样，每一个在心中运用语言构成历史的人都对历史叙述文本有各不相同的理解。这完全缘于历史叙述依赖于语言，而语言的运用依附于不同的语境，这便滋生了理解的任意性。这么说来，历史在我们的思想中难道成了绝对主观性的东西吗？并非如此，正如晚期分析哲学否认了私人语言的存在，公共语言在主体间的交流中寻找到了坚实的基础，它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成为可能。但不管怎么说，面对运用公共语言研究、撰写的历史，人们仍应该放弃那种指望与其他人有着绝对同一的历史理解之理想，因为主体间性只是保证了语言交流的相对稳定性。一旦我们放弃这种理想，就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实体性的历史观念，而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不同的历史，即对历史叙述的不同理解。

历史叙述不仅在历史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通过作为历史学实践的必要组成，在整个社会实践中发挥其显要作用。拥有历史叙述权意味着历史学家同时拥有一种表述真实事件的合法权利，这种权利可扩展为对整个社会的解释权。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就担负着叙述历史的任务，并以追求真实为己任。虽然历史的真实在不同的时期（尤其在现当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它往往依赖于历史学家生活之时代的整个的意义体系，但它提供的解释消除了人们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并使社会继续保持着连贯性与稳定性。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真

实的叙述与历史叙述视为同类，这样，当人们在要求真实地记录与解释社会现象时，就不可避免地将这种叙述权授予历史学家。即使对真实的理解曾经或仍然局限于真理的符合论，或如当代某些思想家那样局限于真理的融合论，但对真实性的需求长期存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历史学家因为具有社会赋予的历史叙述权而被树立为合法的文化权威，由此更突显出历史叙述之社会作用的重要性。

历史叙述及其成果历史叙述文本在历史学实践中的地位显然没有被人忽视过，但人们对历史叙述获得这种地位之原因的认识却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源于是将历史叙述问题视为历史学的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而后者有赖于将历史叙述置于社会实践的整体之中进行思考。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分析历史叙述的社会功能及这种功能的产生过程，或许对拓展有关历史叙述与历史学实践的认识更有益处。

二、历史叙述在历史学实践中的功能

阅读历史叙述文本，我们从中获得的难道仅仅是所谓的历史知识，以便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吗？即使在传统历史学的意义体系中，除增长知识外，历史叙述最起码也被认为具有道德说教的功能。传统历史学家认为发挥历史的垂训功能凭借的是永恒的、超时间的人性或理性。无论我们现在是否赞同传统历史学家就历史叙述之功能的论述，必须指出，它从没有真正说明历史的垂训作用是如何在现实中实现的，因为人们将一切归因于天赋人性或理性，自然就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此便会认为历

史叙述施展其功能的过程无足轻重。例如，在传统历史学体系中，历史中的教训是怎样被人们吸收过来的呢？也许人们会说，阅读历史就是利用他人的生活经验来丰富自己的经验，从而增强自己决断的能力。这种经验由此及彼的转化过程，以及由他人经验加上自我经验转化成决断能力的过程，在传统历史学的认识中被视为一种简单而没有任何变化的经验相加。事实上，这种观点完全根源于传统历史学认同的历史实在论。历史实在论认为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它一旦发生就以一种客观实在的形式存在，历史叙述所做的无非是将它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经验如何转化的问题与对历史本身性质之认识的问题是不相关的。然而，随着现代认识论研究的深入，传统历史实在论早已失去了根基。启发我们思想的历史显然不是纯粹的年代、人物、事件或经验，而应是包含在历史叙述中的某种意识，即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以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经验与事件为其载体，事实上，历史叙述发挥其功能的过程也是历史认识发生（认识发挥其作用可视为新认识的产生）的过程。我们正是根据历史认识获知有关的历史观念，如此推论，这个过程甚至也可以说是人们心中的历史观念构成的过程。能够始终贯穿着这一过程，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历史意识。历史叙述的唯一功能就在于传递历史意识，只不过，这种传递不是简单地将某物从甲处原封不动地送到乙处，而是在运送的过程中结合一切新的因素与情境而不断更新变化，就如将营养以食物的方式从嘴中送入而到达身体的各部分时，它已经被分解成各种基本化学物融入了新鲜的血液之中。历史意识或许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它就是那种滋养着我们思

想、判断能力的东西，也是我们作为社会的人所具有的社会生存能力的源泉。

要较为透彻地理解历史叙述在历史学实践中传递历史意识的唯一功能，就必须考察历史叙述与历史意识之间的紧密关系。

从传统时间的流程上看，历史叙述的产生有着先行具有的历史意识作为其前提。在历史学家准备进行历史叙述之时，他的实践已经有着外显的或内含的目的性，是为将来而筹划的实践；同时，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到所研究的内容的历史性，还应考虑自身行为的历史性（传统历史学对有关历史性的认识较为缺乏或不够健全），而所有这些思想都在进行历史叙述之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形态。对现实实践之目的性与历史性的自觉认识证明了历史意识的存在。历史学家一旦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就必须考虑他的实践之时间性。过去的消逝与将来的来到促使现在的实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些变化也随时增添着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同时为历史学家理解历史不断开辟出新的可能。正是因为历史学家的实践使他拥有了历史意识，而历史意识中又强调着实践的目的性，历史学家希望通过历史叙述将自己的历史认识，即理解过去、现在、将来的历史意识传递给其他人，因此这种历史意识正是促成历史学家进行历史叙述的动力。历史叙述在对历史意识的领悟中产生。

历史叙述过程是传递历史意识的过程。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考虑如何安排历史叙述的结构、如何运用适当的语言等等（所有这些要素本身都是历史性的），以便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历史意识全部地贯注在历史叙述文本之中。历史学家不但在进行历史叙述以前的一

切实践中理解历史，而且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表述有高低优劣之分，但历史学家希望读者在阅读他的文本时能实现他所期待的目的，即像他那样最终获得历史意识。当历史学家在创作一个叙述文本时，这个文本是否能够完全表述作者的历史意识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个文本的完善性不仅牵涉到历史学家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与他对历史的理解及其解释中的个性有关。在历史叙述文本诞生之时，历史学家在传递着自己的历史意识；当这个文本诞生后，它的价值便与历史学家脱离了直接关系，而完全依托于读者的阅读以及读者在生成自己的历史意识时对该文本的依赖程度。

阅读是一个历史叙述循环的最后步骤。阅读历史叙述文本既是接受历史意识的过程，也是生成历史意识的过程。在读者阅读历史叙述文本时，他不可能一味地接受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因为读者对历史的认识必须联系他对自身实践的目的性与历史性的认识。如果说历史叙述文本中包含的作者的历史意识有效，那么它必须起到加速读者历史意识形成的进程。对事物的任何认识都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传接，因此企图从历史叙述文本直接获取完整的历史意识的幻想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历史意识也不是一种一朝形成便永不改变的事物，它是一种促进个体生存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强弱之分，而永无完美状态，于是我们必须不断吸取养分培育这种能力。当历史叙述文本将作者的历史意识传递给读者时，它只是作者生存能力的体现，不能被简单地照搬，而应像解释学所倡导的那样以视界融合的方式融入读者对过去与现在的理解之中，构成新的历史意识和新的视界。增

强筹划将来的能力，也就是增强自己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据此，我们认为，阅读历史叙述文本的过程同时是生成历史意识的过程。

历史叙述在历史意识的催促下诞生，它在叙述实践中传递着历史意识，通过将叙述文本呈现给他人而促使他人生成新的历史意识，三个逻辑步骤构成了一个历史叙述的循环。通过历史叙述，历史意识在被传递中生成，被传递的是传统文化的制约因素，是对现实的历史性的认识，它与读者对自身所处现实环境之历史性的认识及对未来的展望相结合构成读者的历史意识，其中包含了对现实实践之目的性的认识。人们筹划将来的现实目的在将来到时为现在时，无论是否达到，都将在时间上瞬息成为过去，在意识上转变为传统。人们筹划将来并非天马行空，无所限制，相反，筹划处于时间与传统的约束之中；传统也并非纯粹的保守势力，它既是保持社会连贯的基本力量，也是人们成长的沃壤。命运的变幻不定迫使人们不断地深化对传统的认识，以便利用传统的力量在其限度内有效地进行新的、创造性的实践，追求着自己的合理目的。认识到这些就把握住了历史意识的本质，

它揭示了现实中的实践与过去及将来之间的关系。历史叙述文本不只是历史意识的载体，创造它的历史叙述本身也是生成历史意识的实践。据此而言，当我们说历史叙述的功能旨在传递历史意识之时，“传递”一词早已超越了日常语言中的意思，而是一种建构中的“传递”；此时，历史叙述也不再是传统历史学中表述历史的手段或方式，它承担了历史学的根本任务，以至于成为历史学实践的核心。●

①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82.

②如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寻求一种结构的历史，其真实性依赖于结构的合理性，历史叙述在形式上表现为分析，在内容上关注在长时段中波动的要素。

③如 60、70 年代西方史学中美国的新社会科学史学派及各国的计量史学派。这些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叙述形式上完全可以用类似于数学分析的语言取代。另外，数据也可以作为基本内容来证明研究的问题，这样可以使历史学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

责任编辑：郭秀文

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

□梅新育

(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生 430072)

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以后,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对外贸易由于获得广阔的新市场而急剧扩张,其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步伐,对中国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与欧美海路直接贸易的建立与发展

明代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航线起点是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马尼拉为中转口岸,终点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澳门则扮演了中欧贸易枢纽的角色。

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在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遥领。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甚至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

“唯有肉桂而已”。^①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素负盛誉。菲律宾殖民当局欲获资本原始积累之利,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一途,甚至日用消费品也不得不就近仰仗中国供给。在菲律宾立足甫定,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也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优待措施。

在此前后,明军御倭战争亦进入最后阶段。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自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②以来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为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明廷重开中断四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1565年,“圣巴勃罗号”从菲律宾返航美洲,从而开辟了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往返航线。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③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受马尼拉贸易厚利吸引,福建漳、泉二州商人纷至沓来。隆庆五年(1571

年)马尼拉殖民首府建立之初,华人仅有150多名。万历十年(1582年),龙其虑总督在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了专门的华人社区——八连(Parian)。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训令菲律宾总督,准许对中、葡、日等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予以免税待遇,进一步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华人数目已达二万余人,而包括军队在内的西班牙人仅有2000名。^④关于对华贸易的重要性,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Antonio de Morga)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⑤依靠对华转口贸易,马尼拉成为亚洲最大贸易中心之一。

此外,1580年,西、葡两国合并,根据合并时订立的《八项和平条款》,原葡萄牙各属地(包括澳门)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包括马尼拉)贸易,西班牙各属地则不拥有对等权利。两艘澳门商船于当年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澳门至马尼拉的葡船装载的货物以中国货为主,其次是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610年,横行南海的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达成妥协,转向抢劫中国商船,仅1617年一年就有11艘中国商船在南下马尼拉途中遭到荷兰人劫掠。南下菲律宾的中国商船帆樯日稀,澳门——马尼拉贸易则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

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为大宗。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甚殷,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⑥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

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这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年间,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

二、贸易顺差和套汇使白银大量内流中国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为主。自南宋以来,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历朝均严禁金属出口,但效力不大。^⑦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本质变化,国际收支随之逆转。

至晚明时,较之中国,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已占优势;但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商品则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风靡欧、美和日本市场。此外,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⑧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由于欧洲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用硬币购买中国商品,巨额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鸦片贸易兴起前夕。自阿卡普尔科返

航马尼拉的大商帆运载的主要是用以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西属美洲流往马尼拉的白银开始每年约 100 万比索，后来达 200—300 万比索，有时甚至超过 400 万比索。1571—1821 年间，输入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共计 4 亿比索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亦有 1/2、1/4 之说）又转输中国。有些外国学者则估计美洲白银总产量的 1/3—1/2 都流入了中国。^⑨此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中外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W. L. Schurz 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⑩仅 1631 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 1400 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 年）大明王朝 30 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 2.1 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 3.8 倍。1593 年 1 月、1595 年 7 月和 9 月，西班牙国王三次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 50 万比索为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敕令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也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就曾指出，与 1591—1600 年间相比，1641—1650 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 92%，白银减少 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⑪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 世纪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另一个主要来源地是日本。日本不仅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而且用白银交换中国钱币。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走私贸

易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贸易两途。有明一代，中日关系一直谈不上热络，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更使两国关系落到冰点以下，明廷因而将对日贸易悬为厉禁，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然而，商人的趋利本性最终使这种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纸虚文，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成为中日直接贸易的主要形式。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之前的嘉靖年间，正当中国白银需求日增之际，中日走私贸易已经使不少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尽管如此，中日直接贸易毕竟因为明廷的禁令而受到很大制约。与明廷和日本沿海各大名均有良好关系的葡萄牙人遂乘虚而入，利用中日两国给予的优惠待遇，^⑫在中日贸易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最终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的葡日贸易网络。中国学者全汉升、李龙华估计，16 世纪最后 25 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半数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运走，每年数量达 50—60 万两；到 17 世纪前 30 年，每年运出 100 多万两，有时高达 200—300 万两。葡萄牙历史学家在 17 世纪初估计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价值超过 100 万金币。^⑬而根据日本学者新井白石调查，仅庆长六年至正保四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清顺治四年，西历 1601—1647 年）的 47 年间，日本白银输出总量即达 7480 余万两，大半输入中国。^⑭日本白银外流中国数量之大，使日本政府为之不安。为减少白银外流，日本政府于 1689、1715 年两度颁布法令，限制中国赴日商船数量和贸易额。

白银流入中国，并非仅有贸易一途，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套汇业务也是一条重要渠道。16、17 世纪间，中国、日本、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中国金银比价为 1:5.5—7，日本为 1:12—13，欧洲为 1:10.6—15.5，^⑮欧洲商人将日本、

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可获利一倍以上。

三、巨额海外白银内流是中国银本位制度确立的必要条件

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银本位的确立。

在供给方面，在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物质前提是国内市场白银存量足够满足流通之需。在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金银铸币就已广为流通。而在中国，虽然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就铸行了白金币，但白银一直未能摆脱辅币地位，甚或主要用于贮藏。自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币制以来，外圆内方的铜币历经朝代更迭，盘踞本位货币宝座长达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中国金银矿藏相对贫乏。根据明、清史籍所载银课收入数字计算，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 年）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白银年产量一直徘徊在 10 万两左右，清代前期约 20 万两左右，^{①⑥}较之美洲、日本、欧洲只不过是个零头而已。而且我国银矿品位不高，开采往往得不偿失。据全汉升统计，明代中国银矿含银量在 0.003%—12.5% 之间，一般在 1% 以下；而同期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为 50%，新西班牙银矿含银量为 5%—25%。^{①⑦}《明史·食货志·坑冶》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即西历 1546 年）七月命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梁方仲就此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①⑧}

不仅如此，自唐宋以来，“钱荒”的记载不绝于史，流通中货币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为补钱币之不足，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当流通

媒介，实际上实行了钱币、谷帛的平行本位制，金银主要用于贮藏。本质上并不适宜充当货币的谷帛长期与钱币并行，即使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唐朝鼎盛年代也是如此，重要原因就是金属货币短缺。但由于钱重物轻，民间交易优先使用钱币，政府又不得不出面强制推广代用货币。仅在唐朝，开元二十年（732 年）和二十二年（734 年）、德宗贞元二十年（804 年）、宪宗元和六年（811 年）、文宗大和四年（830 年）和八年曾先后多次下诏禁止交易只用钱币。宋朝则三令五申，并在边境设卡，严禁铜钱外流。宋代纸币制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克服硬币不足的困难，满足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元代虽然名义上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但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发行至元宝钞以来就一直使用不兑现纸币，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然而古代纸币制度终因其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而在元末崩溃，明太祖虽发行了大明宝钞，但不久就名存实亡。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生产和交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钱荒有增无减，对大宗交易所需的高价值交易媒介——白银需求增长则更快。因铸钱铜料不敷使用，明政府不仅数次下令销毁民间铜器铸钱，南京太仆寺甚至将大内旧铜器 47 万余斤也用于铸钱，并允许将前朝旧钱投入流通。罗掘至此，明初至万历初 200 年间铸钱数量也仅有 1000 万贯，而北宋除开国初期每年铸钱少于 100 万贯外，百余年间每年铸钱都在 100 万贯以上，熙宁六年（1073 年）后每年铸钱竟达 600 万贯。^{①⑨}商品经济发展与钱币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形成的通货紧缩效应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白银源源流入中国，消除了国内银矿资源贫乏的制约，使这一矛盾最终得以化解。

在需求方面，首先，出口市场的迅速扩大，使手工业发达的南直隶南部（今苏南、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呈现出

一派繁荣景象，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又通过连锁效应进一步带动了北方和广大内地的经济发展。今日相对贫穷的赣南，当时是通往广东外贸口岸的商道，百业兴旺。对外贸易对明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之大，从中国商品外销与内销规模比较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苏杭丝织业与松江棉织业是明代后期商品率最高、产值最大的两个产业部门，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供的资料，当时苏杭民间机户年产丝绸约 20 万匹，价值白银 16 万两；松江棉布运销量为 2000 万匹，价值白银 300 万两，两项合计 316 万两。而根据中国学者张铠计算，17 世纪初，不计荷兰人经台湾输往日本、东南亚的中国商品以及葡萄牙商人运销果阿、欧洲的中国货物，每年仅直接出口菲律宾和由葡萄牙商人输往日本的中国商品价值即达白银 427—487 万两。^{②0}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种稳定的通货，但明政府发行的宝钞和铜钱币值都不稳定。就宝钞而言，洪武八年（1375 年）发行的宝钞，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实际价值就跌落到面值的 5%—16%，后世所发行的宝钞实际价值就更加低落。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一贯宝钞竟然只能兑换一文铜钱。^{②1}就铜钱而言，明朝中叶以后，钱法日趋紊乱，腐朽的统治集团将滥铸劣币、大钱，获取“铸息”作为一条搜刮人民、缓解财政危机的财路。从钱币重量上看，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明末钱重由 1 钱 2 分改为 1 钱，后又减至 8 分，南京所铸，有轻至 4 分以下者。从成色上看，天启年间铜钱成色由规定铜七铅三降为铜铅各半，甚至铜二三而铅砂七八。凭借这种手段，天启年间南京铸钱年获利达 12 万两白银，“铸息”达 60% 以上，而万历以前铸息通常为 20%—30%。^{②2}加之私人盗铸猖獗、政府货币政策变动无常，致使宝钞和铜钱信誉都不高。隆庆初年高拱就指出：“钱法朝议夕更，

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苏州市民就曾发起席卷苏南各州县的拒用天启钱运动，持续 10 个月之久。海外白银源源流入，提供了一种供给随经济发展稳步增长并摆脱政府干预的稳定通货。

白银为本位币、铜为辅币的货币体制确立后，历经明、清两朝和民国初期，直至 1934 年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被迫于 1935 年 11 月实行法币改革时方才废除。

四、对外贸易促进了明代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

早在周代，中央财政“九赋”之中的“关市之赋”已经征收帛布，但直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相当发达的唐、宋以后，各朝仍以实物为正赋，货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依然只占小部分。直至明代推行一条鞭法，白银成为正赋，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其中对外贸易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货币收入。在明初朝贡贸易中，明政府对外国贡船夹带的私货一律免税，加之回赐一般大大超过贡品价值，朝贡贸易对明朝财政实际上是一种负担。其后，朝贡贸易日趋衰落，民间贸易兴起。弘治、正德年间，明政府对民间贸易进口货物实行“抽分”制度，抽取一定比例的货物作为进口税。至迟到万历初年，各通商口岸已先后对入口番货改征货币。尽管走私猖獗，入口货物“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但官府舶税收入仍然相当可观，仅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一个港口，万历二十二年舶税收入就达 2.9 万余两。^{②3}在某些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对外贸易市舶收入甚至成为当地财政的支柱。自正德以来，广东文武官员俸禄已多以市舶收入代支。嘉靖初年废广东市舶司后，自两广巡抚以下当地各级官员屡屡上疏请求重开，所持论点即是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市舶商税。^{②4}

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中国迟迟难以确立先进的货币财政制度，与钱荒的影响不无关系。明代巨额对外贸易顺差消弭了困扰中国数百年的钱荒，从而间接推动了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

唐代税收兼用钱币和谷帛，而穆宗长庆年间户部尚书杨於陵针对钱荒提出的对策之一就是“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⑤实质上是企图以财税制度的倒退来减少对钱币的需求，从而缓解钱荒。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统一以钱征税。由于钱币本已不足，实行两税法又增加了对钱币的需求，致使钱重物轻现象日趋严重。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年），40年间，米一斗由200文跌至50文，绢一匹由400文跌至80文，^⑥纳税人实际负担成倍增长，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唐廷最终不得不于长庆元年废除两税法。元代课征赋税已广泛使用纸币，明太祖鉴于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倒退为实行实物财政制度，田赋以征收米、麦为主，附征丝、麻、棉等土产及货币，前者称本色，后者称折色，百姓还要承担徭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实物财政制度弊端的日益暴露，从明朝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陆续扩大征收折色，减征本色。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允许南京、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将原征米麦400万担折纳“金花银”100余万两。正德元年，官方又正式承认“银差”，允许部分徭役折征银两。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进行历史性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行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等人所创的一条鞭法，一切赋税、徭役统一折银缴纳，标志着中国货币财政制度最终确立。一条鞭法为清朝所承袭，并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条鞭法没有像两税法一样引起物价暴跌而失败，原因就在于白银不断内流，尽管实行一条鞭法加大了对白银的需求，白

银供给依然较为充裕。而一条鞭法发端于对外贸易发达的浙江、广东、赣南等地，也决非偶然。

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货币财政制度本身是在已相当发展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而一切税课、力役折银缴纳，又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同时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多的农民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从事工商业，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凡此种种，都使白银本位币的地位更加巩固。●

①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3, pp299, Clifland, 1903. 转引自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第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抵宁波；未几，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亦至。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其货船虽然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宗设怒杀瑞佐，焚其船只，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劫掠而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事后，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乃裁闽、浙两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

③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国之船”之称，因为它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货，船员中有许多中国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

④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见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月港研究论文集》，p. 281 - 282, 1983年。

⑤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

第 425 页，新亚研究所。

⑥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3。

⑦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 13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⑧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571—600 页，新亚出版社，1991 年。

⑨沙丁、杨典求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第 70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第 66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⑩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9, pp71, Clifland, 1903. 转引自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第 6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⑪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第 50—51 页，巴塞罗那 1975 年版；转引自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京），第 3—15 页，1988—3。

⑫葡萄牙人来华之初怀有征服中国的野心，与明军几经较量，深感中国地广势强，对华改而采取缓和交往的方针。入据澳门后每年向中国当局缴纳税金和地租，助俞大猷平定柘林营兵变，提供先进的火炮技术，表现颇为“恭顺”；并刻意结纳、贿赂中国官吏，终于同明朝政府建立了较为融洽的关系。在各国来华商人中，葡萄牙人从明政府获得许多独享的特权和豁免。一艘 200 吨的葡萄牙商船首次来华时须向海关缴纳水饷（即吨位税）1800 两白银，以后每次来华就只需缴纳水饷 600 两白银；而其它国家同样吨位的商船，每次来华贸易均须缴纳水饷 5400 两白银。葡萄牙人在广州采办货物所需缴纳的商品税，也只有其它国家商人的三分之一。1644 年清军入关后，南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

际甚至计划征召澳门葡萄牙人勤王。日本沿海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则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二则取得对其他大名的军事技术优势，对葡萄牙人也予以优待。

⑬转引自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第 55 页。

⑭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 176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⑮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5 卷第 1 期；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第 38 页。

⑯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617—619 页，新亚出版社，1991 年；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厦门），第 81—91 页，1988—2。

⑰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617—619 页，新亚出版社，1991 年。

⑱梁方仲：《明代银矿考》，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 90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⑲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 364 页，新亚研究所；汤可可：《明代江苏的铜钱流通及外流》，见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集），第 355—359 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年。

⑳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京），第 3—15 页，1988—3。

㉑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册，第 586 页，新亚研究所，1991 年。

㉒汤可可：《明代江苏的铜钱流通及外流》，见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集），第 355—359 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年。

㉓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 163、

第二届海峡两岸伦理学术研讨会召开

1998年12月9日—14日，来自台湾及内地50多位代表，欢聚在珠海市、肇庆市和中山市，举行了“第二届海峡两岸伦理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代表就“中华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生活”为主题，提交了30多篇论文和一部著作，并开展了论文主要观点的介绍与答询讨论。整个会议洋溢着学术交流的浓烈氛围和两岸学者深厚的友谊。

与会者认为，新近两岸举行的“汪辜对话”取得了一定成效，江泽民主席又再次强调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在这个时候举行“第二届海峡两岸伦理学术研讨会”，意义更加深远。因为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在台湾地区有广泛影响，她以“宏扬中华伦理文化，推进两岸有关交流活动，促进国家统一为宗旨”。原名誉会长蒋经国，现任名誉会长陈立夫以及会长巴信诚先生等，一贯鲜明地反对台独，坚决主张一个中国。可以说，从1997年开始的两届伦理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是海峡两岸伦理学者为国家的统一和中华的振兴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一份努力。

第二届海峡两岸伦理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伦理学会、珠海市文明办、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和中山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与会的学者们在依依惜别时相约：1999年适当时候，第三届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将在台湾举行。（方一）

170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④《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②⑤《新唐书·食货志二》（卷五二），转引自叶世昌编：《中国货币思想史》，第80—8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

②⑥《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

其它主要参考文献：

1、樊亢、宋则行：《外国近现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

2、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3、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4、《中国军事史·兵略》，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5、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

6、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3年。

7、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8、林金树、高寿仙、梁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9、曾少聪：《明清海洋移民菲律宾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p. 70—77，1997—2。

10、李洵校注：《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

责任编辑：郭秀文

论王国维运用文物档案考经证史的开创意义

□ 陈 方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讲师 510275)

近代中国不仅是社会遽变的时代，也是文化巨变的时代。学人之于学术，亦因时生变，因人而异。一代宗师王国维即见代表，其弟子徐中舒说：“大抵先生为学次第，可分四期：二十二年以前，居海宁本籍，治举子业，兼治骈散文，是为第一期。二十二以后，旅居上海、武昌、通州、苏州，八九年间，先治东西文字，继治西洋哲学、文学。年壮气盛，少所许与，顾独好叔本华，尝借其言，以抨击儒家之学，为论至廉悍。其后亦治诗词，于词尤自负在北宋诸家之间，南宋以下，不足论矣。是为第二期。三十一至三十六五年之间，居北京，专治词曲，标自然意境二义，其说极透彻精辟，在我国文学史、认识通俗文学之价值，当自先生始。是为第三期。三十六以后，随罗氏居东京，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盖先生此时为学，已入自创时代，故虽由西洋学说以返求于我国经典，而卒不能为经典所束缚。是为第四期。”^①本文即欲把握王氏的治学变动来探讨他第四期所谓开创时代具有何种开创意义。

王国维由治西洋学说转注本国经典，有其自身性格因素、外在时代因素

和交往师承因素等等。先就自身而言，王氏自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②从一开始，他这种忧郁沉潜的性格总在追索人生意义，故尔引发了对西洋哲学，尤其是康德、叔本华的极大兴趣。王氏接受并专注于超功利的唯美的人生探求，养就了“以学术为性命”^③的学者品格，在这点上，无论是以西洋哲学抑或以中国经典来探赜，其学术生命本是相通的。由此而言，王氏由治西洋学说转向本国经典固是一脉相承，皆以学术探究为本身目的。王氏一向鄙弃以学术为政治手段，指责今文经学“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④因此，王氏最终专注经典不仅为沉潜冥求性格所决定，而且是远离政治的学术生命展示。在此其间，戊戌、辛亥之时代巨变并未中断或中止他的学术生命，相反，划时代的文物大发现更促进了他的学术进程，也造成了他的学术转型。王氏在其《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欣喜地谈论了文物大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

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这次划时代之发现，无疑给王氏的学术生命注入无限活力，并为其学术转型创造了充分条件。

当然，直接导致他学术转型不可忽视他与罗振玉的交往。罗振玉也是这次大发现的材料运用者，他比王氏年长11岁，对新材料的重视与运用可算先走一步，给予王氏以引导作用。罗氏在为王氏《观堂集林》作序说：“辛亥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甲寅，君与余共考释流沙坠简。余考殷虚文字，亦颇采君说。丙辰之春，君自日本归上海，为英儒哈同氏编学术丛刊杂志，君之撰述乃益富”。其实，他们于1898年相识后，罗氏一直以治理国学来引导王氏，并昭示其治学途径。罗氏撰《海宁王忠愍公传》记道：“初，公治古文字，自以所学根柢未深，读江子屏《国朝汉学师承记》，欲于此求修学途径。予谓江氏说多偏驳，国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二王，因以诸家书赠之。公虽加浏览，然方治东西洋学术，未遑专力于此。公既居海东，乃尽弃所学，而寝馈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可见，王氏在其学术转型前已摸索和研习过治学门径及其方法，在这里，罗氏所引的乾嘉朴学途径实为关键。

清代乾嘉朴学，奉行实事求是原则，无事不言，无征不信，以小学窥经

史，以文字治典籍，小心求考，精密实证，这些无疑对王国维后期治学产生深远影响，所谓“寝馈”足证王氏研习之深。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并不将注意力集中于乾嘉朴学的主流——文献考释，而更专注于其重要支流——文物考释，开创出运用文物档案考经证史的新局面，这才是王氏对乾嘉朴学的继承超越之功，也显示出王氏对时代文物大发现的运用战略。

古代文物主要指鼎钟彝器、石刻碑铭之属，尤其以商周铜器为贵，对其运用亦早已有之。清代学者阮元曾说：“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儒臣有能辨之者，世惊为奇。”这时的文物被用作皇帝封册符瑞或改元命号，盖属稀罕之故。“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⑤到了宋代才算将文物运用于治学，金石之学取得骄人硕果，这些成就不能不令重视文物档案的王国维另眼相看，王氏论述每每提及，在其专论《宋代之金石学》中评价甚高。宋人将考订文物的铭文与体制运用于实际，给古器定名亦精核过人，释文也擅器铭图谱相互参照，文物典籍相互印证，这些都给予他重要的启示，他也认准了宋人开拓的金石之学途径正是他的治学门径。

清代踪踵宋人金石之学途径的是阮元、吴荣光、程瑶田、吴大澂、孙贻让、罗振玉诸辈，从他们那里可以窥见王国维运用文物档案治学的一脉宗绪。阮元、吴荣光等作为乾嘉朴学之金石学代表，身为督抚，不辞搜编，著录考订，成绩斐然。像阮元的《山左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等，^⑥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记》，皆是金石档案

整理巨著；而他们将金石与经文互用之法更为王国维所秉承。如阮元《明堂图说》一文即采钟鼎文以考名物，直接开启了王氏《明堂寝庙通考》，后者更大量地运用吴彝鬲、攸从鼎、伊敦、克钟诸器细考，青出于蓝；当然，王氏所论释的宗法制度与建筑制度之关系，则是王氏的超越开创之处。至于程瑶田与吴大澂，罗振玉在王氏《观堂集林》序中有精确论述：“余谓征君之学，于国朝二百余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宓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扁涂虽启，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君，精博过于吴君。”罗氏在此指明了王氏对程吴二人的因创。还有孙贻让，也是一位古文字学大师，特别精通古籀，还是运用甲骨档案之先辈，古近通观，博细不漏，如其所言，“窃欲剝剝残碎，少附证经说字之学。”^⑦所著《契文举例》、《古籀拾遗》皆成文字学丰碑。吴氏孙氏之“证经说字”方法自然开启王氏运用文物档案的文字形义考经证史，观王氏所著《释史》、《释由》、《释辞》、《释天》诸篇什，无不得益于文字功力。当然，王氏之以字考史则非吴孙二氏主守文字藩篱所可及也。最后要提的也是给予王氏影响最大的是罗振玉。罗氏不仅引领王氏入乾嘉朴学之途，而且指导王氏运用文物档案之方法。罗氏尝说：“本朝经史考证之学，冠于列代。大抵国初以来，多治全经，博大而精密略逊；乾嘉以来，多分类考究，故较密于前人。予在海东与忠恚（王氏）论今日修学，宜用分类法。故

忠恚撰《释弊》、《胡服考》、《简牍检署考》，皆用此法。”^⑧罗氏这种分类考究方法包含着一种互通整体观，建构着分门别类的系统形式。王氏折服此法，亦颇采此法。观其《晋前尺跋》、《六唐尺摹本跋》、《宋三木尺拓本跋》、《宋布帛尺摹本跋》、《记现存历代尺度》以及《新莽嘉量跋》诸篇什，正是采用分类考究之法。其中《记现存历代尺度》一文列举自汉迄近世十七种尺度，系统考比，探出历代尺度由短而长之定例，揭示历史的权衡制度及其搜刮原因。在这点上又非罗氏之“分别部目”所可及也。

通过以上的追溯比较，我们可以见出，王氏既善于承传过去的优秀传统，更善于开创自身的治学新路。他能突过阮元、程瑶田采编金石印证文献的单一做法，而广泛运用除金石之外的所有文物档案，包括甲骨文字、流沙坠简、写本书卷以至内阁档案，考经证史，互相阐发，揭示史事，互相印证。他能突过吴大澂、孙贻让训诂文字考订文物的局限做法，而力求以文字窥见文物制度，又以文物制度窥见历史政制。他还能突过罗振玉分类考究分门别类的部目做法，而以通方知类的整体观念去重新建构史实礼法。

的确，梁启超评王国维“通方知类”最为准确，它体现了王氏对文物档案整体把握的通脱眼光，又体现了王氏治学的系统原则。王国维曾对自己的治学方式作过总结，揭橥“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

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氏把握材料考经证史的做法是：“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⑨王氏将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对接，将文物档案与经典文献对照，将诗书文义与彝器义例对比，将经典之言与不雅驯之言对参；又以文物验文义，以文字考史事，以史事知时变，以时代证礼法。这套“通方知类”的系统做法，正体现了王氏运用材料实事求是的开创性。因此郭沫若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⑩

王国维最具“近代式”的无过于1917年完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与《殷周制度论》。从第一篇的序中可以窥见王氏的具体方法。序言：“甲寅岁莫，上虞罗叔言（振玉）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骸，《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蒐甲骨中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

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即冥（罗参事说），至是始得其证矣。又观卜辞中数十见之田字，从甲在口中。及通观诸卜辞而知田即上甲微，于是参事前疑卜辞之田即报乙报丙报丁者，至是亦得其证矣。又卜辞自上甲以降皆称曰示，则参事谓卜辞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征。又观卜辞王恒之祀与王亥同，太丁之祀与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与祖庚同，知商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于是卜辞中人物，其名与礼皆类先王而史无其人者，与夫父甲兄乙等名称之浩繁，求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亦理顺冰释，而《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又卜辞人名中有田字，疑即帝誉之名；又有土字，或亦相

土之略，此二事虽未能遽定，然容有可证明之日。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乃为此考以质诸博士及参事，并使世人知殷虚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此也。”于此可见王氏的二重证据法是如此缜密精核，又见出王氏这种开创运用甲骨档案考证史事和订正史料的新史学观念。至于《殷周制度论》，则以上述基础及甲骨研究，参照诗书礼诸经典，对殷周两代社会制度作了比较，结论是殷代以前无嫡庶之制，无分封子弟之制，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祭典无亲疏尊卑之差，无同姓不婚之制。与之不同，“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都成为治古史者无法迂回的论断，被人称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⑪徐中舒指出：“先生凡立一说，必本

于新材料与旧材料完备齐集之后，然后再加以大胆的假设、深邃的观察、精密的分析、卓越的综合，务使所得的结论，与新材料、旧材料恰得一个根本的调合。这种实证的方法，忠实的态度，只有在先生著述里可以看到。”^⑫上面“二考一论”正是如此。

王国维运用文物档案考经证史堂庑特大，其二重证据法亦开近代一代学风。陈寅恪概括说：“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 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⑬沿着王氏开创运用甲骨卜辞研考殷代帝系时代，则有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等；沿着王氏以地下材料考经证史，论证制度，则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陈寅恪等。诚如郭沫若所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⑭●

①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东方杂志》第24卷13号。

②王国维：《文集续编自序》，《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③王国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23，上海书店1983年版。

④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⑤阮元：《商周铜器说》，《研经室集》（下）第635页，中华书局版。

⑥阮元：《金石十事记》，《研经室集》（下）第645页，中华书局版。

⑦孙贻让：《古籀拾遗自叙》，《国粹学报》13卷41期，第6页。

⑧罗振玉：《集蓼编》，《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台北文化书局版。

⑨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观堂集林》（一）第294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⑩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⑪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1卷3期，北平清华研究院1927年编印。

⑫徐中舒：《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文学周报》5卷1—4期合订本22页，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

⑬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⑭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略论章太炎与他的时代的关系

□程文超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510275)

鲁迅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是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①章太炎前后的变化是一个被学界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的话题。本文想讨论的是，章太炎的学术与他的时代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这一关系给我们以什么思考？

章太炎的学术与他那个时代关系的紧密是毋庸置疑的。他学术视野开阔，对于西方文化，他不仅能迅速吸纳，更能作出学术回应。看看他对“平等”、“自由”等的谈论，便可见一斑。

早在世纪初，章太炎便较多谈论“平等”与“自由”。但他的“平等”、“自由”不是西方的概念，因为他对后者进行了批判。中国要从封建里走出来，寻找平等、自由是一个民族的时代渴望。西方在几个世纪里已经走过的寻找平等、自由之路，自然成为中国人的追寻之途。但与此同时，西方知识状态已经出现了变化，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原有文化如寻找平等、自由的方式等进行了反思。章太炎对西方自由平等观的批判，正与这种反思一致。他揭露了西方之自由平等的虚假性。比如，在民族问题上，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

他举法国对于越南的统治为例，在那里，“生则有税、死则有税、乞食有税，清厕有税；毁谤者杀，集会者杀，其酷虐为旷古所未有。是曰食人之国，虽蒙古、回部未曾逮其豪毛。”章太炎质问道，“此法兰西，非始创自由平等之法兰西耶？”于是他指出，“在有政府界中，法人能行其自由平等者于域内，而反行其最不自由平等于越南。以此相推，虽至无政府时，犹渔猎他人可知已。”^②他认为西方人谈“自由”，“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彩色有殊，而质地无改。既使万物皆归于力，故持论至极，必将尊奖强权。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一切不得自由。后此变其说者，不欲尊奖强权矣。然不以强者抑制弱者，而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③

章太炎认为西方人以前的平等、自由观是不行的。他当然不是不要平等自由，但他认为，它们只有在他说的“齐物”观里才能真正找到。章太炎特别喜欢庄子。他说，“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④他说，“命世哲人，莫若庄氏。《逍遥》任万物之各适，《齐物》得彼是之环枢，以视孔墨，犹尘垢也。”

⑤在《齐物论释》这部著作里，章太炎对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1906年前后，章太炎已经受着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06年到日本后，他更与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人有直接交往，一起创建了“亚洲和亲会”。参加和亲会的有中、日、印、菲律宾、朝鲜、马来亚、缅甸等多个国家的代表。陈独秀也是和亲会成员之一。1908年幸德秋水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星期五讲演会被破坏，一批参与者被捕，和亲会活动才不得不停止。

在这一活动的同期，1907年8月，刘师培、张继等人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也得到了章太炎的大力支持。他一直是讲习会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多次亲自到讲习会演讲。

当然，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去接受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不平等社会的批判、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吸引着他们。他们也把自己的追求同各种知识搅在一块儿去消化社会主义理论。刘师培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的目的，是要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且“拟搜集东西前哲诸学术，参互考验，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⑥而参加者回忆，章太炎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一次演讲的主要内容竟是：“讲人之根性恶，以其具好胜心，二物不能同在一处，即所谓排斥性也。而断定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其恶愈减。”⑦

在《五无论》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理论对章太炎的影响和章太炎对社会主义有关问题的理解。他是在他所追求的社会人生秩序范畴内去理解社会主义有关理论的。在谈论“无政府”时，他显然认为他与社会主义理论一

致。他说，无政府不只是为了制止种族之争，“有钱币在，则争夺生而阶级起。于是以共产为生，则贸易可断，而钱币必沈诸大壑矣。”但社会主义似乎只在“无政府”、“无聚落”阶段与他一致。进入“无人人类”层面后，他便认为社会主义理论不够了。“纵大地悉无政府聚落，销兵共产之制得以实行，而相杀毁伤，犹不能绝其愈于有政府者。”因为还有人类。因而要“无人人类”、“无众生”、“无世界”。⑧章太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显然是有巨大局限的。但他对其时代的世界新学术、新思想之关注却是可以证实的。章太炎治学不乏时代感。据宋教仁回忆，1906年章太炎到日本后，宋教仁登门拜访，章太炎立即谈起哲学研究之法，并问宋教仁日本现出的哲学书以哪些为最好。宋教仁因平日不太关心哲学，一时不知如何回答。⑨

总之，章太炎的治学是紧贴他的时代的。他不仅站在当时中国、更站在当时世界的文化格局之中。然而，这并不等于他所“治”之学术是时代所迫切需要、所热烈欢迎的。在正视时代的同时，他寻求着超越。章太炎“转俗成真”后，努力用他的学术研究为民族寻找一个有道德的文化秩序。这一寻找是形上的。他的思路是寻找根本的、终极的“真”。面对当时的社会难题，他希望做一种超越时代、超越社会形态的努力。这一努力自然是弥足珍贵的。人类之为人类，确实有一些根本的大问题。有人类以来，世界千变万化，但在根本问题上，今天的人们所面对的，与苏格拉底、孔子、庄子、释迦牟尼等等先哲所面对的，并没有万里鸿沟。

然而，根本、终极问题一般只能在形上层面对存在，并不能直接演化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的具体问题。因为

在根本、终极问题上世界发展的“过程”退后了，被抽象掉了。因而，终极问题往往放逐了具体的时代需要。它的高蹈在这里，它的局限也在这里。因为，具体时代毕竟有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特别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人们往往要求对根本问题进行时代的转换，人们对具体问题的兴趣往往比对根本问题的关注更为迫切、更为强烈。不是根本问题不重要、不需要，而是人们没有从容的心情去关注“终极”。

章太炎的学术产生于它的时代，又远离了他的时代。他从他的时代问题切入，他对他的时代所拥有的思想资源作出回应，但他的学术追求方式和思考的结论，却又都不是他的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变革，正在进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关联着亿万人的生命和民族的未来，人们不可能越过它而直接进入“终极”。章太炎提供了一个“期以百年”而后可谈论的“物我为一”、“泯灭是非”，那是一个东方的乌托邦、一个 20 世纪的桃源梦，但它却不能告诉当时的人们如何去走向它。“五四”之前，人要求觉醒，被“理”压抑过久的“人”与“欲”要求复苏与活跃。这不是个人行为 and 动机，而是时代潮流，人力是无能为力的。章太炎对现实的时代要求作了古代文化的回应，对“动”的要求作了“静”的回应。他的学术从时代的入口直接进入了形上思辩，中间的环节是薄弱的，那就是：对时代直接发言的“思想”。

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时代为什么需要“五四”！尽管“五四”，或者说新文化运动所做的许多工作，章太炎乃至梁启超们早已开始在做，但时代仍然需要“五四”、需要新文化运动！

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对当时的时代发言的一场思想革命。

颠覆“经”学、批判儒学、译介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章太炎为“五四”提供了许多思想资源，他是“五四”杰出的孕育者之一。但他并没有走到“五四”。章太炎黄金时期的治学态度便已隐藏着他在“五四”风暴来临后的姿态。

当时代在章太炎参与孕育过的批孔路上向反封建思想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章太炎仍在他的“学术”之路上向另一个方向前行，依然鼓吹着他的“国粹”。到了“五四”时期，他的学术与时代便出现了巨大的夹缝。他的声音之所以不再是时代的声音，首先不在于他说的对不对，而在于时代听不听。鲁迅曾说过，要我们保存国粹，首先要看国粹能不能“保存我们”，因为保存我们才是“第一义”的。^⑩当时代在思想上衡量国粹能不能保存我们的时候，章太炎却沉迷于在学术上去衡量国粹好不好。因而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当“五四”运动在全国爆发时，章太炎却一面忙于“联省自治”运动，一面忙于反省自己当年批判孔子、“妄疑圣哲”，作“狂妄逆诈之论”。那是 1921 年 11 月，南京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在《史地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反击新文化运动对孔子的批判。文章点名批评章太炎，说他是“打倒孔家店”的祸首。他“好诋孔子”，胡适等人只不过在其后为其“推波助澜”。柳文认为《论诸子学》里对孔子的谈论不过是“以无稽之谈诬之也。”说章太炎“往往创为莫须有之谈，故入人罪”。章太炎对柳诒征的文章不但不反驳。反而回信向柳表示感谢。他说，“足下痛与针砭，是吾心也，感谢

感谢。”信中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他说他“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⑪如果说当时章太炎是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而诋孔的话，那么“五四”时，他则是因为对“五四”人的反感而批判自己曾有的行动。他将“五四”思想革命的闯将斥之为“浅人”，对“五四”人的反感是溢于言表的。

章太炎在学术上与时代的关系还可以从他的“革命”上得到某种说明。章太炎的“革命”不乏广博的内容。在《序革命军》中，他曾将“革命”与“光复”作过区分。但章太炎的“革命”关注的重心是政权问题。章太炎这一代革命者还没有可能将真正的思想革命提到议事日程。政权革命燃烧着他们的青春，燃烧着他们一生的黄金时期，也因此而拨动着他们一生的兴奋神经。他们完全可能在生命的某个时期做些属于思想革命的工作，但思想革命不可能是他们的神经兴奋点，不可能是他们注目的中心。因此，章太炎可以一方面革命，一方面做着形而上的学问。也因此，在“五四”思想革命的高潮中，章太炎的“革命”仍在政权革命的轨道上滑行，他关注的是“联省自治”。

章太炎与鲁迅的关系是颇有意味的。这两个人，一个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1906年章太炎到日本后，曾在东京创办国学讲习会。当时鲁迅、周作人、许寿裳亦在东京，都希望听章太炎讲学。但章的讲学时间与鲁迅等人的学校课程时间正好冲突。于是鲁

迅提议，托人向章太炎说明，希望章太炎专为他们另开一班。章太炎欣然同意。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8人便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业。地址在《民报》社内章太炎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者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地方言，以故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⑫

鲁迅对章太炎的“革命”十分敬佩。他说，他知道章太炎“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他听章太炎的课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⑬而后来，当鲁迅成为思想革命的勇猛战士时，章太炎在鲁迅眼里，却已经是拉车屁股向后跑的人了。^⑭

通过章太炎的学术与他的时代关系的考察，我们看到了“五四”思想革命的必要性。但这一命题不能再向前推：我们不能因为章太炎的学术远离了他的时代和“五四”思想革命的必要而断定章太炎的学术没有价值。社会越走向稳定，越走向文化建设，章太炎学术的价值便越能显示出来。今天，我们遇到了又一次社会转型。但这次转型不是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是现代社会体制内部的转型。如果说上个世纪之交对古典文化的批判是中国人的主要任务的话，那么，今天，对未来文化的建设应是中国人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是道德批判的话，今天的重点则应是道德建设。章太炎的学术研究在今天又显现出某些可资借鉴的价值。他关于泯灭是非等等具体观点当然

是有待讨论的，但他的思考至少在两点上给我们较大启迪：第一，向佛道拓展传统思想资源。一个古老的文化接受现代洗礼是完全必要的。用经过洗礼之后的眼光去重新看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那里确实有宝藏。20世纪是中国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两种人。一、推动“过程”的人。他们为时代所欢迎。二、反思“过程”、在新的视野中重新从根本上思考民族文化的人。他们往往在当时不被人们所注意，或者被误解。但他们往往被后世所提起，成为文化建设的资源。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属于第二种人。他们今天已更多被人提起，新儒家、新儒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表明我们时代的发展，表明我们的社会已越来越走向文化建设。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也属于第二种人。他在儒学之外极有力地拓展了另一资源：佛道。我以为这是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佛道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脉，它对中国人心与人生的铸造，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它在未来文化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轻估的。可惜的是，章太炎对佛道研究的开拓没有在20世纪文化史上形成一个“流”，以至没有新儒学的影响大。尽管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团结着一批学者在潜心做着扎实的工作，但不少学者仍有意无意地从自己的视野里放逐了佛道等传统文化的其他资源。反观世纪之初，章太炎，一个出身于经古文学的学者，对佛道给予了如此高度的重视和深刻的研究，这不能不对我们产生某种震动。

章太炎给予我们以启迪的第二点是，对文化的东方方式的深入崛起。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论述上。他将这一点同其他诸种

方式相区别，以证明它是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章太炎把这一点作为中国文化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自贵其心，不依他力，是中国人道德力量的来源，更关乎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人们对它的开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文化里确实有许多腐朽落后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批判也才开始。但把握了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我们便可以对中国文化进行一些知识考古性的工作，看到它为什么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它怎样造出了它的盲区和陷阱，又有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存活着。这有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进行必要的剥离，也有利于我们的重构工作。●

①⑬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

②⑧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

③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

④章太炎《国学概论》。

⑤章太炎《庄子解故》，《章太炎全集》第六卷。

⑥《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民报》第15号。

⑦《朱希祖日记》，北京图书馆藏。转引自姜义华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⑨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324页。

⑩鲁迅《随感录三十五》。

⑪章太炎《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书》，《史地学报》第一卷，第四期。

⑫许寿裳《章炳麟》，重庆出版社1986年。

⑬见鲁迅《趋时和复古》，《鲁迅全集》第五卷。

责任编辑：陶原珂

都市规则与怀旧情绪

——张欣小说读解

□温宗军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讲师 510610)

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大势，大致表现为以下的特征：由表层人性的描写变为对深层本能揭示的泛滥，人物的生存场景由实而虚，叙事法则更是以极度私人化为特征。但张欣小说似乎是这股大潮边缘的一支涓涓细流，不张扬，不喧哗，却以其独特的南方都市小说正稳步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

提到“南方都市小说”，这里首先是地域的界定，其次才是文学的界定。写广州这座典型南方都市的，过去鲜有如此执着、如此痴迷的；散文似乎有，但也多为铺张谀颂之词，时代的局限是非常明显的。张欣的幸运，在于她恰好生活在广州这座南方都市的改革开放之时。商业化社会的价值更新，道德巨变，使得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一切在张欣，则外化为她笔下一篇篇耐人寻味的南方都市小说。

南方是相对于北方而言的。北方的凝重厚实与南方的轻巧浮露，似乎已是一种定论。这就是写广州的小说往往不受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张欣是出生在北方的，却以广州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她由此获得了以北方的眼光来探视南方都市生活内蕴的独特视角。这一视角决定了她小说的审美特征，那就是：都市规则与怀旧情绪的错综纠缠。

张欣的小说，写的是南方都市的场景、

南方都市的故事、南方都市的人物，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城市的感觉，”“城市的情绪”。（《慢慢地寻找，慢慢地体验》）当今的南方都市，由于商业准则外在的和谐，人的精神、心理、情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往的政治时代，人们满足于空洞的政治说教，以存私欲和谋私利为耻辱，能人庸人都有着相似的人生轨道和结局：这一切都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昔日光景。都市的生存背景创造了都市的生活话语。星级酒店、交谊舞会、写字楼、出租车、豪宅；辞职、搵工、商业谈判；教授、文学家、生意人、小蜜、记者、情人，这一切构成了张欣小说的内容核心。商业语境中的都市规则，影响着都市的感觉和情绪。传统价值观念在急速变更的社会中，经受着冲击和洗礼。在《绝非偶然》中，作为夫妇的何丽英与车晓铜，为了各自的老板争夺同一个模特儿，商业准则已替代了伦理亲情，其激烈，其冷酷，足以使人倒吸一口冷气。但在另一方面，张欣又表达了奋发有为、积极进取、不怕失败的人生哲学。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在商场或情场，都是拒绝平庸而渴望有所作为的。在《格格不入》中，毛海梅为了孩子的入托弄得焦头烂额。毛海梅是部队离休高干的女儿，她原来的生活圈子与市民社会有着相当的距离。这种距

离培养了她的优越感，并滋长了她“众人皆浊我独清”的错觉。但无情的现实却打碎了她的精神梦幻。为了孩子的入托，她找过朋友詹胖子，詹胖子提出的条件是借她丈夫单位的外汇帐号“走一笔钱”；她找过父亲昔日部下的儿子，没想到对方竟赤裸裸地索要“一个外派大件免税指标，3000块平价港币”；连她丈夫通过昔日女友赵月光弄到的一个入市一幼的指标，也因传闻赵月光在市府管人事的母亲要离任而告吹。一个在以前对于毛海梅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居然成了一个困扰她、刺激她的大问题。海梅开始时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当她的清高和操守四处碰壁之后，她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不管是卑鄙利用，人格无耻，我已决定不再认真”的慨叹。都市规则是残酷无情的，海梅除了正视和面对以外，别无选择。

在张欣的笔下，城市中的很多男人给人以极度的不信任感。在她看来，男人不沾名不沾利，尚有昔日君子的古风，一旦为名利所困，便成了自私狭隘的角色。海梅的遭际显然是与男人有关的，男人逃不掉应付的责任。在《岁月无数》中，简松对金钱的理解就是爱情，或者说爱情就是金钱，有血有肉的女性在他眼中与物无异，赤裸裸地暴露了一个拜金主义者的嘴脸。而《真纯依旧》中，于达之离开妻子，居然是因为妻子显得比自己有能耐，自己觉得没有了男人的尊严和面子。在商业社会中，这种大男子主义更显出它的自私和冷酷。

张欣对城市的描摹，不在人格畸变、边缘化、精神变态和狂躁颓废处落笔，她老实地用颇为传统的技法，搬演着五光十色的城市社会风情，自由流利的文风中，时时透露出柔媚婉曲的气韵，是一种细腻真切、动情动容的女性作者的风度。张欣笔下的人物，尽管在都市生活里经历着心灵震荡和情感变迁，但在他们身上，又或多或少、或隐

或显地弥散出怀旧的气息。正因为张欣深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市本身就是一个大误区，无论你怎么选择，结果都不会令人满意”。（《女性误区》）所以她才在写作中“总难舍弃最后一点点温情，最后一点点浪漫”。（《深陷红尘，重拾浪漫》）这种浪漫和温情，本质上就是对往日理想和梦幻的迷恋，不愿在世俗的滔滔浊流中尽失人生的美丽。在《免开尊口》中，历尽磨难的林弟弟最终回到古朴澄明的境界：“种种生活的磨难，渐渐已经变成我的财富，它教会我低调、谦和、涵养、忍让、共事、规律，不自我为中心，不看重功名利禄，不去争大伙趋之若鹜的东西。尽可能地去给予，去爱惜，去珍重。”林弟弟在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后，终于找到了灵魂的安置所，在更高的层次上响应着古代哲人的人生境界。人经过奋斗和挣扎，调整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最终还原为本色的普通人，于是就有了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在《你没理由不疯》中，女主人公谷兰不满足于生活的单调沉滞，渴望着变化和惊奇，要“活得带劲儿，哪怕是为了钱。”于是她在工作之余搞商品推销，还鼓动丈夫炒股票。她在推销“龙吐珠”药品时，发现这原是坑害消费者的假药，于是良心发现，不再昧心赚钱。在她认识了越秀山药业集团的叶向川之后，了解到该公司生产的笑哈哈儿童生长素存在着致命的问题，她更是挺身而出，为捍卫人类的良知而奔走呼号。但她的公安局朋友因不想多事而不愿帮助她，她的丈夫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对残酷的事实视而不见，连她昔日的情人也袖手旁观。她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都市的芸芸众生中，人性的泯灭，良知的沦落，似乎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谷兰依然坚持着正直和正义，这与人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现实是不协调的，但却是可贵的，是昔日高尚价值观的闪光。对严酷现实题材的处理，并未掩盖作家对纯朴纯洁的往昔时光的想往。

对爱情描写，既是张欣作为女性作家的优势，又是张欣抒写怀旧情绪的一种成功的策略。张欣笔下的女主人公大都是知识女性，有文化又不失情调。她们有着自己的道德伦理准则。身处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尽管她们感到失落、尴尬和无奈，但这一切都无损于她们的初衷。《城市爱情》是一出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李小兰、冷平与默兰之间，冷军与岳影儿之间，冷云与岳毅凡、刘玉凤之间，这几组爱情故事错综纠缠。作品既渲染了人间至情至爱的本色，又散发出美梦难圆的遗憾。紫陌红尘中的男男女女，只要还有一点纯真爱情的梦幻，就必定得经历种种的磨难和酸楚。《星星派对》中的景苏，在追求爱情时，“明知靠的是冰山仍要去靠，”因为她深知，“一个女人若要在茫茫人海中有一个知道你、懂得你、理解你、欣赏你的人是多么不容易啊，单凭这一点，女人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在《梧桐、梧桐》、《留一点爱给自己》等作品中，主人公对爱情的寻觅，也都有着类似的情形。张欣笔下理想的爱情，抹不去忠贞不渝、重情轻利的主色。这实际上是在商业规则推动的现代都市中，人间真情未泯的旧梦重续。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张欣找到了能恰当地表达怀旧情感的领域。她在《女性误区》中写道：“对于上一辈或下一辈人来说，这种选择并不见得太难。但处于转型期的30岁的女人，可能就变成不解的死题。因为上一辈人困守得甘心，而下一辈人几乎已经有了与生俱来的冷漠，无论得到和付出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可是传统教育下长大的女孩，面对这样一个纷乱的都市，你说是应该出击还是困守呢？”正是这种两难的选择处境，使张欣笔下的爱情主角蒙上了理想化的色彩。这种色彩在30岁左右的少妇型女主人公身上就尤为明显。她们青春将逝未逝，事业将成未

成，家庭将稳未稳。在都市的千变万化中，她们坚守着略显陈旧的妇德，以此作为保护自己、留住丈夫、维持家庭、应付外界纷争的灵符。《爱又如何》中的可馨、《如戏》中的佳希，《致命的邂逅》中的寒池，都属于这类女性。在她们身上，寄予着作家追求古典女性美的梦想。怀旧是对现实的逃避。但张欣的怀旧却是一种诗意的逃避，在她的怀旧中，往往能升华出温暖人心、振奋人心的力量。

在张欣的作品中，都市规则是经，怀旧情绪是纬，经纬相互错综，这是作家主体精神与客观外界相斥相融的结果。

张欣从她的立场出发，创造了一种既有可读性又有可信性的文本。从可读的角度来看，张欣是潮流以外的风景。留意一下先锋文学中生命的神秘和强烈的本能色彩，背景的模糊不清，历史链条的断裂，故事结构的支离破碎；再留意通俗文学中铜臭的弥漫，趣味低下的风月堆砌，意浅神散与谐谑失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张欣找到了一条雅俗共赏的中间路线。由都市规则搭起的框架，其间流布着执着于信念的喜悦，点染着人生失落的悔恨和难言的惆怅，无情中见有情，有情中又见着无情。从可信的角度来看，张欣的文本有着中产阶级的合理性和满足感。她笔下的人物多为白领阶层，其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不高也不低，但文化和教养又使他们有别于其它阶层，所以他们的生活就鲜见煽动性的，或血淋淋的，或光怪陆离的场面。相对的稳定，合乎理性的抉择，一步步走向富裕，这一切都契合着当今都市的发展，真实地展现着时代的风貌。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种对张欣的评价：张欣是南方都市文学一面鲜艳的旗帜。我以为，这是中肯的评价。●

责任编辑：陶原珂

写作姿态与都市意识

□肖 松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510631)

作家的写作姿态与现代都市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否发现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新的价值系统，取决于作家用什么样的姿态切入当下都市生活。

一、认同和媚俗：都市语境下的自我迷失

“都市化”过程是一个交织着矛盾和冲突的过程。都市尊奉商业精神，同时又兼容异质文化。它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但又处处约束人的生存；它充满诱惑同时又布满陷阱。它在推崇交换价值和平等竞争的同时也把人际关系和精神价值不断量化。商业文明带来了都市物质上的巨大进步，但也导致人的某些天性的萎缩与沦丧。在完全意义上的都市尚未形成前的“动荡”时期，“新都市人”还不健全，一些作家在自身主体意识和价值尺度还来不及定位的情况下，便开始了放弃任何理性思考的现实摹写，即一种在从众姿态下的话语叙述。

比如，《特区不浪漫》其实已触及到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传统知识分子面对新兴都市的自我调整等问题。但是，由于作家没有进一步深层透视这些矛盾，而使一个复杂艰难的

过程简单化为快速轻松的适应与认同。蜡染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农民舞蹈家”刘总的怀抱，用自己的美丽和年轻，甚至一部分自尊，去换取最后的胜利。她的南下大学伙伴们也后悔自己没有尽快“适应环境”。在这里，平面化的现象拼贴取代了深层次的心灵勘探，情感立场和价值取向借人物之口急切直露出来，因而缺少一种张力和内蕴。而《南方最后的骚动》的结构几乎就是用电影蒙太奇式的剪辑来完成的：没有兴奋，没有痛苦，没有选择也没有思考，只有画面的流转。

不可否认，这些作品裸裎的现象确实反映了转型期都市的迷乱现状。问题是，这些现状是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要知道，在高度商业化的当下，小说之所以仍有那么多读者，在于他们希望从小说中看到自己未能见到的生活；希望小说能够解释生活的丰富可能性，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方向；希望小说能够拓宽他们的“经验期待视野”，使他们能够获得某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可是，如果作家本身陷入大众的泥淖中，拒绝对生活作任何反思与怀疑，而把现存的一切看作合理的，作

家就免不了要媚俗。媚俗的一大特征即复制现象，它们显然不能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和启发的空间。它们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抛弃。今日中国的新都市文学，如果不从一开始就克服这种媚俗姿态，不保持固有的批判超越潜能，“新的人文精神、新的价值系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二、寻觅和探索：生存困惑中的艰难取舍

一种新的文学口号的提出，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写作难度的确立。对于新都市文学，这个难度就是对适合于新兴都市的“新的生活观念，新的价值系统、新的人文精神、新的心理结构、新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信仰”（余秋雨语）的探索与发现。在重商时代，作家的价值正在于他的文化意识上的指导意义，否则，他将一文不值。基于此，“新都市文学”的作家必须以新都市人道去感受、体验都市的人生百味，对都市的未来走向作出前瞻性、建设性和超越性的思考。

不少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及时调整自己的姿态，积极探索都市人生，努力寻觅新鲜特质。如果说，认同型作家还停留在对都市表象的机械复制的话，探索型作家则要剥开都市生活现状的外壳，透视在物欲追逐中亢奋和悸动的灵魂；认同型作品写的是生活，探索型作品写的是生存；认同型作品写的是情感，探索型作品写的则是精神。这是探索型作家一个明显的审美特征。当他们以冷峻的眼光观照和审视都市人流时，首先发现的是迷离和突围。急剧的都市化进程，对新的经济运作方式的陌生，以及新旧文化的冲撞，都使新都市人焦虑与彷徨，但又不得不违心地对都市作出回应，按各自的理解进行着人生

突围。志菲（《驶出欲望街》）、阿莉（《漂泊岁月》）等南下小姐们抱着不同的心理和价值观念用肉体和尊严换来金钱和别人的尊敬；小个子马波利（《小个子马波利》）等书斋文人放下文人架子，投身到欲海的拼搏；即使是土生土长的都市人也在困惑中苦苦挣扎：齐星（《牙买加灯火》）因单位工资低而抛下丈夫和孩子出国留洋；慧芸（《爱猫及人》）、梅林（《情梦》）等都市有闲女人为摆脱苦闷现实而进行着各自的情感尝试。

写作者不再置身世外隔靴搔痒，而是敢于撕破都市花花绿绿的面纱，直指它震颤悸动的灵魂。这时，他所从事的就不再是轻松的、泡沫的、无用的写作，而成为一种创造。这种创造的有力注脚便是一批崭露头角的转型期都市人物典型。《驶出欲望街》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它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对两类新都市人群的关注。志菲拥有外语学院文凭，在南方都市里却处处碰壁，穷困不堪，只好用美貌作敲门砖。她用肉体换金钱，但并不对款爷摇尾乞怜阿谀献媚；渴望财富却并不铜臭贪婪；“驶入”欲望街是为“驶出”欲望街；出卖自尊是为赢得尊严。她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and 果断选择，断然拒绝了富翁韦昌的求婚，因为繁荣富贵纸醉金迷并不是她的生活理想，她要用金钱构筑一种有格调有真爱的生活。把肉体与自尊当作一种商品换来金钱，再去追求真爱，这似乎代表了许多卖身女的理想。而可悲之处正在于，人们把一切量化为商品的同时，也就自动摒弃了承诺、信赖、忠贞、真诚等人类赖以交往的价值规范，这便是志菲必然与真爱失之交臂（她认为自己与韦昌之间只存在着皮肉交换关系）的原因。“深圳是一个不容易产生

爱的地方”，这个颇具伤感而又意味深长的感慨，对应着志菲“驶入”时的悲壮与“驶出”后的悲凉，两者同样发人深省。作者用精细的笔触刻画出新旧更替时期的一代人在灵与肉、物质和精神、新观念与旧思维、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的二难选择中的伤痛、挣扎、尝试和追求，从而使小说在“驶入”与“驶出”之间表现出无限的张力。

韦昌是另一类典型。这个表面上老练无耻玩弄女人的暴发户，心底里却潜涌着人性的善良和对真爱的向往。他既有地痞无赖式的下流，又恪守生意人的严格信誉；既有商人的精明果断，又有黑社会的狡诈毒辣。在他身上集中了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带来的一切积极思想和庸俗观念。他是一个时代的畸形儿。韦昌行为的怪异，情感的多变和精神的困惑代表了 this 新兴阶层在都市化过程中急待解决的严峻课题。小说的最后，韦昌没能得到自己“找了一生一世的女人（志菲）”，但他并不绝望，而是中止了放荡无聊玩世不恭的生活，和一直深爱着他的芳嘉结了婚。这一耐人寻味的结局，是韦昌“彻悟”了人生真谛后的理智选择。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转型期社会的混乱和一代人的迷惘，而且显示了这一代人的觉醒与自救的成长轨迹，开辟了一条人的“自我解放”之路。

此外，谭辅成的中篇小说《小个子马波利》也以其独到的笔力塑造了一个由封闭的象牙塔走向现代都市文明的知识分子典型。这部探索型作品有一个突出的审美倾向，即不对人物作俗不可耐的道德批判，也不对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作强词夺理的谴责。他从人的个体性出发，对新都市人的各种人生尝试可能带来的得失和后果作出

合理的分析与前瞻，以此作为新都市人价值选择的参考。

这些作品中人物的“突围”方式各不相同，结局却很类似：物质上获得巨大成功，精神上（主要是爱情）却一片荒芜。肉体渴望在都市里博得满足，精神却希望逃逸都市物欲的海洋，这种“新都市人”的心理围城现象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新都市人”力求寻找一个精神需求和物质欲望的最佳切合点，但这个平衡支点还没有找到。因此，这些作品差不多都流露出或多或少的感伤情调：志菲等“南下小姐们的故事多数以悲剧收场”；小个子马波利等传统知识分子在现实的诱惑与冲击下也多少有点悲壮；慧芸、梅琳等都市本土女人也在各自的情感试验中败下阵来……但是，这些作品伤感却并不沉沦。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作家那种孜孜求索的生命气息。

三、批判与重构：茫茫欲海里的人文关怀

我们不能忽视生活经验对写作姿态的影响。打工作家或刚从内地南迁来的作家进入都市前，文化意识已经形成，都市对于他们则一片空白。而在南方都市中生活多年，或伴随特区一起成长的城市本土作家，受都市文化的熏染较深，大部分意识形态在都市本土经验中获得。同样面对都市，外来作家初来乍到发出的是“别人的城市”的感慨，而本土作家早在80年代就“投入角色”了。外来作家在都市受挫后可以退回到他来的地方（或乡村，或内地城市），本土作家可没有退路，不管都市带给他们的是幸福欢乐还是痛苦失意，他们都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关注都市、致力于都市家园的建设。于是，我们有了刘西鸿、何继青、张欣等人的别具一格的容

貌。

刘西鸿的《你不可以改变我》这一直言不讳的表述方式，表明了作者对于其陈述对象的一种热情真挚、坦率开放的态度。它同时也告诉我们，用另一种心态和眼光来观照都市，看到的可能是都市可爱的一面。在其后的《黑森林》、《爱人啊！路上到处都是》等作品里，刘西鸿更多地关注人的处境、人的心灵和人的价值。她的作品以其清新和健朗的风格给文坛注入了一股活力。何继青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他对都市的鲜明意见。在《泥泞街道》、《意外死亡》、《彼岸》等作品里，作者用反讽之笔撕开了各种各样的都市病，以及人们对都市病的无动于衷或无奈认同的麻木心理。他对都市主动介入的激情，并不掩饰他那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的老套路。如果说，刘西鸿主要是通过直接肯定都市的正面价值来倡导一种现代都市意识，那么，何继青则从痛斥都市阴暗面，致力于对都市精神家园的重构。

张欣则在批判与重构同时进行的模式上驾轻就熟。她在军营里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15—30岁），绿色文化的耳濡目染所铸就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转化到都市文学创作上，便是对都市人群精神现状的警觉及其表现。同样是质询都市，张欣在作品中出示的，就不是先锋派的颓废经验、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经验、或王朔式的游戏经验，而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生存经验。张欣对处于急剧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里正在衍生的某些畸兆、病态和隐患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并善于把它冷静地摊出来。《格格不入》揭示了逐步物化的都市对纯情人际关系的吞噬和普通人之间的人情冷漠现状；《绝非偶然》凸现夫妻之间各为其利明争暗斗的残酷世态。到了《你没

有理由不疯》，张欣对都市丑恶现状的冷静剖析被愤怒指控所取代。良知、人性和爱正在被拜金主义一点一点地吞没，敏锐的张欣感受到了都市人群精神的这种集体走向，并焦虑地向我们呈示物欲社会现出的阴霾。可以说，张欣及时地把一个正在溃瘍和腐化的都市推到了我们面前，以此提醒我们，对这个正在降临的黑暗前景保持充分的警惕。

张欣的小说立足于都市人群生存和精神的现状，笔触却指向人的未来。她对物欲满足后的人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方爱东（《免开尊口》）用肉体换来一幢“自己的别墅”，但每天只能在化妆、购物、减肥中打发日子；晓菲（《岁月无敌》）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坐轮椅的老人，换来明星享有的喝采，和镁光灯的闪烁，但那种狂欢之后却是悲凉、寂寞与啮心；爱宛（《爱又如何》）用皮肉交易换来“东方红”商场总经理之职，表面的繁华却遣不散内心的苦闷和寂寞，以及她对异性关爱的渴求。正是在参透了名利金钱之后，张欣成长为一个坚定的精神守望者和都市“招魂”者。她既为都市的混乱秩序和不法规范而愤怒，也为人在都市中遭遇的痛楚与伤害而哭泣，更为铜臭薰天、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未曾泯灭的人性而感动和欢呼。对黑暗事物的批判与对神圣事物的歌唱本是一切有正义感的作家的神圣职责。在文明的进程中留住我们的善根，把都市变成诗意的“家园”，正是张欣的“善良心愿”。因此，她的作品，在鞭挞不法和恶行的同时，又呼唤人性的真诚与美丽，倡导一种高贵自由的人性，而且着力颂扬纯粹而不做作的友谊，轻松和无功利的人际关系。正因如此，张欣的小说便给这个日渐冷漠、自私、实际的世界带来了一丝温馨，让我们在这个浮躁

近 20 年汉语方言学学术活动述评

□ 詹伯慧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510632)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从汉代扬雄（53BC—8AD）的《方言》算起，已经经历了 2000 年的历史。而运用现代语言科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来调查方言、研究方言，从而建立起现代汉语方言学，则是 20 世纪 20 年代才开始，迄今只不过 70 来年的历史。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末约 30 年间，汉语方言学处于奠基的阶段，一批语言学的前辈开始摸索并积累了一些方言调查的经验，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50 年代中期直至 60 年代中期这十年间，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蓬勃发展，但其工作大都属于“普查”、“探矿”的性质。只是到了 70 年代末期，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期才到来。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自南到北各地方言学者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全面调查，深入研究中来，使汉语方言

学在整个汉语研究中，乃至在整个汉学研究（Chinese Studies）中处于相当显著的地位，很有作综合考察的必要。

1. 方言学术团体和机构的组建

中央研究院当年一建立就设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但除了早期北京大学有个方言调查会作为汉语方言调查萌芽阶段的学术团体之外，就没有任何专门以方言研究为内涵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了。30、40 年代的方言调查工作，包括好几次大规模的分省调查，都是由史语所来组织的。50 年代初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方言组是所内重要的研究部门，它在全国方言普查中起到了总指挥、总调度的作用，但那时仍未有一个独立的汉语方言学术机构，也谈不上建立方言学术团体。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建立和方言研究机构

喧嚣混沌虚假的生存空间里感到一丝清凉，使我们看到重建都市的希望。

写作姿态是一个变量。随着作家对都市认识的深入和对自己的不断调整，我们看到，在创作初期表现出认同姿态的作家，在后来的写作中也加大了探索的力度。探索型作家的主体意识比较谨慎，他们较多地对都市人生的可能性作出解释，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较多可能的

选择。敢于对都市进行“现代性诉求”的作家还比较少，而且批判的力量也不强，有的批判则比较武断。一些新的都市意识已开始在一些作家的作品里萌芽。但是，这些“新质”的发展与成熟还有赖于作家对自己写作姿态的不断调整和优化。●

责任编辑：陶原珂

的诞生，都是 80 年代以后的事。

1.1.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建立

1979 年夏天，正是在学术界“枯木逢春，再发新枝”的历史时刻，一批汉语方言工作者齐集厦门市，共商研究的大计。在这次研讨会上，大家深感汉语方言资源丰富，调查面广，力量单薄而且分散，彼此间又互不通气，是很难使这个学术工作迅速发展的。当时有不少与会学者提出了“抢救方言”的口号，更增添了方言工作的紧迫感和现实感。经过两年多的充分酝酿，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汉语方言学术团体——汉语方言学会终于在 1981 年 11 月诞生。学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汉语方言工作者，推动汉语方言研究，为提高我国的语言科学水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于 1981 年 11 月 23—29 日在厦门举行，出席的方言研究者 100 多人，会上宣读了 60 多篇论文。著名方言学家李荣教授在会上致开幕词，对学会成立的目的和方言调查、方言研究的有关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随后通过了学会章程，讨论成立了学会理事会，选出首届理事会理事 19 名。至 1995 年底，会员已达到 520 多名。从 1981 年起，两年一届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讨论会接连举行了九届，从未间断过。其时间、地点、人数和论文分别是：福建厦门（1981 年约 100 人，论文 60 多篇）、安徽合肥（1983 年 97 人，论文 89 篇）、山西忻州（1985 年 160 多人，论文 65 篇）、浙江舟山（1987 年 130 多人，论文 109 篇）、湖南大庸（1989 年 130 多人，论文 70 多篇）、江苏南京（1991 年 120 多人，论文 60 多篇）、山东青岛（1993 年 130 多人，论文 90 多篇）、湖北武汉（1995 年 110 多人，论文 95

篇）、广东汕头（1997 年 140 多人，论文 70 多篇）。从第三届学术会议开始，每届都有香港和国外的学者应邀出席。自从海峡两岸沟通以来，每届都有台湾同行学者与会。1991 年在南京举行学术讨论会，适逢学会成立十周年，新一届的理事会改变原来不设会长（理事长）的初衷，一致推荐李荣教授为学会会长，此后一直蝉联至今。在南京年会期间，还通过了修改章程的决定。新的章程写明，理事会设会长和秘书长各一名，由学会挂靠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提名，经会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还将学会定名为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其英文名称为 CHINESE DIALECTS SOCIETY，简称为 CDS。

1.2. 各地方言研究机构的设置

在成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同时，各地语言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也分别设立方言研究的学术机构。如复旦大学早就成立了吴方言研究室，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也都先后成立了汉语方言研究室或研究中心。有的省、市如山东、山西、湖南、天津、广东、汕头等也成立了省、市一级的汉语方言研究团体，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方言组，在 80 年代方言研究渐成热门，方言研究课题不断增加的形势下，也发展成为所内最具实力、影响较大的方言研究室。近十年来，像《中国语言地图集》、《现代汉语方言词典》（40 卷）这样空前巨大的语言研究工程，就都是在这个方言研究室的策划组织下，在李荣教授为首的许多专家共同努力下，陆续完成的。

正在筹备成立汉语方言学会的同仁更是深受鼓舞，刊物出来后，学会组织更望早日建立起来。《方言》杂志的问世，对于当时正在筹备中的汉语方言学

会，无疑是重要的催生剂。

2.1. 《方言》杂志开局不凡，既出刊又育人

在李荣教授倡导和策划下，该所1979年2月24日创办专业杂志《方言》季刊。它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方言专业期刊。《方言》创刊号共登四篇文章，两篇是深入探索连读变调的：李荣的《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和叶祥苓的《苏州方言的连续变调》；一篇是记录浙江平南话地点方言：《平阳方言记略》（陈承融）；再一篇是《用数学方法描述方言的差别》（陈汉青、朱建颂）。此外，创刊号还附有《方言工作者调查表》，这是经过“十年动乱”方言工作被迫长期停顿以后，第一次对散居各地的方言工作者进行摸底联络的调查表，以显示组织方面的准备情况。此后，《方言》杂志就以每期80页16开的篇幅在每季度的中间月份（2、5、8、11）如期出版，从未有脱期的记录。在头一年的《方言》中，就发表了两位海外学者罗杰瑞（美）和桥本万太郎（日）关于闽语和吴语的文章。其中罗杰瑞的《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是当代闽语研究中很有影响的力作。1980年，《方言》更发表了语言大师赵元任的《一套标调的字母》和吕叔湘先生的两篇关于他的家乡丹阳方言的文章：《丹阳方言声调》和《丹阳方言指示词》。另一位海外学者Peter Ladefoged的专著《声学语音学纲要》的译稿也分期刊出；日本著名汉学家波多野太郎的《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篇》九卷的总目录也在这一年的《方言》上加以介绍。在出版两年共八期57篇文章以后，已显示出这份刊物作者广泛、起点较高、编辑严谨的办刊势头。以李荣主编为首的编辑部在1981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方言

两年》的文章，作为编辑部给读者和作者的公开信，算是“发刊辞”的补课。此文把两年来该刊发表的文章加以归纳分类，并分别计出各类文章所占比例，共得以下14类：方言记略、语音、文白异读、声调、语法、构词、词汇、本字、方言地理、古方言、声学语音学、音标、研究情况与书评、书目、其它。从这14类看来，起步不久的《方言》，所刊登的文章已经几乎涵盖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方面面了。该文除了统计、总结两年来所刊文外，还以大量的篇幅不厌其详地就这14类不同稿件的写作方法，需注意哪些地方等等作出了具体的指引，提出了编辑部的要求。有人说“办刊也是培养人才”，此言非虚，《方言》杂志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方言》创刊至今已快20年了，按每年4期计算，已出刊近80期。一年有320页约52万字，如是则20年将突破千万字的大关，这是方言学界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门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学问，如何在承传与创新中一步步地跟上语言科学发展的步伐，如何在不断发掘，不断进取中校正方位，突出重点，驾驭全局。

2.2. 《方言》所刊文章分类初析

参照《方言两年》中的分类而略作调整，我们总览《方言》20年来发表的近700篇文章，共得以下16类。

第1类：方言记略。共26篇，约占《方言》所刊文章的4%，其中广东6篇、湖南4篇、四川、河南各3篇、广西2篇、江苏、浙江、福建、山西、陕西、甘肃、青海、黑龙江各1篇。

第2类：方言音系及同音字表。这类文章包括：（1）方言音系；（2）方言语音特点；（3）方言同音字汇等，共有108篇。其中音系描写有26篇，以音

系特点及声、韵、调具体特点为题的有 53 篇，属同音字汇的有 29 篇。这部分约占《方言》所刊文章总数的 16%，足见语音系统及其特点的调查研究，在方言工作者心中仍占突出的地位。

第 3 类：文白异读和连读变调。以文白异读为题进行调查研究的有 3 篇，占文章总数不到的 0.5%。这反映出文白异读现象在汉语方言中普遍性并不大，因而专题论述也就不多；而连读变调研究则在《方言》所刊文章中出现过 36 篇之多，占文章总数 5%，显示出连读变调在方言中有相当的普遍性。此外，不属“文白异读”和“连读变调”的其他揭示连读音变现象的文章，在《方言》中也有少量出现。

第 4 类：方言词汇和方言词典。记录、描写方言词汇的文章，或较全面地列出作者调查到的某方言的词汇，或仅仅揭示方言中某类词汇（如常用词、单音节词等），或就个别方言词进行研究。这类文章 58 篇，占《方言》所刊文章的 9%。其中以“××方言词汇”为题罗列方言词语的有 17 篇。

另一部分为方言词典的《引论》。由李荣主持的《现代汉语方言词典》近几年陆续分卷问世，其中有些词典的引论在《方言》和读者见面，迄今已发表 22 篇，占《方言》文章 3%。

此外，还有李荣教授所撰带理论性的《方言词典说略》，也可算进这一类。

第 5 类：方言语法。揭示方言语法特点，包括词法、句法等各种语法现象的描述，在《方言》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达 122 篇之多，约占《方言》所刊文章总数的 18%，比起语音方面的文章还要多。这些文章中谈词法方面的比谈句法方面的多。词法中尤以讨论形容词、代词、助词的为多，揭示方言中“重

迭”现象各具特色的文章也不少。

第 6 类：方言演变和方言比较。研究某种方言现象的发展变化，对不同方言进行比较，讨论方言间的相互影响，这类文章的撰写有较大的难度。在《方言》所刊文章中，前后近 20 年间只出现 33 篇，占文章总数接近 5%，反映出方言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的稿源不够充足。

第 7 类：方言用字（本字、训读字、特殊字等）。讨论方言用字问题，主要是“考本字”方面的文章，也有一些就个别方言词的词源及释义进行探讨，对“训读字”或“特殊字”进行讨论，这类文章在《方言》中共发表了 30 篇，约占 4.5%。其中考本字的文章涵盖的方言面较狭窄，只考证了广州、北京、无锡及闽语的少量本字。

第 8 类：古方言、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在《方言》所刊文章中，从 1979 年到 1997 年，只看到 9 篇有关古代方言、方言古籍及与此相关的文章，占《方言》所刊文章的 1.5%。

第 9 类：方言分布、方言性质、方言特点的综述。介绍、论述方言的情况、性质或某些特征的文章，在《方言》上刊出的有 30 篇，占《方言》所刊文章总数 4.5% 左右。

第 10 类：方言归属与方言分区。汉语方言的分区和各地方言的归属长期以来一直是方言学界关注的热点。《方言》杂志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共 56 篇，约占总数的 8.5%，为数是不不少的。《方言》刊出这类文章具有成组发表的特色。1984—1986 年这段期间，是《方言》杂志发表讨论方言分区问题最为集中的时期。这跟当时该研究室组织力量编绘《中国语言地图集》，急需解决方言区界、方言归属等问题不无关

系。

第 11 类：方言地图。尽管 80 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工作上马以后，方言地图的问题普遍引起方言工作者的注意。但在《方言》上刊出过的方言地图却寥寥无几，一共只有三篇：一是 1984 年刊出的《台湾省语言地图八幅》；二是 1985 年刊出的《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三是 1985 年刊出的《广西蒙山语言地图说》。这三篇方言地图的文章，只占《方言》所刊文章总数的 0.4% 左右。

第 12 类：方言研究理论方法、教材及声学语音学知识。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理论、方法以及所需教材、表格和相关的语音学知识，《方言》杂志从培养人才的需要出发，也陆续发表了 25 篇文章、资料。约占所刊文章 3.5%。其中关于国际音标，《方言》从创刊号开始每隔几年就刊登一次修订的国际音标稿及相关的说明。一些方言工作者经常使用的调查方法，《方言》也多次刊出，为读者提供方便。

第 13 类：学术活动、信息的报导。这方面文章 31 篇，约占所刊 4.5%。

第 14 类：方言学家。《方言》发表过介绍或追思著名方言学家的文章 7 篇，约占其所刊文章的 1%。它们包括 1982 年刊出的《赵元任》，1988 年刊出的《李方桂》，1989 年刊出的《丁声树》，1992 年刊出的《朱德熙》，以及报导桥本万太郎教授逝世的消息（1987），怀念朱德熙教授的文章等。

第 15 类：方言书讯、书评及序跋。《方言》创刊以来发表评述或介绍重要方言书籍及方言著作的序跋共 32 篇，占《方言》所刊文章的 4.5%。

第 16 类：港澳语言（方言）问题。随着香港回归和澳门即将在 1999 年回

归，语言学界十分关注今后港澳语言应用问题。《方言》为此也在 1996—1997 年发表了 7 篇论述港澳语言（方言）问题的文章，约占所刊文章的 1%。

2.3. 从《方言》杂志看到的汉语方言研究动向

从上述对《方言》杂志所刊 1000 万字近 700 篇文章的分类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其内容以方言语法、方言语音、方言词汇及词典三类文章为最多。三者加起来约占《方言》所刊文章的一半。这既合乎汉语方言客观存在的实际，也符合多年来方言学界同仁一直在倡导的“多多调查词汇，多多研究语法”的精神，反映出长期以来词汇、语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得不到充分重视的偏向正在扭转过来，而《方言》杂志正是在这方面发挥着推动作用。其次，在方言语音研究方面，自 80 年代以来，明显的趋势是从一般地记录描写一个方言的语音特点转到深入挖掘方音的特点，全方位地观察方言语音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及其变化中来。从《方言》杂志 20 年来发表的 100 多篇探讨方音的文章看，这一趋势十分清楚。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连读变调问题的讨论。《方言》杂志在其中起了引导作用。《方言》发表连读变调的文章 36 篇，其中在创刊的第一年就发表了 7 篇，占全年 28 篇文章的四分之一，而单是讨论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前后就有 6 篇。从这里我们体会到，《方言》杂志抱有一个推动学术事业向前发展的良好宗旨。

3. 学术会议的频繁举行

20 年来，汉语方言学的振兴，除在上面述及学术团体、学术机构的组建和学术刊物的创办方面得到反映以外，更为重要的一环，就是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汉语方言学术研讨会空前活

跃。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汉语方言学界所举办的专业会议此起彼伏,具体数字虽还缺乏准确统计,大概可以说,每年总有两次以上的方言学术会议在南北各地以至港澳地区举行,除了上述全国方言学会年会之外,还有下面一些较为引人注目的方言学术会议。

3.1. 国际粤方言研讨会

以探讨粤方言问题为主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是除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学术年会以外最为活跃的一个定期举行的汉语方言学术会议。首次会议由香港粤语学者1987年发起,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接下来每两年一届,轮流由香港—广州—澳门主办,周而复始。每次研讨会后都印有论文集(第四次的未刊)。下面是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的情况。

届次	时间	地点	召集人	出席人数	论文数
1	1987.7.1-3	香港	单周尧(香港大学)	50多人	40多篇
2	1989.7.31-8.2	广州	詹伯慧(暨南大学)	约50人	40多篇
3	1991.7.31-8.2	澳门	胡培周(澳门中国语文学会)	约40人	30多篇
4	1993.12.17-19	香港	陈志诚(香港城市大学)	约100人	60多篇
5	1995.12.21-23	广州	詹伯慧(暨南大学)	70多人	60多篇
6	1997.8.4-6	澳门	胡培周(澳门中国语文学会)	约70人	40多篇

3.2. 国际闽方言研讨会

由福建方言学者倡议举办的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从1988年在福州举行第一届研讨会开始,到1997年2月在泉州举行第五届研讨会,已开过五次,也是定期举行的,从第二届开始就有台湾的闽语同道前来参加。第二、三、四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均已出版,第五次的论文集在梓印中。五次次会议简况如下:

届次	时间	地点	召集人	出席人数	论文数
1	1988.4	福州	李如龙(福建师大)	约30人	20多篇
2	1990.8.9-12	广东汕头	梁东汉、林伦伦(汕头大学)	65人	55篇
3	1993.1.11-12	香港	张双庆(香港中文大学)	63人	46篇

4	1995.4.7-9	海口	詹伯慧、李如龙(暨南大学)、张双庆(香港中文大学)	50多人	40多篇
5	1997.2.20-22	福建泉州	詹伯慧、李如龙(暨南大学)、张双庆(香港中文大学)、周长楫(厦门大学)、王建设(华侨大学)	50多人	44篇

3.3. 国际吴方言、晋方言、官话方言研讨会。除了上述粤、闽方言举行过多次国际研讨会外,1988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过一次国际吴方言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和复旦大学吴方言研究室共同主办。徐云扬、许宝华两位教授为召集人。“晋语”是1986年由李荣先生提出的,作为汉语方言中独立于官话以外的一种方言。1995年2月25—27日在太原举行了首届晋语国际研讨会,有60多位学者出席,会上宣读了31篇论文,会议由侯精一、温端正、陈庆延等晋语学者主持。官话方言是中国最大的方言,1997年7月22—24日在青岛举行了首届官话方言国际研讨会,出席的学者109人,提交论文92篇,会议由钱曾怡教授(山东大学)主持。

3.4. 客家方言(国际)研讨会。

客家方言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研究者于1993年9月聚会福建龙岩,举行了首次客家方言研讨会,1996年8月在广东增城举行了第二届客家方言(国际)研讨会,这第二届会议有台湾、香港的客家方言学者前来出席,由饶长溶、李如龙、周日健等客家方言学者主持。会议决定要把客家方言研讨会办成两年一届的国际学术会议。

3.5. 李实学术研讨会。

1991年9月在四川遂宁还曾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国际李实学术研讨会,有来自日本的研究李实《蜀语》的学者和国内一些方言学者出席,会上对《蜀语》这部记录四川遂宁一带300年

前方言的名著进行了讨论，出席的国内外学者共 40 多人，宣读论文 20 多篇。

3.6.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研讨会。

闽南方言是闽、粤、台、琼等省的主要方言之一，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在台湾，闽南方言的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在两岸沟通以后，两岸闽南方言的研究者都渴望能坐在一起共同探讨闽南方言调查研究的问题。1994 年 10 月 7—9 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学术研讨会”终于偿了大家的夙愿。这次会议规模较小，学术气氛和两岸骨肉情谊却都很浓，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研讨会今后还能继续开下去。

此外，近年还有一些小型的方言专题研讨会陆续举行，如由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1996 年 12 月 20—21 日举办的“首届东南亚华人语言学术研讨

会”；由李如龙、张双庆（香港）平田昌司（日本）等学者组织的“东南方言语法比较研讨会”自 1993 年 7 月在上海举行首次会议后，1994 年 8 月在韶关，1995 年在武汉，1996 年在黄山等地又先后举行了 4 次，每次会都围绕着某个方言语法问题来开展，会后出版论文集，第一、二、三本均已问世。

还应该一提的是，在深圳举行的“双语双方言”定期研讨会，由深港语言研究所陈恩泉所长主持，自 1988 年以来已开过 5 次，研讨会的内容是联系方言地区双语应用的实际，重点探讨双语双方言（含多方言）的社会应用问题，每次会议都在深圳举行，都有海内外学者出席，都出版论文集，堪称异军突起的国际学术会议。

责任编辑：陶原珂

自我意识的发展与公民教育的基本策略

□ 黄甫全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 510631)

策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定向于大范围行动过程的宏观策略，另一个是定向于具体活动进程的微观策略。公民教育的基本策略，在本文中只涉及宏观策略层次，指的是为了满足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需要，根据社会、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形势而研制的加强和优化公民教育的行动方针和重大措施。

一、“教育宗旨”的更新策略

教育宗旨规定教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宗旨”的更新策略，就是在政策、法规、舆论、观念和整个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建构和确立“培养公民”的新教育宗旨。这一策略的社会心理学依据是：自我意识实质是打着时代烙印的社会意识，当代自我意识的社会本质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崭新的以“培养公民”为宗旨的现代公民教育。

自我意识，就其形式结构而言具有普遍性，是“指人对自己的属性、状态、活动（外部活动和内部精神活动）

的认识、体验，以及对自己的情感意志活动和行为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

①首先，“自我意识就是自己对于所有属于自己身心状况的认识。”②所以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 - 1931）把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主我是对自己认识的自我，也就是自我反省时对自己特征的认识；客我则是作为主我觉察和体验对象的自己作为人的一切的总和。客我又可分为三部分：“物质客我”、“社会客我”和“精神客我”。③物质客我，包括自己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自己的服装、家庭中的亲人、家庭环境等；社会客我，是指自己受到朋友们的认可，给周围人留下的印象、个人名誉地位，以及自己在所参加的社会群体中起到的作用；精神客我，则是指自己的智慧、能力、人格倾向等等的总和，包括感觉知觉的经验、情绪情感体验、各种动机欲望等。

自我意识，其内容具有特定社会性，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社会内容的自我意识。在社会心理学看来，自我意识的现代形态，就是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实质上是公民个人在心理层面上对自己在国家生活中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认识状

态和实践状态相统一的行为方式,是公民认知、公民情感、公民意志和公民行为的统一”。④公民意识,作为现代社会里的一种自我意识,是以现代社会活动关系为内容的一种时代自我意识。在狭义上,现代公民意识包括体现“主我”的平等和爱国意识、民主和自由意识;在广义上,它还包括体现“社会客我”的现代公民道德,以及体现“精神客我”和“物质客我”的现代公民智慧。现代公民道德,作为基本价值观念,包涵着从传统的劳动价值观更新为现代的“发展价值观”的转换;作为普遍行为规范,主要体现在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生态道德等四个领域里。而现代公民智慧,包涵着健康智慧、情感智慧和认知智慧。由此看来,公民意识涵括了人之成为“现代人”的整体素养。所以,培养公民意识,需要改造和革新现有教育模式,构建和确立以“培养公民”为宗旨的,作为新的教育形态和教育模式的,“整体”的公民教育。

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宗旨的正规提法有一个从“培养劳动者”到“培养公民”的演变过程。50年代开始,我国确立的教育宗旨是“培养劳动者”;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提法比较多,有“培养劳动者”、“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以及“培养‘四有’公民”等。“培养公民”的提法,其实在80年代的正式文件中就已经明确了,1986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到了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之一是,“培育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从那以后,每年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的重要会议上出台的重要报告和决议等文件,均反复提出要重视“培养公民”问题。直到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又再次强调,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不要培养劳动者、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仅仅培养劳动者、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不足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社会和个人的客观需要决定了,最根本的是培养公民。培养公民统摄着培养劳动者、培养建设者和培养接班人,而培养劳动者、培养建设者或培养接班人,仅仅分别是培养公民的众多内涵之一。

确立“培养公民”的新教育宗旨,就是明确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的规定性是“公民教育”。在公民教育中,通过“民主法治教育”,培养“主我”范畴的现代公民的平等和爱国意识、民主和自由意识;通过“体育”,培养“物质客我”范畴的现代公民的身体健康智慧;通过“德育”,培养“社会客我”范畴的现代公民道德;通过“心育和智育”,培养“精神客我”范畴的心理健康智慧、情感智慧和认知智慧。从而,使人们形成和确立“主我”和“客我”健全统一的现代公民自我意识,把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培养成为真正的“中国的公民”。

二、“终身教育”策略

“终身教育”策略,含有“公民教

育是贯穿终身的教育”的新观念，旨在建立贯穿“家庭、幼儿园、学校、工作岗位和社会生活”人生全程的“终身公民教育”体系。这一策略的社会心理学依据是，自我意识的“终身发展”观。

传统观念认为，人的自我发展仅仅是从出生到成人期间的事，公民教育仅仅是教育的某一阶段的事，比如我国目前学校中就仅仅在初中一年级进行一点“普法”意义上的“公民教育”^⑤。现在，自我的发展观已经更新了，那种“阶段性”、“点缀式”的公民教育也需要彻底变革。

著名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 1902 - 1994）虽然主要研究儿童阶段的发展，但他的视野却是“毕生发展”性的。他认为，自我的发展实质是人与环境的“同一性”的形成和实现^⑥。自我的“终身发展”经历八个“年龄阶段”：一是婴儿期（从出生—18个月），是获得基本信任感，克服基本不信任感的阶段；二是童年期（从18个月—4岁），是获得自主感，避免怀疑感与羞耻感的阶段；三是学前期（4—6岁），是获得主动感，克服内疚感的阶段；四是学龄期（6—12岁），是获得勤奋感，避免自卑感的阶段；五是青春期（12—18岁），是获得同一感，克服角色混乱的阶段；六是成年早期（18—30岁），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的阶段；七是壮年期，是获得创造力感，避免自我专注的阶段；八是老年期，也是成熟期，是获得自我完善，避免失望感的阶段。

埃里克森自我发展的八个阶段论，这为建立和实施终身公民教育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而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又为实施终身公民教育提出了紧迫的客观要求，也提供了实现的客观条件。

在终身公民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体，岗位教育是强化，社会教育是关键。家庭公民教育有两个内涵：一个是从空间上指与学校、社会相对的家庭范围的公民教育；二是从时间上指与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相对的婴幼儿的家庭教育。家长应该升华自己的教育情感，在亲子之情和血缘之爱的基础上超越和走出“儿女是私有财产”的小农观念，满怀社会和国家责任感，精心爱护、养育和培养儿女，让他们在家庭生活过程中充分体验到自己既是家庭的一员，更是国家的公民。在婴儿期，家长或其代理人在孩子的饮食、睡眠、玩乐、穿戴、皮肤接触以及学习说话和行走等方面，应尽情尽心尽力，让婴儿的需要与外界对他需要的满足保持基本的一致，使他养成对他人或环境的基本信任；同时要适时适度地对他的需要和行为给予一些限制和危险警告，使他获得有限对象的基本不信任感。从而让他的基本信任感占主导地位，同时保持必要的基本不信任感，两者形成必要的张力。在儿童期，孩子有了独立自主的要求，教育中首先不搞包办代替，不搞斥责体罚，应积极鼓励他独立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满足与限制、安全与危险、鼓励与忠告、表扬与批评的度的把握和选择之间，贯穿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本位、儿童发展本位的价值标准，以便在孩子获得的基本信任和基本不信任、自主与怀疑以及羞耻之间的张力中孕育起公民意识的萌芽。

在学校教育中，建构起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一体化公民教育。18世纪初，美国在著名教育家贺拉斯·曼的疾呼和奔走影响下，就形成了一场持久的公民教育运动，在学校

中普遍开设公民课程,从而孕育出了持久的极具凝聚力的美国公民意识。至今,公民教育仍然贯穿于大中小学幼儿园。1994年颁布在全美实施的《公民与政府科课程标准》,内容围绕“美国公民生活与政府职能”、“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美国政府实现民主的做法”、“美国与国际事务”以及“美国公民角色的扮演”等5个核心主题,分布到“幼儿园至4年级”、“5至8年级”以及“9至12年级”等三个阶段。“随着学生年龄与身心成熟的程度,其课程的内容或有所不同,但其所围绕的课程重点则始终一贯而统整。”^⑦我国应组织力量,研制出中小学幼儿园一体化的公民教育课程,完善大学公民教育课程,并尽快实施,从而把大中小学幼儿园一体化公民教育落到实处。

学校后的公民教育,包括岗位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其中职业岗位教育和社会教育是重点。职业岗位公民教育,主要是确保每一个工作者的工作劳动、人身安全、获取合理工作酬金、进修接受继续教育等权利,同时进行工作责任、职业道德、职业法规和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力等教育。社会生活中的公民教育,主要是确保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享受社会福利、自由生活活动、健康发展等权利,同时进行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社会公德、生态道德等教育。

三、“权利本位教育”策略

“权利本位教育”策略,就是孕育和发展“公民权利本位”的现代观念,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实施“公民权利本位”教育,在公民教育中建构权责主体,把每一个体培养成为既充分享受主

体权利,又自觉履行主体责任的现实公民。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它为“公民权利本位教育”提出了客观要求和提供了外在物质条件,而自我意识则为之提出了个体的主观要求和提供了个体的内在能动条件。

“个人的自我意识是由自我认知、自我体验与自我控制三种心理成分所构成。”^⑧自我认知,是主我对客我的认知和评价,即自己对自己身心特征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己作出的某种判断。自我体验,是自己对自己怀有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主我对客我所持的一种态度。例如,自信、自卑、自满、自责、自我欣赏等都是各种自我体验。自我控制,是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通过自身特殊的机制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过程,包括目标选择、目标认知、维持方向、改变方向和实现目标等。自我意识,其实就是在自我认知和体验基础上对自己内部和外部活动行为的调节、控制过程,表现为对自己的一种主动态度。这种态度,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质,人们需要张扬的是主动进取的自我积极态度,这表现为自我效能、自尊心和自信心。自我效能是自我意识中的一种积极态度和品质,具体说,就是具有智慧品质、能积极思考和行动而改善环境取得成功,它能有效地增进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自尊心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荣誉,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不容别人歧视侮辱,维护自我尊严的自我情感体验。与自尊心密切相关的是羞耻心。它总是同上进心、荣誉感联系在一起,是指由于发现自己在认识上、行为上的不足、缺点和错误而感到羞愧,受到别人侮辱而愤懑。自信心是对

自己力量的充分估计,是人发展成长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心理品质。总之,自我意识是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的综合,充分体现了“主我”的“主体”地位和价值。

自我意识所具有的“对自己的主动态度”的规定性,使得公民在现代法治和现代道德条件下,在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的生命周期”中,都是一个权责主体。无论是婴幼儿、儿童少年,还是青年、壮年和老年,无论在家里、学校里还是在工作单位和社会上,公民具有不容侵犯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受教育权利,也负有尊重他人权利和接受教育的义务和责任。因而,在公民教育中,社会、父母、教育者应树立一种尊重公民主体权利的观念,杜绝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使每一个个体成长为自觉的权责主体,为实现自身的权责主体的社会现实地位而不懈地努力和奋斗。为此,需要强调下面两点:

第一,“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加速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换,真正确立公民的主体地位。”^⑨全社会在不断推进“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法治建设,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在教育中实现从“责任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换,改变那种仅仅只强调受教育者和公民“遵守纪律”和“履行义务”的状况,首先强调和开展“公民权利”教育,向受教育者和公民宣传并保障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的实现,同时对他们进行“纪律和义务”的教育。也就是说,家长对孩子、校长和教师对儿童学生、政府对公民、官员对平民、领导对群众、雇主对雇员等,首先讲的和做的是应该让他们清楚法律赋予了他们哪些权利,怎样保障他们的权利得以实现,他们应当怎

样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才是进行“纪律和义务”的落实。

第二,重建道德。首先是深层次的道德价值观念转换,即从传统的劳动价值观念更新为现代的“发展价值观念”。近代以来,在工业化大生产劳动条件下占支配地位的是,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劳动凝结的这样的“劳动价值观念”;然而在理性主义无限制地膨胀为“理性至上”的社会思潮背景里,它从追求劳动扭曲为追求占有劳动,并且迅即异化成为以“钱”为根本标准的“钱本位”价值观念。这样的观念直接地导致了传统美德的沦丧,进一步还导致了对大自然的巧取豪夺,严重地危害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使人类不得不吞咽着自己制造的恶果。进入20世纪下半叶,人类在反思、批判自身的行为和观念时,走出“理性至上”的迷雾,第一次把人、社会和自然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加以整合。“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超越“劳动价值观念”的发展价值观念。在发展价值观念里,劳动是有价值的,人劳动时是有价值的,有劳动凝结其中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是有价值的,……那种超越了劳动的“生活”本身更是有价值的。只要是存在就是价值,至于是正价值还是负价值,根本标准是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我们需要构建以“发展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由新的家庭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生态道德组成的伦理体系。在这样的新伦理体系中,公民是优先于社会的价值存在,因而公民首先是道德权利主体,同时也是道德责任主体。

四、“活动教育”策略

这里的“活动教育”策略,就是要

超越长期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以语言传递为根本特征的“授受教育”模式,建构起强化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以感受体验为根本特征的“活动教育”新模式,让受教育者在活动中充分实现公民的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把自己培养成作为现实社会活动主体的真正公民。

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在个体自己把自己当成认知、体验和控制的对象的过程中实现的。自我发展是以语言符号为中介的个体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过程,这种相互作用必须在个体与他人的社会活动中才能实现。在自我意识中,个体经验到他自我本身,并非直接的经验,而是间接的经验,是从同一社会群体中其他个体成员的特定观点,或从他所属的整个社会群体的一般观点来看待他的自我。从自我的自身,到外在的社会环境中的他人群体或个体,又再返回到自身的自我,这一自我意识过程必然是一个意义的表达、理解和传递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思维过程。所以,自我,作为可以成为其自身的对象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验。显然,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整个过程的关系以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自我所由产生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意味着个体在群体中的相互作用,意味着群体的优先存在,还意味着群体的不同成员都参与其内的某种合作性活动,即社会活动。相互作用的形式是活动,社会经验和过程的实质是活动,没有活动,自我意识就不能得到发展。对自我意识而言,相互作用是实质,符号作为媒介是必要条件,而社会活动作为自我意识内容的源

泉则是充分条件。

自我意识的社会活动性,启示我们在实施公民教育中,必须超越现有的“授受教育”模式,建构“活动教育”模式。我国现在的教育模式的核心和实质,是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教育者讲授、受教育者被动接受式的“课堂教学”。这一模式,源自19世纪德国以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8-1841)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教育模式,它以培养作为伦理个体的社会顺民为教育目的,以传统文化和成人经验为支撑,以历史、神学和文学为中心,以班级上课为教育组织形式,以联想和统觉心理理论为实施依据,形成固定的教育过程结构:“明了→联合→系统→方法”^⑩。这一模式往东传到俄罗斯和后来的苏联,经过改造,形成的教育过程结构为:“知觉具体事物→理解事物的特点、关系或联系→形成概念→巩固知识→形成技能、技巧→实践运用”^⑪。这一结构比较僵化,在苏联流行了几十年,到50年代传到我国,与我国传统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结构相融合,逐步形成了以“教师中心、课堂中心和课本中心”为核心的僵化而顽固的教育过程结构:“引起求知欲→感知教材→理解教材→巩固教材→运用知识→检查知识、技能和技巧”^⑫。这一模式结构,仅仅适合已有知识经验的传递和传播,一直支配着我国教育界的思维和实践。而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模式,往西经过西欧,渡过大西洋到了美国,刚刚在教育实践中产生影响,就遭到了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美国人的顽强抵制和彻底批判,引发了一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美范围的“进步教育运动”,其著名旗手是集大教育家、大心理学家和大哲学

家于一身的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博士。他深入地批判了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模式, 明确提出“现在, 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 这是一种革命, 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 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 儿童是中心, 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⑬杜威从他的经验自然主义的哲学出发, 在教育问题上, 超越成人经验而特别重视儿童的经验。儿童经验是活经验, 是活动中的经验。杜威旗帜鲜明地写道: “学校科目中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 不是科学, 不是文学, 不是历史, 不是地理, 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⑭这里的社会活动, 是具有学校、家庭和社会一致性的, 既是社会所需要的, 又是家庭里经常开展的, 还是学校可以开设的。在杜威当时开出的社会活动单子中, 有烹饪、缝纫、手工和建筑等。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相结合, 人们突破了传统的“授受教育”模式, 建构起了美国式的“活动教育”模式。

借鉴美国现代教育改革的经验, 把握教育模式演变的历史趋势, 推行公民教育, 培养公民意识, 就必须超越性地否定现行的“授受教育”模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活动教育”模式, 让受教育者在活动中进行公民自我认知、公民自我体验和公民自我控制, 从而实现公民自我意识的充分发展。●

①冯契主编《哲学大词典》, 上海辞书出

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第 606 页。

②⑧时蓉华著《社会心理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35、148 页。

③转引自周晓虹著《现代社会心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46 页。

④⑨黄甫全:《学校公民教育: 问题及其对策》, 《学术研究》1997 年第 4 期。

⑤我国专门的法规性文件规定, 只在初中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和遵纪守法教育”中开展一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教育”。参见《小学德育大纲》, 《人民教育》1993 年第 9 期, 第 27—30 页;《中学德育大纲》, 《人民教育》1995 年第 4 期, 第 9—13 页;《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 《中国教育报》1995 年 12 月 21 日。

⑥ Erik H. Erikson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pp. 247—274.

⑦单文经主编《美国教育研究——师资培育及课程与教学》, 台北市师大书苑有限公司 1998 年版, 第 249 页。

⑩赫尔巴特著《普通教育学》。载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274 页。

⑪参见凯洛夫主编《教育学》。此处转引自王道俊、王汉澜主编《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90 页。

⑫参见王道俊、王汉澜主编《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01—209 页。

⑬杜威《学校与社会》, 载赵祥麟等译《杜威教育论著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32 页。

⑭杜威《我的教育信条》, 载赵祥麟等译《杜威教育论著选》。

责任编辑: 陶原珂

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的探索

——读刘卓红《回归与重构——卢卡奇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

□ 邱亿通

(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博士 510031)

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演变出不同的理论形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发展过程中不同理论形态的关系，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使命。近读刘卓红教授新著《回归与重构——卢卡奇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以下简称《重构》），深感读者为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轨迹作了十分可贵的探索。

卢卡奇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但是，对他本人及其哲学思想，世人却一直争论不休、褒贬不一。在我国，大多把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主要代表，更多关注的是卢卡奇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关系。《重构》则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发展的全新角度来研究卢卡奇哲学，力图使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回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坐标上，为客观评价卢卡奇哲学找到立足点。作者通过论述卢卡奇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揭示其哲学思想的鲜明时代性和文化特点，从而以点带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发展的多样化。在我看来，作者无意成为卢卡奇哲学问题研究的专

家，而是从卢卡奇哲学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里，把握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脉络，仍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是作者真实的理论目的和现实使命。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通过论述卢卡奇哲学思想体系发展的特点，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多样性形态，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完整开放性，揭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紧迫性。”

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有着多重性。他的思想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先是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后又把兴趣投向新康德主义，直至他研读黑格尔哲学，便开始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之后，他的思想又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转折，早期与晚期的思想就明显不同。他的每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人们的评价却往往截然不同。这些，注定了研究卢卡奇思想的难度。由于卢卡奇哲学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在不同时期受不同的思想流派的影响，这说明了，对卢卡奇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作简单的单线分析，而必须深入研究卢卡奇与各种思想体系的关系。《重构》联系时代背景分析了卢卡奇哲学思想的

演变，在广泛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考察了卢卡奇如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对卢卡奇思想进行多角度考察，不仅考察了卢卡奇与马克思、列宁之间的思想关系，而且也考察了与黑格尔、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斯大林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等，这显然超越了某些文章或著作对卢卡奇哲学思想所作的片面的、贴标签式的评价。

基于对卢卡奇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重构》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围绕“实践的思想”、“总体辩证的方法”、“人的问题”三大主题，概括论述了卢卡奇哲学的结构体系。通过对这三大主题的论述，既抓住了卢卡奇哲学思想体系的实质，概括了卢卡奇哲学的全貌，体现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作者强调指出：“实践的思想、总体辩证的方法、人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三大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精华，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须重点探讨的问题。无疑，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进一步探讨这些

问题，构成了当代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主题。”

读罢全书，掩卷静思，《重构》在论述卢卡奇哲学思想体系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这样的时代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和开放的体系，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第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深刻地把握其思想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和现实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丰富、完善和更新；第三，任何理论的价值在于创新，创新的基础是实践，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才能最终把理论推向发展，而不是推向教条主义的泥坑。●

（《回归与重构——卢卡奇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刘卓红著，广州出版社出版，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组织策划，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专著系列之一。）

责任编辑：罗 苹

历史人物研究的新模式

——评胡波著《岭南文化与孙中山》

□ 邹兆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00037)

历史人物研究是当代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大量历史人物传记的出版，丰富、繁荣了史学的园地。多数历史人物传记都是根据传主一生活动的历程和领域进行历史学的考察。这种记述模式当然应该是历史人物研究的基本模式。但对孙中山这样一个近代历史伟人的研究，如果不从理论及方法上有所改进的话，研究的深化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们已经指出：过去的研究多有一种党派化、政治化的倾向，难以避免僵化死板、简单重复和表层状态的研究。如果能从他的生平事功和公开言论深入到其人格特征、思维方式、情感世界、行为取向等方面；再反过来从这些方面来探讨其历史活动，寻求相应的特点和规律，这样的研究路子可能会促使孙中山的研究深入一步。（见陈胜彝、林家有为《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一书所写的序）而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波同志的新著《岭南文化与孙中山》，则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有益的尝试，是作者运用历史心理学和文化学理论来深化历史人物研究的新途径的产物。

在这部书里，胡波同志通过阐释岭

南文化的特征和岭南人的文化心理来阐释孙中山的个性特征、感知方式、思维特点、审美情趣、行为方式等的表现及其特征。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打开了孙中山的内心世界，使人们不仅能够看到他的表面的言行，同时能够看到这些言行后面的心理原因，以帮助读者了解孙中山思想、行动中的某些似乎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问题，达到了一般性研究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该书虽然从多角度入手去研究孙中山内心世界的方方面面，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对孙中山性格特征的揭示。胡波的研究方法的特殊之处，是从岭南文化这个大背景中，从他的生活圈、学习圈、交流圈、活动圈等方面来考察岭南文化对孙中山的外向型性格的影响；阐述了他的积极的个性倾向和极其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揭示了他的性格结构中的情绪特征和理智特征在对人、对己、对事物、对革命事业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通过这样的分析，使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一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的生命气息。通过这样的研究，使读者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历史人物的一生的言行，就会感到容易理解了。

该书所论述的孙中山的性格，总的来说是一种外向型的性格。这种性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孙中山最明显的个性特征是始终保持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对人、对事始终充满激情。作者认为：乐观自信和充满激情是许多岭南人共有的性格特征，而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其次，是他的宽宏大度、富有同情心、开放性与包容性并存的性格特征。

再次，旺盛的求知欲和实用主义理性是孙中山外向性格的又一特征。

最后，作者谈到了孙中山的顺应时势与务实风格。指出他一生时时在求索，时时在进步。

为了研究孙中山的个性，作者也涉及到他的气质特征。他认为，孙中山的气质趋向于多血质、胆汁质合二为一。比如，他在一般情况下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冷静沉着、灵活敏捷、坚强刚毅这样的气质特点，但有时也有暴跳如雷、急躁冒进、偏执固执这样的气质特点。因此，对于他的气质特征应该作综合的考察。

由于运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孙中山就不仅仅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民主革命先行者的一面，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是具有活生生的性格特点的人。他的过人的胆略、他的无限的激情、他的博大的胸怀、他的宽容的精神、他的永无止境的求知欲望等等都是有助于“加速”历史前进的。但作为一个岭南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普通人，他的性格也有其弱点，即不利于革命的方面。胡波同志在书中对这些方面也有具体、深入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在一般的孙中山传记中是很难看到的。

由于作者采用了文化学和历史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孙中山，所以该书的基

本框架和叙述形式都与一般历史著作有较大的不同，在这一点上会使读者有一定的新鲜感。该书既不是按照人物一生的活动过程来叙述，也不是按照人物事迹的若干方面来叙述，而是从文化的背景、文化对人的影响和人物心理构成的几个方面去分别论述，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人物研究的新模式。这当然也会给读者一种陌生感。这种叙述形式不重事情本身的发展过程，也不重史料分析和考证，它以自己独有的特色开辟了历史人物研究的新路径。

然而，既然是一种新形式也就必然会有其不成熟、不完善之处。从地域文化与人的关系、人物性格与社会活动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人，尤其是研究单个人，这本身就具有相当的难度。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史料本身可能并不少，但是能够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史料可能并不多，这就会使这种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读过该书之后，感到一般性的叙述与分析过多，而结合孙中山本人实际的叙述相对显少。例如，作者在书中的前三章用了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谈一般文化的概念、岭南文化与岭南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在这些部分中，孙中山还没有出现；而在后面各章分别叙述孙中山的个性心理、思维方式、情感世界、行为方式时，又要分别讲述岭南文化和岭南人的文化心理，再从这种大背景下去看孙中山。这种比较雷同的叙述方法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在岭南文化的表述方面显得过多，而且难免重复，但对于孙中山的分析、特别是对某些重要历史问题上的心理表现的分析就显得不够深入。笔者认为，该书应是从岭南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的角度去研究孙中山，而不是研究岭南文化和孙中山并重。如何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值得认真斟酌的。

“十九世纪的岭南”学术研讨会召开

1998年12月26日，“十九世纪的岭南”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召开。会议由香港华南研究会、广东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华南研究中心及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来自广东、北京、福建、江西、江苏、香港及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的专家学者共计一百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上有十几位专家学者围绕以下五个方面作了专题发言：一、商业与近代化，其中有叶显恩的“从航运革命看岭南近代化进程”、李培德的“19世纪香港粤商的商业网络”、李吉奎的“近代买办集团中的广东人群体”等。二、学术与文化，如杨宝霖的“邓淳和他的《岭南丛述》”、麦哲维（Steven B. Miles）的“境别尘凡：学海堂的建立与道光时的广东学界”、桑兵的“从边缘到中心：学海堂与中国学术”等。三、歌谣中的历史，包括黄宇和的“对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顺口溜的探索”和黄挺的“潮州歌册中的吴忠恕事件”。四、地方社会，有片山刚的“19世纪顺德县龙山堡大岗墟的结构与图甲制”、陈忠烈的“‘众人太公’和‘私伙太公’：从珠江三角洲的书院、书斋、书塾、家塾等看祠堂的演变”及张文苑的“晚清广东的赈灾体系”等。五、华侨与侨乡社会，包括冷东的“19世纪的潮汕海外移民”、龙登高的“粤闽侨乡社会：19世纪形成期的特征表现”及何韵怡的“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介绍”等。与会学者则就上述几方面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及如何超越“华南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会议是岭南系列学术研讨会中的一次，在此之前已召开过“十六世纪的岭南”、“十七世纪的岭南”及“十八世纪的岭南”三次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岭南文化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郭秀文）

该书作为研究孙中山的一个新角度，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它所形成的研究历史人物的新模式也是很有价值的。作者勇于在史学研究中另辟新径的探索精神，也是十分令人佩服的。但该书毕

竟是对于历史人物研究的新模式的一种探索，如何把这种模式运用得更加成熟，则需要作者与其他史学工作者在不断的实践中继续努力。●

责任编辑：郭秀文